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河殤

轟動大陸的電視連續劇：

● 胡平：怪黃河，還是怪共產黨？

讀《河殤》有感：

● 天災人禍二十二例

● 軍隊幹部：八一示威七八繳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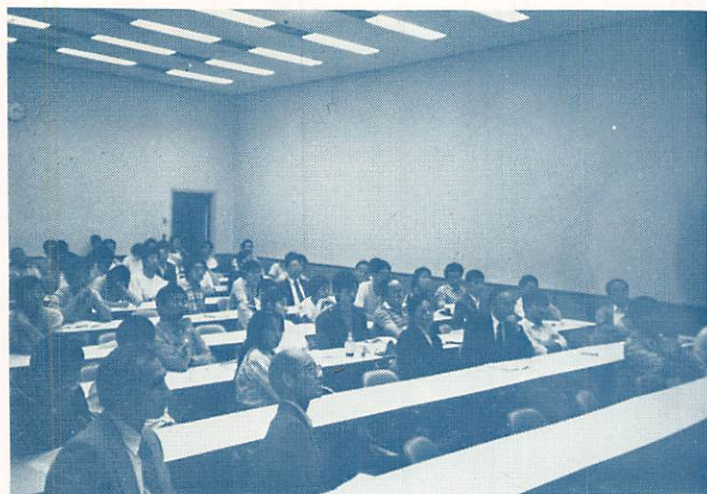
● 趙紫陽迫走華容道

NOV. 1988 NO.

66

歷史學會在紐約召開

繼經濟學會和政治學會之後，中國留美同學歷史學會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召開第二屆年會。會議先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召開，後移至紐約州北部喬治湖舉行。約一百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參加了會議。



會議着重討論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反思，中國歷史上民主淵源和政治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對今天中國現狀的借鑒作用；中國歷史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等。

會議歷時三天，最後選舉了新任理事會和主席。王希、張信、程洪、李晨陽和翟強當選為學會第三屆理事會成員，王希和張信分別當選為正副會長。

專制不改變改革無希望

中國的改革遭遇到了空前的挫折，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了。

幾個月前，北京還傳出消息說，鄧小平、趙紫陽下決心要闖物價關，說是不惜頭破血流也要闖；其後不久，人們又從人民日報上讀到了迥然不同的報導，新的物價改革方案要推遲一兩年實施；小道消息還說趙紫陽權力削減，經改大權旁落李鵬；但這兩天的消息却又有所修正，據說李鵬等人並未全面接管經改大權，原因是攤子太爛，沒人肯接。如此等等，短短幾個月時間，中共上層折騰來折騰去，顯然是亂了手脚。與此同時，國內的經濟形勢則是急劇惡化，老百姓怨聲載道。人們都說，中共掌權近四十年，目前無疑是最糟糕的時候。

有一位西方銀行家說，中共經常提出正確的政策，但是中、下層官員不服從政策。這話不像是出自西方銀行家之口，倒是出自中共領導幹部之口。中共領導就總是抱怨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什麼叫正確的政策？正確的政策就是在正確估計了人們的意願、心理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措施，從而使得下面的人在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判斷行事的時候，恰好能產生出上面所預期的那種效果。因此，一旦出現了下面的作法沒有產生出上面所預期的效果時，歸咎於下面是毫無道理的。真正應當

追究的正是上面的政策本身。可是，這位銀行家的話也不是沒道理，從純經濟學的角度看，上面的政策確實看來都很正確。那麼毛病又出在什麼地方呢？

真正的毛病在於：中國迄今仍是一個集權專制的社會，中國共產黨迄今仍在高舉四個堅持。這就從根本上摧毀了人們對市場經濟的必需要信心。孔子說，民無信不立。由此可得到驗證。因此，要使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出困境，唯一的辦法是必須實行自由民主，從根本上改革集權專制。專制不改變，改革無希望。

有人說，中國目前的問題是經濟問題，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關係不大。

這話錯一半，對一半。錯的是，現今中國的危機主要表现在經濟方面，但病根却出在政治上。

對的是，政治上的專制固然是病根，但這個病既然害久了，難免會引出一系列并發症，引出一系列非政治性的毛病。

這就好比一個老人，由於摔斷了腿，被迫長期臥床。臥床時間一長，百病叢生。先是消化不良，繼而肌肉萎縮，再而胸堵氣悶，最後還心力衰竭。還不說在此期間，長褥瘡、失眠、性情變得乖戾，等等。到了後來，即便他的斷腿痊癒，只怕是別的病也會要他的命。

難道不是如此嗎？有人說，中國太窮是因為人口太多，自然資源太少。但是，若不是毛澤東亂批馬寅初，中國今日哪裡會有這十一億八千萬人口？若不是專制統治者搞共產，搞運動，弄得人人對未來沒有信心，中國的自然资源哪裡會破壞到如此徹底？然而，人一旦生了出來，你沒法讓他再投胎回去；樹一旦砍了，你沒法讓它馬上復活。專制的最大罪惡就是，它不顧一切地幹壞事，即使有朝一日它壽終正寢了，它幹的壞事的惡劣後果却還不得不要別人來承擔。

毫無疑問，即使中國今天民主了，我們仍不能很快地擺脫經濟危機。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假使今天中國還不實行民主，現在的經濟危機只會惡化得更厲害。實施民主不能立竿見影，手到病除，但唯有實施民主，中國的經濟才有復蘇的希望。

現在很多人都意識到，七八年、七九年曾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中共在那時就能順應人心搞民主，並且借勢搞好經濟改革，今天的中國，情況一定會好得多。可偏偏在那個時候，華國鋒要搞什麼「兩個凡是」，鄧小平要提什麼「四個堅持」。事到如今，歷史給共產黨留下的時間已經很少很少了。如果它還要一意孤行，其後果又會怎麼樣呢？

歷史學家早就注意到，凡是那些宣稱自己建立起「萬年王朝」（秦始皇）、「千年帝國」（希特勒）的政權，其壽命總是出奇的短暫。考茨基說過一句話：「一黨專政的唯一下場是滅亡。」現在讀起來，人們當別有一番感受。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號創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六十六期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號出版

CHINA SPRING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觀察家

讀·作·編

國內參考

大陸專欄

經濟問題

思想論壇

3 專制不變，改革無望

路邊

6 為權利再辯護

筱草

9 趙紫陽走上華容道

李遠

12 不是天災是人禍（一九八七—八八年）

文峰

——記二十二例特大惡性事故

15 通脹：連廣東人都受不了

馮磊

16 軍隊老幹部：「八一」示威「八七」繳械

黎晉

61 報刊拉廣告，無需揮手段

沐雨

19 個體戶的盛衰對當代大陸社會的影響

徐邦泰

25 「蛇口風波」吹到美國

李三元

27 附：「蛇口風波」問答錄

30 中國涉外企業所面臨的問題

張綱

35 試論中美經濟法規異同

高標

38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辯

立民

45 公有制與民主

峻天

47 從「反清復明」到「明復共和」到學習西方文明

尚昆

49 談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程玉

54 政治宣傳與新聞報導

民聲

——中國新聞媒介的喉舌作用

59 上面空蕩蕩下面蕩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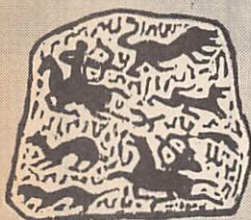
柳成

編輯手記

中國政治變化之快，已令人應接不暇。在上一期的觀察家欄中，我們還在擔心趙紫陽又贏一局之後會採取鬆緊經濟政治的手段，可是這一期的消息就已經告訴大家趙紫陽走麥城的窘境了。表面上看，引起這一戲劇性變化的是鄧小平「誰也不保」的表態，而實際上是中國目前這個誰也無法收拾的局面，這意味着誰在台上都會成為替罪羊。本期刊登的李達關於北戴河會議的內情報導，讓我們看到了中共內部最深處的危機。

當然，社會的變化不僅僅取決於它的領導層的變化，它還有其更深厚的基礎。我們可以從「連廣東人都受不了」一文中瞭解到大陸人的經濟狀況的惡化，可以從「蛇口風波問答錄」中看到當代年輕人的思想演變趨勢。

在解釋中國社會今天的困境時，也有人在追尋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轟動大陸文藝界的電視連續劇「河殤」，就是在這方面頗有成效的努力。本刊分三期連載「河殤」的解說詞，正是希望它能喚起所有人對民族悲劇的反思。在這種反思中，也許有些人會得出與「河殤」相同，全面否定中華文化的結論，也許有人會同意胡平的反駁：怪共產黨，不怪黃河，黃河只是替罪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希望大家參與討論。



參考資料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縱橫談

留學生欄

海峽兩岸

文藝爭鳴

中國之春第六十六期

總編輯

本期責任編輯

執行編輯

美術編輯

69 中共機構越簡越臃腫

馮磊

42 中國大陸學生民意測驗結果
63 大躍進期間人口變動評估

摘自「世界日報」
楊祺明

67 一票制勝 —— 談權力獲得的客觀標準

王炳章

68 大陸留學生爭取J-1轉換H-1簽證
26 「來去自由」才是明智選擇

發起運動致函美國國會議員
摘自「世界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70 會錯意說錯話——熊玠的五點建議

邱垂亮

72 「河殤」(上)

蘇曉康

80 怪黃河還是怪共產黨?

胡平

11 野牛茅

紫莢

封二
中國留美學生歷史學會在紐約召開

66

中國之春

■ 胡平

■ 齊光

■ 嘉風

■ 嘉風



為權力再辯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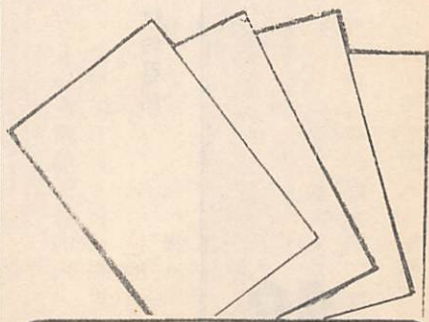
中春第六十三期「為權利而辯護」一文，對有關指責民聯「鼓勵留學生滯留不歸」的問題作了一些解釋，指出民聯從不鼓勵政治避難，而且還設法阻止留學生籍入盟尋求政治避難。

民聯被中國當局宣布為反動組織，受到各種指責和非難，更不用說還有謠言和誤會，當然不得不為自己辯護。然而正如作者干淨利落地表明的，從今後無需為澄清拿誰的錢這類問題而費神一樣，民聯大可不必為留學生滯留不歸而操心。

首先，民聯怎能保證每個成員入盟動機的一致性？動機是主觀性的東西，拿主觀性的東西作為衡量標準本來就缺乏客觀依據而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可能的事情有什麼必要去討論，更何談責任，又怎麼去澄清呢？！

民聯致力於民主運動，民主是民衆的事業，患寡而不患衆。作爲一個民主團體，只要人家擁護贊成就可以成爲其中一員，今天人家贊成可以加入，明天人家不贊成了還可以退出。民聯所關心的當是喚起和團結千百萬人共同努力，至於參加這個組織的人身在何方，那是參加者自己的事情，即使這個組織想過問恐怕也未必過問得了。

其次，如果說有人想籍入盟來尋求避難，那麼根子也在有「難」所以才出現「避」的問題。倘若中國當局允許民聯合法存在，避難又從何談起？因此真正打開政治避難渠道的，恰是中共當局而非民聯。在美國，很多家庭爲受到父母虐待的孩子提供衣食住所，如果輿論不是譴責那些父母的暴虐行爲，而是責備那些離家出走的孩子，那豈不是說這些無辜的孩子即使給家裡人整死也活該嗎？那麼正義何在？公道何在？有人說尋求政治避難就是不愛國，先不論此說是否有理（其實歷史上多少仁人志



讀者·作者·編者

士正是因爲愛國而不得不在異國避難已經是無需旁證博引的歷史常識了），就算是不愛國，我們能否問一下爲什麼不愛國的人都出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有西德人去東德，美國人去中國尋求政治避難的嗎？從這一明擺着的現象可以得出的簡單結論就是，共產黨治理的國家選真有人不愛，共產黨從來直言不諱地宣稱黨與國家是一致的，那麼所謂的不愛國不過就是不愛黨而已。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最窮，最苦，不要說過期滯留美國，身份非法，連打工都無門。就是合法在校讀書的，哪個不累得精疲力盡？更何況誰不念故土親人？能不能回去，願不願回去，何消別人費心，各人心中自有數。

國門漸閉又一例

· 筱草 ·

在國內，最近準備出國的人員大都領用了外交部設計的新式護照。這種護照有效期為兩年，只能使用一次，回國後不必上交。如果持照人企圖以此護照二次出國，在邊境上會連人帶照一起被扣留。

這種做法對於想利用原五年有效期期滯留國外的和打算不交護照再次方便出國的人員確有特效，然而「治表不治本」。這樣把人們本來就極為有限，難以得到的自由削掉一大半。筆者預計，今後持此種護照出國的人員當中會有較大的可能性選擇徹底自由之路，目前身在國外的人員也更趨於充分享受這五年有效期內的自由（本人就這樣打算）。

台灣的做法恰好相反，他們在加強對外移民的工作，得到的結果並不是人才流失，而是在經濟、高技術方面的高速發展。

兩相比較，我建議大陸的領導人們抽時間研究一下人的本性，可以鼓勵國內學術界深入討論西方的「人性論」對於社會進步的影響。「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對人的本性不甚悟透的情況下，怎能把人類社會治理得井然有序，而不是東逃西竄呢？

李志強。

警惕山大王要無賴

如果有誰尚未領教過新任總理李鵬的蠻橫的話，可去讀一下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六日的一則報導。據該則登在頭版的報導，李鵬在出席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時說：「我們的工作不可能沒有缺點，每項改革措施也不可能沒有不同意見。少數人想借題發揮，挑撥煽動，製造事端，進行搗亂和破壞」（李鵬原話可能還有下文，但報導中只引了這兩句

，筆者僅照抄而已）。他的前一句話還勉強過得去。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當政以來，像肅反、反右、大躍進、文革之類的「缺點」確實接連不斷，這次李鵬能坦承不諱，沒有重彈「偉大、光榮、正確」之類的老調，不能不說是個進步。其後一句話指代不明，頗難理解。然而將這兩句話聯在一起就可聽出一種山大王要無賴的語氣。誰的這兩句話可概括為：我有缺點是難免的，誰要不滿意，有意見，他就是挑撥煽動，搗亂破壞。此番話與毛澤東當年「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高論似同出一曲。

既為搗亂破壞，就得鎮壓。這也正是李鵬想做的。據該文報導，李鵬緊接着要求公安機關要有應付鬧事、對付騷亂、對付外來各種滲透破壞以及嚴重犯罪活動的長期思想準備和具體措施。同時，他還提出二條具體方法（其實也是共產黨幾十年的老方法），（一）改善政治思想工作；（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前幾年還叫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李鵬本人不會不清楚。毛澤東可謂政治思想工作行家，僅雄文就有五卷之多，可惜連自己老婆和姪兒都沒能教育過來。因此，專政可能是李鵬將會採用的主要手段，一切提過或想要給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意見的人對此應有所警惕，以免受到「人民民主專政」的「依法制裁」。

星池。

遲來與丁楚誰有理

讀最近一期（八月號）「中國之春」，覺得發表的遲來「致中國之春一封公開信」及丁楚「為權利而辯護」二文甚好。

遲來的文章，反映部分留學生的思想狀態

。當然，我不瞭解何以他的「幾位大陸留學生朋友對此刊物皆抱以否定的態度」。據我的接觸，對貴刊抱基本肯定態度的大陸留學生約佔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抱完全否定態度的佔百分之十左右，態度曖昧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考慮到中共在國內已正式宣佈「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絕大部分留學生要回國的現狀，說反對中國之春的話，既安全，又可得中共的賞識，回國後有百利而無一弊（從個人私利來看）；反之，說中國之春好話的，除了回國後有較多風險外，毫無好處可言。因此，不少留學生在持基本肯定態度時尚有保留，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國民聯本身也非十全十美）。所以，我總的感覺，大多數中國留學生還是有正義感的，對貴刊是支持的，當然，由於顧慮到回國後的情況，大多數人不願公開表示這一點。

我之所以想寫信強調這一點，是不願意由於遲來的公開信一文給中國民聯及其他讀者一種錯覺，似乎大多數留學生均持否定態度。當然，遲來的瞭解接觸，也可能都是事實，留學生中有差異，並不奇怪。尤其是對中國之春的公開表態，沒有一定接觸瞭解的人，誰知道你是什麼身份，也不得不防。我只想說，我所接觸的留學生中，態度與遲來所述的有較大差別。此外，還有一個現象可以一提。在我校圖書館所訂的各種中文及有關中國雜誌中，每期的中國之春都是被翻閱最多的（最後破損最嚴重），這是一個旁證。

持遲來公開信中態度的人，當然有。我覺得丁楚的辯護文章寫得很好，有說服力。有些國內新出來的人，思維方式一時還不能脫出舊的巢穴。中國之春存在的意義之一就是開拓留學生們的視野，從更深一層的角度來分析平時

似乎已習慣成自然的觀念。至少從這一點上說，閱讀中國之春對我自已收益不小。尤其是遲來與丁楚二文的對比，很有啓發。當然，希望一篇辯護就說服所有人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可能永遠不會被說服。但辯論的目的本身並不在於說服對方（當然能說服最好），而在於爭取旁觀的第三者，即大多數的群眾。這時，靠以勢壓人，靠強辭奪理都是無濟於事的（人民日報登載宣佈中國民聯為反動組織的上海公安局公告便屬於此類文章）；誰的理論真正有說服力，才能使群眾信服。

李德寧

一人挨整，人人自危

幾年的留學生生活非常緊張，總感時間不夠用，又歷經國內政治運動，心有餘悸，因此本人長期以來對於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的活動，總的態度是關心，但不介入。只是有一點在內心一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五七年反右，整肅了知識分子中一批敢講話的優秀分子，結果是整個知識階層的不敢講話、屈從和鎮壓。五九年，打擊了敢講話的彭德懷，結果是整個幹部階層的進一步屈從和鎮壓。文化大革命更是明顯，當階級鬥爭的大棒揮向「三家村」時，當不明真相的廣大人民被迫舉手高呼「打倒三家村」的口號時，廣大人民表達其不同於「最高指示」的權力也就被剝奪了。這個道理與所謂「一人向隅，舉座不歡」是極為相似的，當然程序有所不同，應改為「一人挨整，人人自危」。基於這個道理，我總認為，同意不同意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讓共產黨專橫地打擊他們，取締他們

，強令別人與之劃清界綫是不可接受的。

願我們廣大中國大陸留學生勇敢地站起來，用各種不同形式，維護楊巍同學做人的權利，維護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作為部分留學生自己建立起來的民主刊物和組織的存在的權利，從而維護我們中國人民自身的正當權利。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何新宜

同意鄭竹園教授的結論

編輯先生：

讀了貴刊八八年八月號一原先生的文章，覺得也有一些意見要發表。

他對鄭竹園教授的「大陸的崇洋媚外與向錢看比台灣更嚴重」的論點提出指責，是無理

的。當然，鄭教授是提不出數據的，但我們不妨反問，一原先生又有什麼數據可以證明大陸的崇洋媚外沒有台灣嚴重呢！

經濟的東西容易提數據，但政治心理的東西是很難提數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敏銳的觀察力。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羅斯福夫人受斯大林邀請訪問了一次蘇聯，她一進莫斯科就感到了政治的壓抑，當她從莫斯科飛回哥本哈根一出飛機時，她立刻感到了一股溫暖的自由空氣。夫人並沒有在蘇聯呆多久，但她可以很快地得出結論，而且這個結論可為全世界有識之士所接受，甚至包括今天的戈爾巴喬夫在內。這何嘗需要數據。

我解放前在美唸書，一九四九年回國投奔共產黨祖國，那時我曾認為鐵托是反動分子，

羅斯福夫人當然也是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等等。

我在共產黨中國生活了將近四十年，終於不得不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是活生生的事實迫使我改變的。

我自動從美國回國，這說明我當初沒有崇洋媚外，至少是不十分崇洋媚外，但今天我却變得崇洋媚外了，至少是比以前崇洋媚外了。我個人當然不足為例。

但我在國內曾與不少研究生、教授和司長

級官員談過這個問題，他們幾乎一致承認大陸的崇洋媚外已大大超過解放前的蔣介石時代。

不過，有幾位補充說：「在老兄面前我這樣說，但在洋人面前我是不會說的。」

憑我個人的經歷和觀察，我同意鄭教授的結論：「大陸的崇洋媚外與向錢看比台灣更嚴重。」

大陸人

向與遲來商榷的作者致謝

自本刊於六十三期刊登遲來寫給胡平的公開信後，我們收到了田夫、先行者、肖昆珠、鄭啓蘇、一生、黃志雄、劉水、柳林、尤新、馬敬原、劉國玉、張佳秋、雨聲、舒娜、劉學生、胡說、常陸北、千夫、齊聲、隨筆、古長林、劉瑞祺、趙青田寫的二十三篇文章以及吳家禮等人寫來的七十八封信，分別從不同角度對遲來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或進行批駁；同時，我們也收到唐書成寫的文章，支持遲來的觀點，與「先到」商榷的文章。因本刊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部刊登，在此特向各位作者表示謝意，並不一一退稿了。

編者

趙紫陽走上華容道

李遠

當去年中共十三大結束時，趙紫陽的躊躇滿志曾給人們留下過深刻印象。當一位海外記者問及趙紫陽關於黨內派別鬭爭的問題時，趙把這位記者教訓了一頓，說：「我們黨內沒有派別，如果有的話，也只有一派，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改革派。你們外國的輿論界總是喜歡用分析派別鬭爭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政治，這是錯誤的，說明你們根本不了解中國政治。我的報告是全體代表一致通過的，若有派別鬭爭，怎麼會一致通過？」

毛澤東曾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連毛澤東都敢於承認的東西，趙紫陽却不敢承認。這說明什麼？敢於承認派別之爭說明對形勢的自信，而不敢承認則說明缺乏自信。

事實並不是巧辯所能掩蓋的，這次北戴河會議上，矛盾又重新激化。事實證明，中共內部不但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就是在改革派內部也存在着激進派和緩進派。

趙紫陽的商品經濟新秩序

激進派以趙紫陽為首，他在會議上提出了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鼓吹「商品經濟新秩序」。新秩序共包括十個方面，如價格放開

，工資掛鉤，企業提高效益，政府機構保持廉潔，扭轉黨風，加強法制，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等。

他提出價格關關是所有改革的關鍵，步子宜快不宜慢，長痛不如短痛。除公用事業和自然礦產由國家定價外，其它產品價格全部放開，取消目前的雙軌制。這一方面可以刺激企業增加生產，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國家財政補貼的負擔，同時可以消滅經濟犯罪，可謂一石三鳥。只要工資與價格上漲同步或高於價格上漲，價格關關就是可行的。

責任由趙負而不是李負

緩進派以李鵬、姚依林為首。這一派認為趙紫陽只想好的一面而不講壞的一面。價格的上漲今年與去年相比約為百分之二十以上，遠遠超過激進派的估計。他們估計到年底，價格指數將上升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工資增幅肯定不可能趕上通貨膨脹率。到七月份為止，銀行貸款增加了七百七十億元，是去年同期增幅的三倍。在這種情況下放開物價，會出現貨幣失控，導致全面經濟危機。

緩進派的主將姚依林在會上向趙紫陽發難

，毫不客氣地對他進行批評。他認為趙的物價改革缺乏長期的、通盤的規劃。商品經濟新秩序十個方面盡是華而不實的新概念新名詞，而缺乏具體實施的措施。他還批評趙在當總理時沒有決心搞價格關關，而當了總書記後又越俎代庖，干涉國務院的事務，不尊重政府機構的意見，不尊重李鵬。

緩進派拋出了去年全國物價調查報告，價格上漲指數將近百分之五十。姚依林強調，這個責任應由上任總理趙紫陽負，而不應由李鵬來背。

在這場大論戰中，趙在理論上略佔優勢，而李、姚在事實上佔優勢。儘管趙紫陽為他的新秩序極力辯護，但却拿不出具體可行的措施，而緩進派攻擊價格關關方案的事實垂手可得，比比皆是。這使趙在會議上總處於下風。

鄧小平反復無常見風使舵

對於趙紫陽的價格關關計劃，鄧小平最初表示支持，曾多次為趙打氣。鄧支持價格關關的主意主要出於兩個動機：第一是要扭轉黨風；第二是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掩護經濟改革渡過它最困難的「鬼門關」。薄一波曾向鄧匯報

黨內貪污腐化的嚴重現象，並把這些現象歸結為價格雙軌制的「副產品」。薄的本意可能是要以此來攻擊趙紫陽，可是沒想到却使鄧下了價格併軌的決心。如果說趙關價格關的主要出發點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話，鄧支持關價格關的主要出發點則是扭轉黨風，制止貪污腐化。

可是在北戴河會議上，鄧小平却顯得態度曖昧。開始一言不發，仔細聽取兩派的辯論。起初他還對緩進派的觀點不以為然，說：「形勢再嚴重，有比井崗山反圍剿時嚴重嗎？」可是隨着姚依林不斷列舉大量數字來證明重大危機迫在眉睫，隨着緩進派的意見逐漸佔了上風，會上越來越多的人對「商品經濟新秩序」表示異議；鄧小平的態度突然轉變，當討論涉及鄧小平站在哪邊時，他表態說：「我誰也不保，誰搞不好都要下去！」

鄧小平態度的反復無常令與會者大驚，很多人都在懷疑這個八十五歲的老人是否還具有理智思維的能力。確實，過去每年北戴河會議總是鄧顯示他身體健康，精力旺盛的機會，人們會傳聞他在海裡擊水搏浪，在會議上縱橫闊綽。可是這一次鄧小平却很少下海游泳，傳聞他自覺身體不適，精力不佳。有傳聞說他因前列腺炎排不出尿，曾在會議期間兩次急救，差點休克。

可以說鄧小平的態度和身體狀況也為會議罩上一層陰影。

北戴河復會，總書記被架空

鄧小平態度的轉變，使激進派大受挫折，以致使會議中斷。據說趙紫陽請求辭職，只是無人可頂，方才作罷。七月二十三日，趙紫陽帶着胡啓立、喬石拂袖而去，離開北戴河到了

東北，去為價格關開打氣。這就是外界傳聞的北戴河會議一度中斷的實情。

實際上，北戴河會議也可以說沒有中斷，國務院的兩位大員，李鵬和姚依林留在北戴河主持各位專家學者的座談會，以準備價格、工資改革的具體方案。

為了緩和矛盾，在鄧小平的極力主張下，中共又在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於北戴河召開政治局第十次會議，這就是外界傳聞的所謂「北戴河會議復會」的消息。

這個會議的結果是耐人尋味的。從表面上看趙紫陽的意見得到通過，會議原則上批准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也就是說「關價格關」的主張通過了。這就是外電報導的「趙紫陽又贏一局」的說法。可是實際上，李、姚代表的緩進派在具體改革措施的設計上佔了很大的優勢。五年的規劃，實際上動作是非常謹慎。步子僅限於對市場發育有嚴重影響的價格問題，而不是像趙紫陽想象的那樣是全面解決價格問題。

在緩進派和急改派的鬥爭中，李鵬曾也以辭職要脅，以抗議趙紫陽過多干預政府事務。趙紫陽不得不讓步，最近一再表示不再干預政府事務，並多次表揚國務院的工作有成績。

北戴河之役，表面上是趙紫陽又贏一局，而實際上失敗慘重。他儘管仍是總書記，軍委第一副主席，可實權大大削弱。經濟工作今後實權將落在李、姚兩人手中，而黨務工作今後會更多地由喬石承擔。據說這一安排已得到鄧小平的認可。這說明趙已被架空。結合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的驚人表態，中央內部一些知情人士猜測，鄧小平又要換馬了。

鄧胡在演苦肉計？



胡耀邦在北戴河會議上一直無聲無息，幾乎成了謎一樣的人物。北京目前流傳一則傳聞，認為上次鄧小平讓胡耀邦下馬是演了一場苦肉計，讓胡避開權力鬥爭是非之地，一旦趙紫陽發生危機，便讓胡出來收拾殘局。所以近來隨着趙紫陽的威信的下降，要胡出山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一年多來，儘管胡耀邦在公開場合不露面，但他並非每天只看書讀報，胡耀邦團派的幹部絕大部分仍在主持各地和部門的工作，力量十分強大。胡的兒子胡德平已傳出消息將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胡耀邦的心情很好，趙紫陽經常登門拜訪胡，認真聽取他的意見。

當然，以上傳聞是否可信，值得商榷。但是胡趙兩人唇亡齒寒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去年初胡倒台時趙甚至有些得意，黨政大權獨攬

，不可一世。可是其後果今天就暴露出來了。過去趙雖是改革派主力，但是處在二綫，並不和保守派發生直接衝突。第一綫是胡，為趙打掩護，打阻擊，直接衝突體現在胡身上。而趙往往可以利用他二綫的隱蔽地位，從中周旋，暗渡陳倉。現在胡一倒，趙就暴露在一綫上了，所以自去年以來，趙多次與保守派發生直接衝突，身上多次中彈。沒有胡作為緩衝，趙的地位岌岌可危。

光打雷不下雨的常委班子

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最高層的權力結構顯然是個光打雷不下雨的班子。

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五人：趙紫陽、胡啓立、喬石、李鵬、姚依林。五人中前三人是

搞黨務的，後兩人是政府首腦。黨政分野十分明顯：趙、胡是激進改革派人物，李、姚是緩改派人士，喬石騎牆。就算黨務派三人佔優勢，可以「原則上」通過任何有利於急改的決議，可是具體實行的還是李、姚兩人，他們不給你真幹，任何決議都是空的。這次北戴河會議後，趙一邊在喊「關價格關」的口號，李同時就在北京宣佈用行政手段控制物價，由此可見今後權力結構之特點。

實際上，每次參加政治局常委會的不止五人，而是七人。另外兩人是國家主席楊尚昆和人大常委主任萬里。此二人參加最核心的決策會議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行政地位，而是因為兩人與鄧小平的密切關係。鄧小平顯然並不放心現任的五人常委，故通過兩位「編外」的鐵桿「哥們」對最高層決策進行監督控制。

萬里每星期都要到鄧小平家裡打牌，鄧小平就從牌桌上得到很多消息，並且轉達其意見，實行垂帘聽政。

在五人常委中，喬石的地位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的倒向舉足輕重。在趙、胡一邊，趙的權力在削弱，胡則根本無實權；而李、姚一邊，則是全部國家機器的操縱權。由於喬石的折衷，他已越來越多地被各方所接受，權力正在膨脹。趙曾身在黨位，不謀黨務，把過多注意力放在政務上，而黨務工作則多落在喬石身上。現在趙被李、姚擠出政務之後，反而兩頭不着邊了，說他被架空，毫不誇張。根據內部權威人士分析，趙今天的地位很可能成為中國政壇上的替罪羊，而喬石的地位很可能使他成為一匹很有希望的「黑馬」！

野牛蒡

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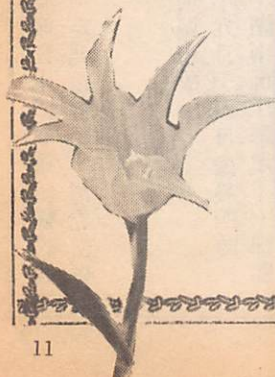
廣島的彈痕
龐培的廢墟
弗拉基米爾大道年年風雨
是哪一瞬荒唐的交歡
雷電和花神催生了你
葉沿蒜盡根畔的血污
曠野又舉起犬牙交錯的梳篦
並非沒有少女的裙裾
只是花期太艱辛
並非沒有施主的顧盼
在春天的時候

只要憑借風的提携
而帆也會把你載住
白鳥啼啭的花市
你為何錯過末班車
不和逃難的車前子，金矢菊
回到木樨地

即便是兒戲
危險也該玩膩
還堅守什麼呢
道路彎彎曲曲
沿途燒焦的木樨
都是一個一個謎

傾心的人遙隔一世紀
流放者的情歌時斷時續
落難的亡靈殷殷向權勢拜托
而地下城並非僅向你展示——
它華美，慘烈的影壁
你為何又固執又痴情
天生麗質難自棄
那麼作為無花草
無心睥睨花的禮遇
而作為情人
嚴峻地審度
是他留給你的使命

如果你是歷史
留給泥窪的眼睛
自然賦有冰晶玉潔的清醒
爲了百年後的忌日
你隱忍怒放時的痛楚
只要在閃電時
留下磁性的記憶



不是天災是人禍

特大惡性傷亡責任事故二十二例

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

時間：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日起火，六月二日被徹底撲滅。

傷亡、損失情況：黑龍江省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燒毀房舍六十一點四萬平方米，其中居民住房四十萬平方米；燒毀貯木場四處半，林場九處，存材八十五點五萬立方米；燒毀各種設備二四八八台，糧食三二五萬公斤，橋涵六十七座，鐵路專用綫九點二公里，通訊綫路四八三公里，輸變電綫路二八四公里；受災群眾五萬多人，死亡一九三人，受傷二二六人。

事故直接原因：導致這場特大森林火災的起火點有五處，其中有四處是因為違章使用割灌機或吸煙亂扔煙頭而造成的。

南通特大沉船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上午十一時。
傷亡、損失情況：由上海開往武漢的長江輪船總公司武漢分公司所屬的「長江二二〇三三」號推輪與南通輪船公司「江蘇〇一三〇」號客輪在長江南通航段江面上相撞，客輪隨即翻沉，造成一〇五人死亡，九人落水失蹤，直接經濟損失九十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是由於「江蘇〇一三〇」號客輪四名當班駕駛員（其中三人當場死亡，一人落水失蹤）和「長江二二〇三三」號推輪

當班船長田宇廣及水手王建國（均被依法逮捕），思想麻痹、玩忽職守和嚴重違章操作。

山東博興縣鍋爐爆炸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零時三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山東省博興縣曹王鎮前唐村骨膠廠剛安裝好的一台立式蒸汽鍋爐忽然爆炸，死五人，傷十三人。

事故直接原因：生產廠家沒有取得國家機械委、勞動人事部門審批簽發的「鍋爐製造許可證」，非法製造鍋爐。使用廠不經勞動部門檢驗審批，非法購買鍋爐，並安裝點火運行。

隴海鐵路貨車顛覆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七時三十四分。

傷亡、損失情況：由蘭州站發出的八一八次貨物列車，在穿越十里山二號隧道時突然脫軌顛覆，四十九節車廂中的十六個油罐車在洞內起火，烈火燃燒了一晝夜。使隴海綫天蘭段中斷行車二〇一小時五十六分，三名押運人員死亡，報廢車輛二十三輛，隧道裂損一七九米，損壞綫路七六三米，直接經濟損失二四〇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事故發生前十三天（八月十日），蘭州鐵路局定西工務段鋼軌探傷組曾

探出一七二五公里處右側三十三軌第一螺栓孔水平裂紋達四十毫米，定為重傷軌，需立即更換，却拖延下來。

湖南沅江縣房屋坍塌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四日凌晨四時。

傷亡、損失情況：湖南沅江縣建委一棟即將竣工的三層辦公樓突然坍塌，沉沒於近五米深的湖水中，住在樓內的四十一名施工人員，四十名死亡，一名重傷，直接經濟損失九十三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沅江縣建委規劃設計室主任馮文魁等人不具備建築設計資格，却硬要承擔設計任務，造成設計嚴重錯誤。開工也倉促，使建築項目進入「邊施工、邊設計」的混亂狀態。在施工中，違反規定，採用包工砌法砌築磚柱，降低了磚柱安全系數。

湖南寧遠縣個體戶沉船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十月二日。

傷亡、損失情況：湖南省寧遠縣一艘個體戶小型機動船，在該縣半山水庫大堤填基處攬客，全船載客四十六人，零擔貨五百多公斤，在離岸二十米處下沉，死亡三十一人。

事故直接原因：個體戶無證無照經營客運，嚴重超載和船隻破舊使船頭進水。

浙江瑞安雙北供銷社沉船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傷亡、損失情況：浙江省瑞安市雙北供銷社一艘無證貨船，下裝空酒壇、煤球架，上裝漁貨，又違章載客六十三人，船員五人，從北麂開往瑞安。航行至東瓜嶼海面，遇風浪而翻沉，死亡三十七人。

事故直接原因：無證駕駛員技術不佳、操作不當，同時貨物裝載上重下輕。

淮南礦務局特大瓦斯爆炸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九日二十二時零四分。

傷亡、損失情況：安徽省淮南礦務局潘集一號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四十五人，重傷四人，經濟損失一九九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違反「煤礦安全規格」等有關規定，在瓦斯排放影響區域內沒有停電、撤人，沒有制止排放工作以外的其他作業。

青海汽車一公司貨車翻車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十時二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青海省第一汽車運輸公司一輛從西寧向東都方向行駛的載客大轎車在甘青公路一七一公里附近一無人看守的鐵路道口，與正在行駛的二二一二次貨車相撞造成翻車，當場死亡六人，重傷傷四十五人。

事故直接原因：青海省第一汽車運輸公司司機聚武違反鐵路道口管理暫行規定，強行搶越道口，致使客車尾部與火車相撞。

江西永新縣花炮廠爆炸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傷亡、損失情況：江西省永新縣懷忠鄉花炮廠發生一起重大爆炸事件，死亡十八人，傷七人。

事故直接原因：這個只有三十五人的鄉辦企業，沒有安全生產許可證，爲了加快生產進度，廠裡把生產任務承包給個人，把原由專人在指定地點裁切鞭炮引綫的工作，改爲由工人

各自裁切，違反了安全生產規定，於是引起爆炸。

四川長寧縣汽車翻車事故

時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傷亡、損失情況：四川省長寧縣汽車運輸公司駕駛員羅傳兵，駕駛重慶牌大客車，從宜賓市返長寧縣城，到宜賓市南廣鎮一下坡急轉彎處，翻至二十四米深的橋下亂石灘上，造成五十人死亡（包括駕駛員）、三十六人受傷。

事故直接原因：一是剎車失靈。二是司機在開車前和行車中，沒有進行必要、及時的檢查。三是嚴重超載，該車定員四十八人，實際載客八十六人。

二七二次列車火災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二十三時二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廣州開往西安的二七二次列車，行駛到湖南永興縣境內馬田圩車站時，四號硬座車廂因乘客攜帶易燃品突然引起大火，當場燒死三十四人，燒傷三十人，毀壞客車兩節，京廣綫中斷行車四十六分鐘，直接經濟損失十六點三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肇事者郭中奇違反鐵路安全規定，從韶關車站非法夾帶一鐵罐約二點五公斤已用松節油調好的油漆上車。途中油漆外溢。郭中奇用衛生紙去擦，又將擦有油漆的衛生紙等扔在地板上，吸煙時又任意將未熄滅的火柴棍丟在地板上，致使衛生紙燃燒，起火後，他不積極滅火，又不報告，竟跳窗而逃，郭中奇現已被判無期徒刑。

「一·一八」飛機失事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

傷亡、損失情況：中國西南航空公司伊爾十八—一二二號飛機，執行北京至重慶四一四六航班，十九點零五分從北京起飛，二十二點十七分在距重慶白市驛機場約八公里處失事。機上旅客九十八人和機組十人共一〇八人全部遇難。

事故直接原因：由於第四發動機右起動發電機故障燒毀，導致第四發動機失火後墜落而致。這架飛機從重慶飛到北京時，已發現機械有故障，並在首都機場進行修理，但是並沒有真正修好，就帶病起飛了。

八十次特快列車顛覆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一時二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昆明開往上海的八十次特快旅客列車行至貴昆綫且午至鄧家村站間發生顛覆事故，造成八十八人死亡，六十二人重傷，客車報廢七輛，鋼軌報廢二十根，枕木報廢四六〇根，中斷正綫行車四十四小時，直接經濟損失九十三點七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這是在進行電氣化改造的鐵路。事故原因有兩種說法：一、鐵軌上方架設的輸電導綫（上海生產的）質量不高，發生斷裂，將八十次列車拖掛顛覆；二、火車司機違章超速行駛。

河南盧氏縣客車翻車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中午十一點二十五分。

傷亡、損失情況：河南省盧氏縣的一部解放牌客車，行至靈寶縣境內的蘇村鄉姜坡村轉彎下坡處，突然翻入八十米深的山溝，造成四

十二人死亡，二十九人受傷。

事故直接原因：一是制動失靈。二是司機違章操作，出現險情時，未採取有效的應急措施。三是嚴重超載，該車定員四十五人，實際載客七十一人。

三一一一次列車同二〇八次列車相撞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十四點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由南京開往杭州的三一一一次旅客列車，與長沙開往上海的二〇八次旅客列車，在上海市郊匡巷車站正面相撞，造成傷亡一二七人的重大事故。其中日本旅客死亡二十七人，重傷五人，傷三十二人；中國公民死亡一人，重傷十二人，傷五十人；損壞兩台機車，六輛客車及部分綫路。

事故直接原因：按運行圖規定，十四點零七分從真如站開出的三一一一次列車，應在上海鐵路外環綫上有兩股道的匡巷車站停車，避候從這裡通過的二〇八次列車。但三一一一次列車司機周小牛、劉國隆沒有按規定停車，而是冒出現示紅色燈光的停號機外一五三米，擠壞道岔，進入了單綫，從而與迎面開來的按運行圖正常運行的二〇八次列車相撞。

山西交城縣個體戶客車撞崖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

傷亡、損失情況：山西交城縣天寧寺至縣城的專綫公路上，一輛載客八十九人的個體戶大客車撞在山崖上，傷亡八十一人，其中死亡三十一人，重傷三十二人。

事故直接原因：司機李海平沒有駕駛執照，不按操作規程行車，在陡坡彎道處空檔滑行，剎車失靈撞上山崖上。這輛車還嚴重超載，

定員四十七人，却載了八十九人。

貴州威寧縣煤礦瓦斯爆炸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傷亡、損失情況：貴州省水城縣大灣區直樂村一農民與畢節地區威寧縣猴場鎮政府聯合開辦的小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四十五人，重傷二人，直接經濟損失二十多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該礦不具備起碼的安全生產條件，獨眼井開采，明火照明。事故發生前，井下曾停電、停風，造成瓦斯積聚。他們不排放瓦斯便恢復生產，電工去整修電路，產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

山西霍縣聖佛煤礦瓦斯爆炸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九時零七分。

傷亡、損失情況：山西省霍縣礦務局聖佛煤礦發生特大瓦斯煤塵爆炸事故，死亡五十人。

事故直接原因：違反操作規程，讓井下扇風機停止運轉，並在新開掘進工作面岔口拆掉風筒，造成巷道內瓦斯積聚。在既沒有檢查瓦斯，又沒有停電的情況下，帶電打開電煤站開關作業，產生電火花導致瓦斯爆炸。

湖南運五民用飛機墜毀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十時四十六分。

傷亡、損失情況：湖南省民航局一架編號為八一六七的運五型民用專業飛機在派往沅江縣噴酒農藥返回長沙時墜毀於望城縣谷山鄉一座山上，飛機除尾部外其餘全部燒毀，機上九

人全部遇難（三名機組人員，四名機務維護人員，一名無線電報務員，一名專業助理員）。事故直接原因：機組駕駛人員違章操作，低於安全高度飛行，導致機毀人亡。

四川岷江沉船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重慶輪船公司所屬樂山分公司「川運二十四號」客船，由宜賓上駛樂山，在犍為縣新民鄉蜂子灣岷江中翻沉，全船三百多名乘員只有一六七人生還，至八月八日打撈起遇難者遺體一〇五具，船長和四名船員也遭不幸，許多乘員至今下落不明，直接經濟損失六十多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是人為的責任事故。該船船長不顧洪水季節水情複雜，脫離主航道，走離岸很近的副航道，遇到回旋水流，處置不當操作失靈而翻沉。

四川萬縣雲陽沉船事故

時間：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二十分。

傷亡、損失情況：四川省石油管理局租用的四川雲陽縣長江輪船公司「雲航二十四號」木質機船，載有價值二六〇萬元的地質設備和九十九人，在長江萬縣雲陽江段翻沉，救起二十二個人，死亡七十七人，直接經濟損失二八〇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因操作不當，雙機熄火，船即觸礁，後啓用單機，船頭撞在上行的「萬港拖八〇二」的拖駁首部後翻沉。

通漲：連廣東人也受不了了！

廣東省，一向是被人們稱爲是價格改革最成功，百姓對通貨膨脹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強的地區。然而，今年六月底，像颶風一樣，廣東省颶起一股猛烈異常的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風潮。這一現象表明，連以承受能力強著稱的廣東人，也忍受不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了。

在搶購風勢最猛烈的六月二十六日，廣州市各家百貨公司出現連夜候購日用電器的現象，南方大廈百貨公司當天的營業額猛漲三倍，創二百零六萬元的記錄。佛山的一個農民在玫瑰商場一次就購去冰箱、空調、音響各四套（台）。潮州市一位市民一次搶購了十台洗衣機。肇慶市竟然有些人爲十歲以前的女孩搶購高檔商品留作嫁妝。

伴隨搶購風的是提款風。當日，在廣州市最大的長堤儲蓄所有一位個體戶一次提款三十萬元，而全市的儲蓄存款總額猛降四百五十二萬元。六月底，只有大的儲蓄所還可頂住，小的儲蓄所連門都不敢開。

這次搶購風潮起源於「七月一日家用電器產品和日用工業品要大幅度提價」的市面傳聞。類似的風潮在四月底也出現過一次，那次的傳聞是從五月一日起糧油取消定量供應，實行議價。五月一日是星期天，各級部門力圖封鎖消息至四月底，各企業強令將職工留下一學習

中央的改革步署。職工們從學習中感覺到大事不妙，紛紛提前下班，或用各種方式通知家屬到糧店搶購。勞動節（五月一日）前一天糧店提前下班，可是幾乎每家糧店門口都排着長一條隊，工作人員無論如何也驅之不散，以致個別糧店因排隊群眾不滿意工作人員提前下班而發生毆打漫罵售貨員的事件。一些工作人員根據上級指示，一再向群眾宣佈糧油不漲價。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群眾的判斷是正確的，中共保密再嚴也沒有不透風的牆。果然，從五月一日起食油從零點九五元一斤漲至二點六元，漲幅一點六三倍；三級米從每斤零點一四六元漲至零點三一元，漲幅一點一二倍。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教訓，儘管政府官員一再安撫民心，保證不漲價，六月底搶購風潮仍無法平息。後來事實果然也證實了老百姓的猜測。從七月起，進口電冰箱從三千元升至四千元，二十寸彩電從二千六百元升至四千三百元。漲價不僅僅是家用電器，它波及各個領域：豬肉由年初二點八元一斤漲至四點八元；雞蛋從一點八元一斤升至二點八元；魚從一點八元一斤升至二點八元；奶粉由四點六元一斤升至六元；麪包每條從零點九五元升至一點七元。農貿市場上的菜價漲得更驚人，白菜每斤一元，絲瓜、豆角每斤一點五元，而去年像這類

大類蔬菜單價還很少有超過一元的。美國進口的蘋果要十元一斤，每斤只有兩個，人們戲稱一口咬掉五角錢。

不但日用品漲價，建材也在大漲，鋼、鋁、銅、水泥等都在成倍翻番，連民用磚頭都從原來的每塊零點一二元漲至零點二五元，漲了一倍。

引起搶購風的另一個原因是銀行利息倒掛，官方稱廣東省通貨膨脹率爲百分之十三，而海外專家估計爲百分之三十。而今年上半年銀行活期儲蓄利率僅爲百分之二點四，直到九月份，中央才不得不調整利率。百姓們眼看人民幣在銀行裡「縮水」，自然蒙生搶購囤積的念頭。

在兇猛的漲價風中，政府給每個職工、退休人員補助二十元，教師二十五元。實際上補貼的負擔是由企業背的。有錢的單位可以多發，無錢的單位甚至連補貼也發不起，學校無疑是最窮的衙門，知識分子是最窮的階層。所以，現在廣州人稱：小學畢業賺大錢，中學畢業賺小錢，大學畢業剛保本，繼續深造還貼錢。廣東人急於賺錢，已不願花錢投資學習，成人教育在前幾年十分興旺，可近年來已不景氣，招生標準一降再降，門可羅雀。中國人的短期心理，在此登峰造極，連爲自己本身投資的錢都不願再花。無怪廣東省有人驚呼：十年之後，廣東將無大學教育。

今年以來，官方只是含糊宣稱通脹率爲兩位數，廣東原打算每月公佈物價指數，現已不再作聲。報紙宣稱中國人消費超前，由於房租低，廣東人人均擁有的彩電、冰箱已達人均收入三千美元國家水平。然而，近來聽說房租的改革又要出台，廣東人還有活路嗎？連廣東人都活不下去，那麼全中國人怎麼辦呢？

在新聞被封鎖的背後

農賤

執行關於槍枝彈藥的管理規定，嚴禁武器外傳、外借，除非特殊情況，嚴禁把武器彈藥攜帶家中，等等。

高幹子弟軍火寡頭

已控制總參

軍界一些知情者認為，中共總參謀部已被一伙做軍火生意的高幹子弟控制，其中以鄧小平的女婿賀平為首。這批大軍火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長征二式導彈，連外交部都蒙在鼓裡，使後者在國際場合處於很尷尬的地位。

這些做軍火生意的公子們出入國境根本不需外交部門批准。他們常常乘飛機經緬甸三角地帶進入泰國。一種說法是他們將部分外匯存在泰國，另一說法是他們去泰國嫖妓。實際上兩種可能都有。

第二次中印戰爭

正在醞釀之中

據可靠消息，中共總參謀部最近正向美國波音公司購買十幾架戰鬥直升飛機。試機的表演是在西藏地區進行的，波音公司的飛機引起了總參謀部代表的興趣。內部知情人透露，中共正在準備對印度開戰，以便在價格改革出現險情時，用對外戰爭轉移人民的不滿情緒，並借戰爭特殊期間，在政治上實行嚴密控制，在經濟上壓縮消費。

軍隊老幹部：

八一示威 八七繳械

今年八月一日建軍節即將來到前夕，爲了安撫軍隊老幹部，總政治部和軍委辦公廳於七月一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大大軍區、各軍兵總部廣泛開展老幹部慰問活動，儘管這樣，軍隊老幹部中問題越來越嚴重。據來自國防大學的消息說：現在老幹部鬧的比較厲害的，除了北京軍區還有南京軍區和沈陽軍區。六月下旬，中央讓李德生去沈陽給老幹部做工作，但李德生去沈陽僅五天，又被軍委急電召回。沈陽軍區正師級以上五十多名老幹部集體在軍區大院向李德生請願，由於這些老幹部過去都是李德生的部下，李德生見此狀也有些情緒，當天晚上李德生和這些老幹部一起進餐，沈陽軍區現職幹部只有幾名副職參加，中央怕加深矛盾，故急電李德生返京，幾十名老幹部集體爲李司令員在機場送行。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軍隊老幹部問題嚴重到了何種程度，目前老幹部比較穩定的大軍區僅有福州和昆明兩大軍區。

七月三十日下午，中央軍委、國防部、總參、總後、總政以及北京軍區聯合在中央軍委

二號禮堂召開了駐京機關和駐京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慶祝八一建軍節紀念會。近五百名與會者中有三分之一是離休軍級老幹部。會議進行到一半時，左側的大門突然被打開，衝進來三十名離休老幹部，他們高舉一面八一軍旗，頓時引起會場一片混亂，三十一名老幹部一字排成行站在後面，正在講話的洪學智急忙問：「怎麼回事？」老幹部中，有的鼓掌，有的跺腳，使會議無法進行。原定會後舉行的會餐也被迫取消，與會者每人領取二十元人民幣。據瞭解這次會議內情的人士透露，軍委秦基偉和三部總務部以及其他軍委常委就此事當晚召開了碰頭會。據瞭解，衝進會場的三十一名老幹部只有七名是師級老幹部，其餘全部是副軍級以上老幹部，還有五名是兵團級離休老幹部。這次事件在軍委大院和其他軍隊大院引起很強烈的反響。據消息來源說，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已明確表示：衝會場的三十一人每個人都要在黨的會議上作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軍委紀檢部門要嚴肅查處。

八月七日，中央軍委辦公廳向各軍兵種、各總部下發了一個關於老幹部槍枝管理的補充規定。補充規定強調：今後凡是離、退休老幹部使用過的槍枝，從離、退休即日起，全部上繳，嚴禁以各種借口私人保管，私人攜帶槍枝彈藥。對已離、退休的老幹部由所在部隊有關部門進行一次清查。在職軍隊幹部，也要嚴格

拉朝鮮 扶高棉

媚日本 防緬甸

據消息十分靈通人士介紹說：中央已決定，楊尚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去平壤參加朝鮮建國四十週年，金日成本人深表滿意（原來決定只派李鵬）。經朝鮮方面一再要求，鄧小平講道，還是要給金主席一點面子。金日成向中國提出了不少要求援助的項目，據說總資金高達七·五億蘇聯盧布。楊尚昆此行朝鮮，除了參加建國慶祝活動，還將向金日成提交一份援助項目清單。與此同時，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將對中國進行他的正式友好訪問，胡薩克此行還擔負着為中蘇進一步合解，充當調解人的作用。據透露，越南方面也希望胡薩克為中越關係合解說話。

由於竹下訪華期間，向中國提供了高額資金，中共上層已決定今後對日採取溫和政策。據有關人士透露說，中宣部已通知各大報，對光華寮等問題各報暫先不要做文章；對九·一八事變的紀念文章也要低調處理。有位記者罵道，鄧小平是典型的實用主義和洋奴賣國主義！

由於紅色高棉政權在柬埔寨極不得人心，所以紅色高棉的部隊事實上很難支持這場無窮無盡的戰爭。中國爲了援東抗越，又玩起了過去援越抗美的把戲。令中國部隊潛入東境，換上他們的衣服與越南人打仗。隨着紅色高棉的軍事力量日益消耗，中國人佔比例越來越多，最近已達一半以上。

而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波爾布特現在却在北京，享受副總理級的待遇。不過中共給他「約法三章」，他不能公開活動。

緬甸人民爭民主，反獨裁的鬭爭使國內形勢發生突變，這使中國政府極爲擔心；同時，波蘭團結工會復起的消息也使中國領導人緊張。在北戴河會議和廬山會議上，中共決策層認真地研究了波蘭和緬甸可能對中國發生的影響。一方面在中緬邊境增派了軍隊，另一方面做好大學生的思想工作 and 對市民的服務工作，以防止通貨膨脹引爆炸彈。

用錢堵住學生咀

想拍馬屁拍不成

八月八日，北京市政府、高教局和國家教委開了兩天會議，專門討論如何改善大學生的生活問題。市政府還派出不少武警戰士到北大、清華等重點大學幫助整理校舍，清除垃圾，打掃衛生等。李錫銘、陳希同在聽取匯報時會指示：要提高大學生生活水平，飯堂菜價不得超過五角。陳希同甚至希望學生能吃上七分錢的菜。市經委、計委的領導人當場計算了一下，認爲不可能，七分錢別說吃一個菜，連小半根黃瓜也買不起。如果要落實陳希同的指示，國家每年要補貼一千六百萬。李鵬聽了匯報後也認爲，這樣國家負擔太重。不能用錢堵學生的嘴，還是要堅持長期的思想工作。與會者後來嘲笑說，李書記、陳市長想拍學生馬屁，可惜沒拍成。

防暴機動隊和催淚彈

用來對付誰？

中共當局多次強調，明年是改革最困難的一年，風險極大。爲了防止動亂，預防群眾街頭鬧事，中央決定再組建五個防暴機動大隊，每個大隊建制是準師級（相當於加強團），但對外講是快速部署部隊。這些防暴機動隊除配備直升飛機外，輕坦克、警棍和高壓水車之外，還配有催淚彈。該部隊曾在北京遠郊試驗國產新式催淚彈。雇用了近千名農民，主要是青壯年，每人發十元錢，聚在一個空曠地帶，試驗人員身穿便裝，向人群中投了五十多顆催淚彈，效果極佳。上千名農民頓時淚如泉湧，頭昏腦脹，最嚴重的幾十名甚至休克。專家們當場說：咱們自製的催淚彈，比美國的還強。可惜的是，造福於人民的東西中國沒有美國強，而鎮壓人民的東西却比美國強。

警察與土匪合流

無故抓人打人

據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士透露，現在的治安是建國以來最壞的。犯罪案件大量增加，而警察收入很少增加，所以誰也不努力破案。相反，北京市公安系統已發生五十多起警察和小偷、倒爺合伙作案的事件，有三十餘名警察已被

收審。有的警察專門以抓賭吃賭。大黃莊派出所兩名青年民警，兩年功夫吃賭一萬多元，其中一人還準備提拔為副所長。

消息透露人士對公安局內部的黑暗非常不滿，他認為警察有一半與土匪差不多。中央總說賭博實為危害大，而這幫土匪警察胡作非為對社會的危害比什麼都大。罪犯犯法有警察治，而警察犯法就無人可治了。除穿警服的警察，還有一幫二狗子，都是各工廠不要的地痞流氓，每天這幫人都在街上巡邏，幹壞事比幹好事還多。

由於警察一素質低，二待遇低，所以總在街上抓人打人出氣。北京和平街派出所上半年無故致傷七人。凡是進了公安局的，人人躲不過一頓臭打、臭電（指用電警棍電人），男的專電老二（指男人生殖器），女的專電乳房。石景山公安局今年六月在小樹林裡抓到一對談戀愛的青年男女，巡邏的警察非說他們是亂搞就帶進了公安局，進了公安局先是把男的臭打一頓，女的問他們為什麼打人？當班的警察一看女的挺厲害，又挺漂亮，就當着她男朋友的面用電棍電女的乳房、電女的下身，把女的電得滿地打滾，一邊電還一邊罵：電的就是你這隻小母狗！你不是喜歡硬的嗎？今天晚上讓你受夠了！男的實在看不過去了，乘警察不防把警棍搶了過來，電了警察兩下，一下子衝進十幾名警察，十幾根電棍幾分鍾的功夫就把男的電死了，女的從此得了精神病。警察電死人的過程，旁邊兩個被捕的人看見了，刑偵科長警告他們說：你們出去若是胡說八道，就把你們的老二電斷！這兩個小伙子還不錯，第二天就上市高檢（市高級人民檢察院）告了警察一狀，上邊這才追問。

工人聚眾抗議漲價

警方予以控制性扣留

物價上漲一波高過一波，儘管中央一再強調下半年改革的新方案不會出台，但日益高漲的群眾情緒更加激烈。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北京市建委近期統計，去年下半年以來，北京新建的小紅門、石景山等居民區的房屋，被群眾破壞的十分嚴重。六月中旬，國家建委、北京市建委聯合在小紅門小區召開了一次現場會，現場會召開之際，附近居民和北京木材廠、北京石板廠等不少單位的近二百多名工人圍攻現場會場，抗議物價上漲，抗議房租上漲，由於工人群眾是自發行動，沒有領導組織，所以沒有使事態擴大，但市委仍調去大批公安幹警，十幾名青年工人由於言行過激，被暫時「控制性扣留」（控制性扣留是公安部門最近制定的一項新措施，意思是為了防止鬧事採取的行動，事後馬上由公安部門交還原單位）。

駁外人員窮困不堪

財色失足在所難免

中國駐外公派人員的待遇是很低的，大家很有意見。在日本，一個記者一個月才有四點五萬日元的補貼，其中包括飯費。不久前，在過組織生活時議論了待遇問題，結果挨了一頓臭批，大使挺生氣，批評說誰覺得待遇低，明

天就回去！結果誰也不吭聲了。黨支部選了一條規定：今後任何人也不能再議論待遇問題了！

在美國，中國駐美某公司的副總裁每月才只有三百美金，而且不准帶家屬，他為國家工作，無論做了多大生意，為國家賺了多少錢，或為國家節約了多少錢，都無法享受任何形式上的回扣，他的待遇也許比國內的人優裕一些，但就美國的生活水平來說，領失業保險的人都比他拿得多。在唐人街上洗碗每月都至少八百美金，這樣，既不准帶家屬又沒有回扣，在美國這個美女如雲，金錢如雨的國度裡，和美國人作起生意來，一旦在「色財」兩字上失足，吃虧的恐怕就是國家了。

留學生回國被卡

取消暑假計劃

據幾名最近返回北京的留學生反映，他們回到北京到公安局重新辦理出境手續時，要比過去麻煩得多，特別是將受到公安人員的長時間問話，對此，不少留學生聞訊十分緊張。有幾位較為熟悉的留學生朋友，原計劃今年七月下旬或八月份回國過暑假，由於情緒緊張故取消了回國計劃，大部分主要擔心國內政策變化回國後被卡不允許返回日本。據說不少赴美留學生已被卡在國內。

個體戶盛衰

對當代大陸社會的影響

徐邦泰



作者攝於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白居易

人們往往習慣於從貿易經濟的角度去觀察和研究中國大陸的個體戶的作用和狀況，而忽略了從社會學角度去觀察和研究個體戶的價值。其實，個體戶在中國大陸經過三十八年衰而復盛的歷練，作為市場中最活躍的細胞，它的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毛孔，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豐富，對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對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對農村和城市經濟改革，都起了積極的催化和促進作用。而且，個體經濟力量的壯大，已經在大陸為私營經濟的復興奠定了基礎，開闢了道路。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個體戶的發展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槓桿。

野火燒不盡——

「資本主義尾巴」殘存無幾。
「自由市場」成了「自由」在
中國大陸唯一能苟延殘喘的地方

個體經濟在歷史上出現後，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可謂源遠流長、飽經滄桑。至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個體經濟雖已成汪洋大海之觀，然而一進入社會主義，它就變成了倒霉的「拖油瓶」。經過歷次「興無滅資」運動烈火的洗禮，個體戶作為「資本主義尾巴」被砍剩無幾。但是它仍然存在，並以它的存在證明扼殺它會給中國社會帶來相當嚴重的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宣布：「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本主義所有制……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毛澤東用和平的方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過程在周而復的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裡得到了生動的藝術再現。當徐義德之類的資本家「被迫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後，國營、集體、公私合營和個體戶同時並存，經濟有過短暫的活躍。然而，一九五八年，當毛澤東在反右後大搞人民公社化時，同時大搞所謂「一步登天」，一下子把許多合作商店、合作小組併入國營商店，個體戶幾乎全部被取消。結果，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人民生活極其困難。

瀋陽市一九五七年全市飲食業的網點有二千八百九十二處，一九六一年減少了百分之八

十五。瀋陽中街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修鞋點減少一半，自行車修理點減少百分之七十，出現全市性的吃飯攤、修鞋攤和修車攤弄得沒飯吃了的局面(1)，於是，來一個國民經濟調整，個體戶又復甦了。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中個體戶則變成了挨刀的「資本主義尾巴」。

一九四九年以來，直至粉粹四人幫時為止，城市個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被排斥的。其間，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由於各種經濟成分並存，個體工商業和個體手工業（包括農民兼營商品性手工業）就有三千多萬人，較好地發揮了個體經濟成分的積極作用。個體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一般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二階段，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六年對個體手工業和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大批個體手工業和小商小販加入合作社，進入國營企業或轉入農業生產，到一九六一年，全國城鎮僅有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四十三萬人。經過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一九六二年，個體經濟的從業人數又上升到三百萬人。第三階段，「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極左路線的干擾、破壞，全國個體工商戶僅剩下十五萬人(2)。

就這樣：三千萬——四十三萬——三百萬——十五萬，十五萬人在中國只是右派分子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已(3)，真是比右派還要「一小撮」。但是，首先，這個發展過程說明處於非法地位的中國大陸的個體戶猶如夾縫中的野草，有着頑強的生命力，最後並沒有被「斬盡殺絕」。即便在「四人幫」的基地——上海，一九五七年個體戶達十萬之多，幾經折騰，在一九七六年仍有八千多人(4)。這一事實，證明了

這麼一條馬克思說過的道理：無論哪一種生產關係，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對不會滅亡的。

其次，我們可從這段歷史中省悟出這麼一條規律：在中國大陸，經濟稍有好轉，日子一好過，就會有人熱衷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於是，民生塗炭，四海遭殃。一直要折騰到差一點沒飯吃了，才會歇一口氣，寬鬆一陣子。個體戶隊伍亦會應運而壯，自發地幫助社會經濟復甦。正是鑒於這個道理，中共高級幹部陳雲認為「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並主張「攤販等更要長期讓他們單獨經營。」(5)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個體戶在中國的發展正好同城市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和人民公社化的發展成反比。公有制越是鋪天蓋地，個體經濟越是萎縮一隅。在十億人口的泱泱大國正嚷着要「窮過渡」時，只有十五萬人艱難地在「私有制」的夾縫中討生活。

除了以上三個特點外，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會看到，以個體戶為代表的個體經濟在中國的流弊，給中國大陸社會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

第一，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是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它的不完善決定它不可能包羅一切地滿足社會需要，個體經濟的被窒息，使整個社會喪失了唯一能夠搶補補缺的力量。吃苦耐勞的中國人民陷入極其簡陋和不便的生活環境之中。以廣州市民吃飯為例，一九五七年以前，全市各種經營成分的飲食網點有五—三四戶，一九六三年減至一五—二九戶，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到一九七七年只剩下五—二三戶，比五七年減少了百分之九十。而五七年以前全市只有一二〇—一三〇萬人口，而現

在却有二百多萬人口(6)。全國各地城鎮居民的生活一切有賴於定量配給，不吃商品糧的農民的生活則更慘，一生鞠躬盡瘁，若逢天災人禍，只有餓死而已。



流入城市行乞的農民

第二，公有制的包羅萬象，使人人都被禁錮於一個個「單位」之中。檔案、工資、配給、戶口……加上大大小小「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使中國真正地變成「十億人民十億兵」。只有十五萬人是沒有單位的個體「游民」。個體經濟的被窒息，使得中國社會結構更趨於集權化、軍事化。「十億人口，不鬪行嗎？」（毛澤東語錄）於是，一次次運動，七、八年來一次，每個中國人必須在「單位」裡廝殺。

不是整人，就是被人整。離開單位等於受到最嚴厲的行政處分，意味着丟了飯碗。不管怎樣冤屈，人們都不敢丟棄「鐵飯碗」去幹個體，因為那比「上山下鄉」還沒保障。而且，即便憤世出家當和尚，亦非得經過黨的領導批准才行。這種社會結構也許正是最高領袖所喜聞樂見的。

第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個體經濟的被窒息，促使整個社會文化專制主義泛濫成災。「普天之下，莫非黨土。」「黨土」上的作家都應是黨的作家，「黨土」上的報紙都應是黨報。沒有個性，不容異見。在「百花開放」的年代裡，樣板戲亦要由單位包場，百看不厭(7)。上海郊區有位民間演員，自作多情，為普及革命樣板戲，個體幹了一下，孰料因動作不規範，獲歪曲破壞革命樣板戲罪，撞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上，成了又一隻做猴的鷄。在當時，因講錯一句話而毀掉一生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知識分子一個個噤若寒蟬，唯有沒有絲毫非組織性的言行，才有可能苟全一生。

第四，個體經濟的被窒息，使中國公有制經濟完全失去彈性和活力，進而陷入停滯不前的泥潭。我們只要比較下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間三千萬個體戶與其它各種經濟成分並存時的經濟局面，和一九六二年後個體經濟復甦對國民經濟恢復的作用，以及「文革」期間公有制經濟壓倒一切後的「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的史實，就不難看出，本來就毫無競爭性的官廠官商，一旦連僅存的一點個體經濟的外部刺激因素都消失後，「大鍋飯」就弊端畢露，令人一籌莫展了。

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連自然生態都有個平衡的問題，更何況社會經濟的影響了。「文革」的史實告訴我們，當全

國上下緊跟紅太陽「團私批修」猛攻資本主義尾巴時，中國城市與農村失去了千千萬萬條自然溝通的個體經濟渠道，血脉不通，整個國民經濟浮腫、淤結、混亂不堪。幾億公社社員像農奴般勞動終年，甚至一天僅獲一角或幾分人民幣的工分之後，唯一可以戰戰兢兢去享受的「自由」是到「自由市場」去用幾個雞蛋換點錢。儘管「自由市場」的存在也並不是很有保障，「自由市場」還是成了「自由」在中國大地上唯一可以苟延殘喘的地方。

春風吹又生——

個體戶發展之迅猛，

真可謂無意栽柳柳千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8)後，中國社會開始歷史性的轉變，個體戶在關心不多、關卡不少的情況下衰而復盛，幾經周折，迅猛發展，並對中國社會物質生活的豐富，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逐步解體，對社會文化傳統的改變，對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進行，都起了積極的催化作用。

四人幫期間，一再引用列寧關於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寄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論述」，來作為個體經濟必然產生資本主義的理論根據。列寧的這一論述，在新時期得到了新的解釋。理論家們指出並強調，只有在貨幣轉化為資本、勞動力能成為商品的情況下，個體經濟才能產生資本主義。

經過八、九年的發展，個體戶已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上海街頭，鱗次櫛比的攤頭，摩肩接踵的人流，穿街過巷的

吆喝聲，都顯示了個體經濟的空前繁榮。上海工商管理局的最新統計告訴我們，到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個體戶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五十年代，接近十萬戶，從業人員十四萬，比歷史上個體戶發展最鼎盛的一九五七年還多四萬人。」(9)如果我們放眼全國，到一九八七年六月，個體戶已達一二八萬，從業人數為二十萬(10)，加上私人企業「從業人員三四五·九萬人，加上近一千萬個無照經營者」(11)，總數應在三千五百萬以上。這已經超過了一九四九年時全國從事個體和私營經濟的三千萬人數。

不需多久，個體戶和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就會超過中共四千三百多萬黨員的數目。從一九七六年的十五萬個體戶迅猛發展到今天的三千五百萬個體和私營經濟從業者的歷程已向我們顯現了以下這些特點。

第一，個體戶的興起，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必然。所以，個體戶能屢挫不餒，具有野草般強盛的生命力和繁衍力。對國營廠長經理來說，無非是婆婆太多；對個體戶來說，則是廟神太多。正如有個體戶說的那樣：「除了戴黑箍的，所有胳膊帶箍的全管我們。」(12)「我們有兩個爺爺(工商、稅務)、八個爹(環衛、交通、公安、衛生、計量、物價、城管、街道)。」「是誰都管，誰都不管；要錢時管你，解決問題時不管你。」最慘的是政治上乍暖還寒，一有風吹草動，不少個體戶免不了會變成墊刀頭。一九八三年開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按上方指標，上海可抓十萬人犯。竭盡全力，多次拉網，前後共捕「魚」六萬多條。落網者不少是個體戶。因為，一開始幹個體戶的大多是勞改、勞教釋放人員，稍有不軌，他們便會被從快從嚴從重地處理到青海去。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四年前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一九八七年前後），打擊刑事犯罪，打擊經濟犯罪……個體戶每次都成爲基層社會最遭風險的一個階層，儘管這樣，在大氣候尚向好的情況下，個體戶還是如同野草一般漫山遍野地綠化了大地。



第二，過去個體戶僅限於小修小補、小買小賣，今天無論是經營範圍、經營規模都已非昔日可比。上海個體戶從事的行業已遍及全市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飲食業、修理業、房屋維修業等各個行業，裝備也大都「鳥槍換炮」。以上海個體運輸業爲例，擁有小轎車、大客車的姑且不論，僅擁有機動船和包括拖拉機在內的貨運車時，少說也有上千戶。蘭州市西關什字有家牛肉麪第一大戶，從四角一碗的

牛肉麪經營起，一九八七年來，舖面從兩間擴大爲十幾間。這位「暴發戶」爲捐建清真大寺，一下就拿出一六〇萬元人民幣，可見其財力已相當雄厚。大連有名的三十歲的司機張忠柱，停薪留職兩年幹個體，從幹運輸到辦採石場，僅僅一年，他就發展成有大小汽車二十多輛，固定資產一一七萬元，雇傭工人二一七名的百萬富翁。這些事例證明，個體戶不再是拾遺補缺的成分。它有着蓬勃的旺盛擴張力。只要不多加限制，它就會應社會需要創造出奇蹟。

第三，由於政策多變，個體戶大多抱着撈一把是一把的心理，短期經濟行爲比較嚴重。無錫市曾對一二〇名個體青年調查，準備把個體行業長期幹下去的佔百分之三十一，而幹着瞧和臨時幹一陣子的佔百分之六十四。於是，坑蒙拐騙，以次充好，哄抬物價，見利忘義，賄賂幹部的事時有發生。根據上海、遼寧、江蘇等地的調查，個體戶中隱瞞收入、偷稅漏稅的至少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地區高達百分之九十。上海市南市區一九八五年對一三二四戶進行檢查，偷稅漏稅的有一二〇一戶。現在個體戶有「十怕」：一怕政策變，二怕稅收高，三怕「婆婆」多，四怕露富，五怕刁難，六怕市場變遷，七怕多頭攤派，八怕白吃白拿，九怕開會學習耽誤賺錢，十怕拆遷重新開業。

第四，中國社會歷來講「仕農工商」。到毛澤東時代，則講「工農兵學商」。商始終處於末流，小商小販則更不登大雅之堂。所以，個體戶雖然興起並有益於社會，却所免不了遭受社會的歧視。有的個體戶說：「舉目四望，四處多是白眼和紅眼。」醫療成問題，連子女進托兒所、幼兒園都有困難。更有不少人認爲

：「無商不好」，「稱桿一拿，不好也滑」。筆者曾問過十名中年人：「假如你未來的女婿或兒媳是個體青年，你同意嗎？」有人回答：「堅決不同意」，二人回答：「實在他（她）本人願意，我也沒辦法。」於是，不少個體戶表示：「我都看不起我自己。」

在中國大陸，雖然人們對個體戶毀譽參半，甚至長期生活在商業環境中的上海人不少也對個體戶持輕蔑和妒嫉態度，但是，個體戶之發展對社會生活的重大影響却是不容否認的。

首先，個體戶給社會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和豐富。一九八四年前還困擾上海居民的「吃飯難」矛盾，一九八七年已解決，其功勞當首推二萬多位飲食個體戶。一九八七年夏天上海西瓜價廉物美，全市西瓜銷量的三分之二是靠個體運輸戶從四面八方運入市區的。一九八六年上海市區組家俱總銷量的六分之一是由個體戶提供的。全國個體工商戶的商品零售額達四七九億元，佔全國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百分之十一。二；個體經營網點八七〇萬個，佔社會網點的百分之八一。六。個體戶對社會的功勞已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個體戶的經濟活動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這一點是人們不太能留意到的。鄧麗君歌曲盒式磁帶曾風靡大陸，黑鏡和牛仔褲都會遭受正統派共產黨人的攻擊過，在今天的大陸，這已經事過境遷了。但論功勞，還不是那些走南闖北的個體戶，把西方的一些文化生活方式傳播到中國大陸的各個角落。所以，筆者認爲，鄧麗君小姐若去大陸探親，應當首先爲個體戶演唱一場致謝，那才算公平。

據說，北京人沒有不敢講的，廣州人沒有不敢吃的，而上海人沒有不敢穿的。新款式、

流行式，往往在上海問世，再波及各地，上海南京路一家頗有名氣的服裝店經理透露，他們店所以服裝款式變化快，一個重要的「秘密」是：他們與華亭路上的服裝個體戶交上朋友，共同預測服裝的流行趨勢。華亭路上的個體青年信息靈、動作快。他們說：「我們是坐在小攤下，放眼海內外。」只要是海外流行的，電影、電視上出現過的服裝，不出三五天，華亭路上準有貨。因此可以說，上海的個體戶領導了中國服裝新潮流。

平均主義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從孔夫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歷代農民起義領袖們的「均田免糧」，近代孫中山的「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直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大鍋飯」吃了幾十年，中國人似乎都覺得三個和尚都坐着沒水喝是天經地義，有一個和尚去挑水沒均着喝就大逆不道。這種觀念磨光了中國大陸人的進取心和創造性，所以中國沒有哥倫布，沒有馬可·波羅，沒有「西部牛仔」。而今湧現一大批個體戶走南闖北，一下子「爆發」了，讓人「紅眼」了，這實在是對平均主義傳統的有力衝擊。個體戶的興起起碼向社會證明了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只能造就一批庸人和懶人。社會應提倡起點上的平等，即法律上、競爭上的平等，而不是終點上的平等、分配與財產上的平等。人們盡可以瞧不起這些「三等公民」，但是「三等公民」的富有却是令人羨慕和妒嫉的。上海的個體戶雖然在政治上尚不能有所要求，但他們早已經用出入上海賓館等大飯店與外國人同享「高級生活」的方式，來證實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不應當低人一等的。

第三，當有三千五百萬個體戶在中國大陸社會活躍時，我們還會發現，原來高度集權和

軍事化的社會結構已經在逐漸解體。任何人一旦離開「單位」，還會有活路，可以去幹個體戶。人能擺脫奴隸般的依附，這該是多麼大的一個進步。社會上流傳的一句民謠：「工人貧，農民富，不三不四萬元戶。」這至少說明國營工廠在經濟上不再具有多大的魅力了。這裡所說的「不三不四」即是指勞改、勞教釋放人員和受過各種行政處分的人。據上海市個體勞動者協會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的一份「關於對個體工商業戶進行法制、法規教育情況匯報」顯示，盧灣區淮海街道有個體工商業者三四五人，兩勞釋放人員八六人，受過各種行政處分的一五八人。「不三不四」竟佔了百分之七〇·七。依「文革」時的觀點看，這是「牛鬼蛇神成堆」，「階級隊伍嚴重不純」。

當然，隨着個體戶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隨着十億人口的中國越來越無法由國家包攬每年有四、五百萬人的就業包袱，整個個體戶隊伍中的人員比例已發生很大變化。現在僅青年已佔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待業人員、退休職工和辭職人員的總數已使二勞釋放人員處於少數。不少各行各業中的不甘寂寞、不甘貧窮的「高分子」辭職或停薪留職幹個體戶，使得原先死板的社會結構中的人員開始流動。上海評彈團中年評話演員朱慶濤已經成為上海第一個文藝個體戶。這種流動大到一定程度，便會使高度集權和軍事化的社會結構趨於解體，並呈現活力。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第四，個體戶的興盛對中國大陸農村和城市國營經濟的改革產生了十分有力的影響。中國社會農業中的個體經濟問題還被當作理論上的禁區，因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全面完成，一提倡體經濟就會被認為是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成果。在分析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時

，理論家稱它是集體所有制下的個體勞動方式，也即具有集體所有制內部個體經濟因素的兩重性質。我們不妨稱之為中國式的「半集體半個體」經濟。如果沒有個體戶的活躍和溝通，這種半集體半個體經濟也難以展現它的優點，而這種半集體半個體經濟的發展，又成了個體戶力量壯大的有力後盾。

自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農業勞動力淨增了一億二千萬人。全國人均佔耕地從三點七畝減到不足一點六畝，加上「以糧為綱」，其它砍光，經營範圍狹窄，勞動力出路問題日益尖銳。這樣，個體戶經濟就為這些剩餘勞動力廣開了財路，而這些勞動力的加入又大大壯大了個體經濟的力量。比較而言，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和個體經濟的興盛已經在各方面向遲到的城市經濟改革提出挑戰。北京三里河蔬菜市場的格局是「正規軍」的地盤漸被「蠶食」、在縮小；「游擊隊」步步緊逼並安營扎寨——這裡濃縮着北京市市場變遷的歷史。農村的半集體半個體經濟和城鎮的個體經濟已經對城市國營經濟形成一種包圍之勢，這是一次經濟上的「農村包圍城市」①。國營經濟被迫開始承包經營等改革嘗試。

自由不能化——

私營經濟的崛起

會不會迎來第二個「上海的早晨」？

個體經濟壯大的直接結果是為私營經濟開闢了發展道路。

一九八一年七月頒發的國務院「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限定，個體

戶中「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¹⁷⁾

理論家們曾一廂情願地解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體經濟不會產生資本主義。但是，統計表明，到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已有雇工超過標準的私營企業二十八萬個，從業人員三四五·九萬人。他們的資產已超過一九五六年對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私營企業二十二億元的總資產。福建省有一家林氏三兄弟辦的私營工廠，僅僅五年，固定資產就達八百萬元。

一批新興的「紅色資本家」興起了，天津的韓文光因家境困難，一九八一年領個體營業執照，五年竟盈利十七萬元，目前已與外資合資成立了有限公司。他春風得意，當選市場勞動模範、區政協常委，正要加入共產黨，報批時，因「雇工就有剝削，有剝削就不能入黨」而被擱置起來。遼寧省一個個體青年，雇工二一七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青年，團員三十多名，由於企業中沒有團組織，致使這些團員都無可奈何地「自動退團」了。擁有八百萬資產私營廠的林金豆直言不諱地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雇工生產肯定存在着剝削。這不應迴避也勿須粉飾。但是，應該看到，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其他的剝削現象。如果說不通過等量勞動交換而佔取他人勞動即是剝削的話，那麼，吃「大鍋飯」，幹和不幹一個樣，不幹的人就是靠剝削幹的人的勞動而過活的。以權謀私更是非法佔有社會勞動。雇工勞動比起這些現象來，除了有消極的一面外，還自有其很大的積極作用，它推動了生產力發展，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林氏話雖這麼講，還是不敢直言工廠的私營性質，他看得很透：「領導人的表態不等於政策，政策又不等於法律。企業只能

靠法律保護。只要國家法律沒有對私人資本作明確的肯定，我是不會戴什麼紅色資本家的帽子！」⁽¹⁸⁾

令人慶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三十八年，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和「窮過渡」不成後，終於悟出：我們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講：「在初級階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以按勞力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這一下連一批老的資本家代表都大受鼓舞。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的孫起孟等六位副主席聯名提議：「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私營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政策，當前亟需加強對私營經濟的情況調查和理論研究，以此為基礎制定相應的政策、法律，並盡快建立行業性或地區性的私營企業組織，使其有效地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善。」⁽¹⁹⁾

歷史似乎同中國共產黨開了一個玩笑：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年為改造私營經濟真是夠絞盡腦汁、煞費苦心了。如今在新的形勢下，「老革命遇到老問題」⁽²⁰⁾。對付這種嚴峻的課題，又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了。好一個「一定程度」。一開始允許個體戶發展時，也是講「一定程度的發展」。「一定程度」的個體經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私營經濟，而「一定程度」的私營經濟又一定會產生「一定程度」政治上民主變革和生活上現代化的要求。倘能一帆風順，那倒也簡單。問題在共產黨畢竟是信奉「消滅私有制」理論的。因此，某老前輩觀察深圳後痛哭失聲，不少人對溫州模式的非難，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等，都顯示了反對勢力的強大⁽²¹⁾。儘管鄧小平信誓旦旦，保證香

港九七後實行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趙紫陽總書記又鼓舞人心地預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會長達百年，但是，老百姓有理由問：連那麼有能耐的毛澤東都無法保證「一年不變」，誰又能擔保五十年、一百年不變？趙紫陽自喻正摸着石子過河，究竟能否到達彼岸？私營經濟的崛起一定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迎來第二個「上海的早晨」？在第二個「上海的早晨」裡，中國共產黨是對私營經濟進行再改造，還是幫助它繼續發展？最新消息報導，為加強對個體的領導，除建「個體勞動者協會」外，已建立五百多個「黨支部」和兩千六百多個「團支部」。有關部門頒布打擊投機倒把的十三條條例對個體戶活動又有新的限定，當然，這些還不足以表明政策的重大改變。

「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只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個體戶在中國大陸三十八年的衰盛史和影響已經引起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小說家們的研究興趣。因為個體戶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單單起「搶遺補缺」作用的經濟成分，它的存在已成爲中國社會變革增加了活力和潤滑劑，並且還證明了：任何政治強權都無法長久扼殺一種順時適勢的生產方式而殘民以逞。只要人民不停止對民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社會生產力終究是要向前發展的。順其者昌，逆其者亡。無論對誰，都是一樣。

（本文系作者在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屆年會上作的報告，選自「大陸知識分子論政治社會經濟」一書。）

蛇口風波刮到美國後

李三三

讀了「人民日報」海外版關於蛇口風波的報導，很是興奮。這種報導打破了「人民日報」以往的一貫性官腔，使它不再僅僅是官方宣傳的工具，也成為讀者瞭解目前中國國內動向的渠道。我應祝賀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編輯們，爲了他們使人民日報有了一些生氣。

「蛇口風波」中所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須正視的，即在許多舊的道德觀念瓦解後，什麼是對人民、對國家有利的新的價值觀。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李燕傑等人組成的青年思想工作團與蛇口青年發生了相當重大的分歧。有分歧才有討論交流的必要。在此，我想就人民日報海外版今年八月六號刊登出的李燕傑、曲嘯等人的發言進行一些評論。

在蛇口青年說淘金者對美國西部的建設開發所起的作用後，思想工作團成員之一彭清一先生說：「美國姓資，我們是社會主義。」在我看來，有些人因進行創造而感到幸福，有些人因發財而感到幸福。相信社會主義的人工作好時會覺得自己爲共產黨做了事；相信上帝的人則會覺得自己對得起上帝或佛祖，死後會進天堂、成仙。還有沒什麼信仰的人可能僅爲工作好了賺得錢就多，花起來可隨意些而覺得痛快。只要這些人是在法律範圍內努力工作，創造財富就都應受到社會的承認和鼓勵，他們都

是好公民。在這層意義上講，姓資還是姓社不大妨事。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前，社會主義的信徒們從理論上講，得純化到一點物質慾都沒有了時才可被黨信任。而那些爲了其他信仰或僅爲財富才努力工作的人則被共產黨視爲階級敵人。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生產積極性被遏制下去，階級鬥爭被人爲地製造出來。彭清一說美國姓資，我們不能與之相比是用簡單化、公式化的方法來迴避對於實質問題的討論。實質問題是如何調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到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彭清一在別人發表觀點後問：「我不敢將姓名告訴我？」這種作法明顯地是不懷善意。至於後來出現的內部報告，更說明彭清一、郭海燕兩人的抓別人小辮子的作風。記名字、打小報告是文革中整人的一把快刀。今天，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已不再是抓階級鬥爭了，但在一些人的頭腦中仍然存在著整人意識的殘餘。郭海燕爲自己辯護說她只是向上級部門打報告，她有責任向上級反映那位發言青年的錯誤思想。她的看來理直氣壯的理由實際上是非常荒謬的。她如果指名道姓地在報紙上將那位青年的觀點披露出來，那是光明正大的，因爲別人可以知道她說了什麼，也可以寫文章與她辯論。向上級報告，被報告的人則沒有機會申辯，只能處於蒙在鼓裡，被動挨整的地位。郭海燕

自認爲打別人的報告是天經地義的，這說明她的思想方法仍是文革時期的。

李燕傑先生在報紙上說，他在蛇口風波中表現得有度量。他寫了下面的詩句自勉：「寵辱不驚，看坐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碧空雲卷雲舒。」這詩句看來挺美的，可細回味，其中有很多遁世思想。由此看來，青年思想工作這塊招牌不是好打的。他還講道，很多人給他寫信爲他抱不平。政法學院的一些學生還要出面幫他打官司，但被他謝絕了。其實，如果不再來一次「反精神污染」那樣的運動，他的官司是沒有什麼打頭兒的。

李燕傑講他自己不是專家教授，不是爲了名利才搞青年工作的。可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根據正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名利是不可追求的。實際上，名利只能歪打正着。一個人得大講不圖名利，名利才會落到他身上。就李燕傑先生來說也是如此。據瞭解內情的前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說，李燕傑本是那兒教中文的，後因從事青年思想工作，常到外邊去講演，才被胡喬木先生點名提拔爲「德育副教授」的。這個頭銜是爲他一人特設的。

李燕傑問讀者他家還有個二十八歲待業的女兒有誰知道。可問題是有誰應該知道呢？以前，工作都是由國家統一分配的，誰沒有工作，可以怪國家。現在多提倡自謀職業，李先生

的女兒謀不到又能怪誰呢？李燕傑還說他每講一次德育講座，取酬上百元是不應成問題的，但他分文不收。說這話就好像一個警察自己誇自己不偷東西。在中國講德育本不能取酬，否則就犯了最嚴重的表裡不一。李燕傑講了他自己的幾個堅持，及蛇口那些青年的五個不對。他那些堅持，聽來很像共產黨的「四個堅持」；他講別人路線不對、觀點不對、手段不對等。要在文革時期，用了這些詞句就等於說那些青年是現行反革命。年景不同了，這些詞句讀起來很是生硬，不合時宜。說來李燕傑和工作團另一位成員曲嘯都是在文革中受排擠，受迫害的。可悲的是有些時候，被迫害者的理想並不是打破那種迫害人的制度，而只是希望自己能在這個制度中改變一下身份，由被迫害者變

為享有特權的人。這種心態是一個社會在爭取向民主和自由邁進的過程中須謹慎提防的。

李燕傑和曲嘯等人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的言論使讀者覺得，他們沒有把與蛇口青年的座談會看作是一種討論和交流，而是先將其看作是一個教授的場合，後又將其視為一場政治鬭爭。彭清一的質問姓名，郭海燕的打報告都證明如此。再看看曲嘯說的話：「對於那些少數別有用心專事製造謠言、挑撥是非的人，我們還想奉告一句……」這話說得未免太帶火藥味了。他們幾個人的職位、身份和地位都不會因為蛇口青年發表的觀點而受到半點影響，何必那麼殺氣騰騰呢？其實，因觀點而有可能受到打擊迫害的並不是李燕傑、曲嘯他們幾個，但在那兒大鳴冤屈，鬧着要打官司、給別人扣大

帽子的却是他們。這樣一來，除了那些隨時準備站出來維護「正統」與「師道」的人支持李燕傑他們外，那些信仰學術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們只會覺得李燕傑他們太霸道，太愛搞鬭爭、打棍子了。

目前，在中國，道德問題是一個值得引起更多重視的大問題。中國人即要擺脫毛澤東、「四人幫」的階級鬭爭道德哲學，又得小心不陷入「拜金主義」、唯利是圖的市儈道德。這是在改革開放階段中國人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如何使中國人變得更加勤勞、智慧、勇敢，及更富於人性，是一個重要而困難的課題。這個問題只能靠大家一起來關心、來討論。單靠幾個「德育教授」、青年思想工作專家來講道，其結果必然是鬧着要打官司。

「來去自由」才是明智選擇

曾 毅

中國音樂學院宣佈保證國內外出色的藝術家在時間、地點上來去自由的「政策」後不久，許多人聞訊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表示了到該院工作的願望。以作曲系為例，幾乎所有既有成就又在近幾年赴歐美國家攻讀博士學位的青年作曲家，都欣然許諾願為該院的教學盡力。該院對他們提出的各種前提條件（如每年一半時間在國外、一半時間在國內工作等等）一概應允。院長李西安最近對記者說：「中國音樂學

院可望在幾年內擁有一支國內任何單位都無法匹敵的作曲與教學隊伍。

近年來，「出國熱」現象越來越多地引起社會各方的關注，人們的爭論大都圍繞着「該不該走」和「應不應該回來」而展開，而對「走後利弊究竟如何」和「如何吸引他們為國服務」却較少涉及。可是，在「對培養他們的黨和人民負有何種責任」的爭執未見分曉時，很多藝術家在國外以自身的成就及對國內藝術界

的幫助而為國家作出了貢獻。他們大都期待着國內制訂對事業有利的建設性政策以便於他們更好地發揮才能，更多地報效祖國。

在藝術上，這些藝術家出國的共同收穫是：（一）走向世界舞台。湯沐海留學聯邦德國，得到當今世界指揮泰斗卡拉揚的賞識，應邀任世界一流樂團——柏林愛樂樂團客座指揮及另一大師伯恩斯坦在慕尼黑黑助理，也成為歐洲幾個樂團的常任或客座指揮。鄧韻，以她超乎尋常的才智成為世界一流藝術家出入其間的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的女中音基本演員。（二）擴大世界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作曲家譚盾，今年初在紐約著名的林肯藝術中心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長城」等樂曲多用中國樂器演奏，獨唱、獨奏演員全部是中國人，中國風格、韵味自不待言。（三）多方面的進修開闊了他們的藝術視野，憑實力

今年一月十三日，深圳蛇口舉行了一場「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出席座談的有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報告員李燕傑、曲嘯、彭清一三位同志和蛇口近七十名青年。對這個座談會，新聞媒介曾廣為介紹，至今餘波猶存。儘管對這次對話褒貶不一，有一點却是共識：它的意義已經超出了風波的本身。

筆者於七月上旬和中旬，分別在北京和深圳，採訪了李燕傑、曲嘯、彭清一、袁庚等各

「蛇口風波」問答錄

會憲斌

方有關人士，就讀者關心的問題請他們各抒己見。為使讀者得到客觀、公正的事實，筆者將採訪的答問實錄分幾個問題報導如下，其中的事非曲直，讀者自會判斷。

這次座談會是「突然發難」嗎？

問：不少報刊在報導這次座談會時，說三位報告員「認為這次座談會上有的青年『突然發難』，把座談會開成辯論會」，並且「把會

議引向邪路」，實際情況如何？

李燕傑：說這次座談會有點「突然襲擊」，我想不過分。當時蛇口區請我們參觀浮瑛玻璃廠，根本沒有提要開什麼座談會。據說這會是蛇口區團委主持的，可是當天陪同我們參觀的市團委書記也一點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飯，說是請我們去坐坐，却看見「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的海報，我想這至少是不禮貌的行為。我們幾個為了不讓青年人坐蠟，就進去了。

荆躍（現招商局蛇口培訓中心副主任）：

在座談會前兩天，我曾向燕傑老師提出過，到了蛇口後與青年們見面，他沒有表示反對。

謝鴻（蛇口區團委副書記）：當時我們團委是受培訓中心的委托組織這次座談會的。至於幾位老師會前不知道，我想並不重要。既然是青年教育專家，來到蛇口，和青年見面，談一談，不是很正常的事麼？至於說有意準備好要為難幾位老師，這是絕對沒有事情，有兩點可以證明：一是參加座談的青年，包括

發言的幾位青年，都是自發而來的，二是我們連錄音也沒有準備，就是為了讓氣氛隨便些。

曲嘯：開始是謝鴻主持會議，請李燕傑和我談了來到深圳和蛇口之後的感想。我和其他幾位來到深圳、蛇口時間都很短，感受最大、最深的是巨大的變化。深圳由幾年前只有二萬人的邊陲小鎮崛起為幾十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一九八〇年工業產值是六千萬，而現在是五十七億六千萬。這證明了黨的特區政策的正確，反映了特區勞動者的功績。我和燕傑同志為特區建設者感到自豪，特別是為特區的青年人



感到驕傲。就這樣，燕傑談了「美的風光，美的心，美的山河，美的人」，我讚美了特區青年不是斷了綫的風箏，而是騰飛的銀鷹。我現在也不明白，這樣說有什麼不好，怎麼就叫空洞？

彭清一：曲嘯老師發言後，坐在門口的一個青年說：「希望三位老師能和我一起討論一些實質性的問題，不要講些空洞的說教。你來說深圳的人有建設者、創業者，也有淘金者，請你們解釋清楚什麼叫淘金者？」開始氣氛還算平穩，後來我們的發言經常被打斷，我看

很不正常。

謝鴻：其實類似這樣爭論起來的座談會在蛇口是司空見慣的，比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這次座談會後不久，溫元凱來到這裡搞了一次對話，那辯論的程度比這次要厲害得多，可大家都習以為常。這裡的青年思想活躍，敢想敢說，並不是要跟哪一位過不去。而三位老師的觀念有些與蛇口人實在想不到一塊，多提了幾個問題是毫不奇怪的，沒想到幾位老師把問題看得那麼嚴重。事後大家都議論說，這幾位老師可能是在內地總是聽到掌聲、歡呼聲，不習慣這種討論問題的方式。

會上爭論了哪些問題？

問：在這次座談會，究竟在哪幾個問題上發生了觀念上的衝突？

曲嘯：首先爭論起來的是關於淘金者的問題。我在發言中確實提到，有個別人來深圳的目的，就是爲了在別人創造的財富中撈一把，我認爲這就是極少數的淘金者。「蛇口通訊報」用了一個顯赫的標題：「蛇口：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一次激烈交鋒」，而我現在也不承認，我的觀念在哪裡陳腐了。我認爲內地有少數青年到深圳、蛇口來，目的不是爲了創業，建設特區，而是圖這裡的生活好，工資收入多，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他們就不肯來。我把這類人當作淘金者，並認爲特區不歡迎這樣坐享其成的淘金者，這有什麼不對的呢？

彭清一：有位青年說：「淘金者有什麼不好？美國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機者的活動發展起來的。」美國是美國，怎麼能和我們特區相比呢？美國姓資，搞的是資本主義，我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特區。兩者沒有共同之處，我

們不能用資本主義開發西部的辦法搬來建設特區。

李雲忠（蛇口招商進出口貿易公司青年）：曲嘯他們在這裡談「淘金者」肯定沒有市場，當時在會上我就講了這樣的意思：我們到蛇口深圳來爲什麼不可以賺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過錯，「淘金者」來蛇口的直接動機是賺錢，但客觀上也爲蛇口建設出了力。就如個體戶開餐館，他們目的是謀生、賺錢，但是他給國家上交稅金，方便了群眾。這樣的「淘金者」有什麼不好？我很贊賞「蛇口通訊報」一段話：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澆鑄。

余昌民（蛇口經濟發展研究室主任）：我們對曲嘯關於「淘金者」的議論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經濟特區，想賺錢能賺錢被認爲是有才能的表現，這是歷史的進步，表明自然經濟、產品經濟被商品經濟替代之後價值觀念的變化。

郭海燕（師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外國青年研究室主任）：我隨幾位老師參加了這個座談會。我認爲除了「淘金者」問題外，個別青年在幾個方面就是有明顯的錯誤言論。如有個青年說：「我們這個地方比較自由，山高皇帝遠嘛！我罵你們幾句，也沒有會來管我的人，我的香港老板更不會炒我的魷魚。你們說要爲祖國做貢獻，我自己流血流汗賺的錢就應該我自己享受，爲什麼要給別人？」更有位青年說什麼：「報上那些宣傳我們非常反感，說什麼深圳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實有什麼中國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國的特色！它的建築、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構造、它的企業經營方式，完全和外國一樣。有中國特色，就說有中國特色，沒有中國特色，就不要編造出一

個中國特色來。」

魏海田（「蛇口通訊報」記者）：除此而外，還可以例舉三個方面的不同意見：一、有位青年教育專家認爲應大力提倡「有許多個體戶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獻給了國家，辦了公益事業。」而蛇口青年認爲「左」的陰影徘徊下的顛慄不應贊揚。在目前情況下，一些個體戶這種舉動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對「左」的思想心有餘悸的表現。應當承認個體戶在賺錢的同時，已經爲國家作出了貢獻。個體戶只有理直氣壯地將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而不是鼓吹那種無端佔用他人勞動的「左」的殘餘。二、曲嘯認爲「在我們國土上跑着那麼多外國車，我看到難受」爲什麼會這樣，曲嘯說是「我們落後」，蛇口青年認爲這個回答太表面，落後是體制弊端造成的。而在目前開放的主題下，沒有一點外國的東西是落後的表現。三、曲嘯可以用「點燃人們心靈之火」的方式來表達對祖國的感情，也應允許蛇口青年通過體力勞動的方式表達對祖國的愛。不能隨便給蛇口青年加上一頂「不熱愛祖國」的帽子。

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麼回事？

問：據報導，在「激烈爭論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顯然不習慣這種座談方式，對質問他的青年說：「我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引起與會青年的笑聲，這位青年當場遞上名片。」會後，以「北師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義起草了一份材料，認爲與會青年有「較爲明顯的錯誤言論」，「整個氣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敵對的」，那個遞名片青年的名字也被上了「材料」。事實究竟如何？

彭清一：問名字的是我，不是「赫赫有名」的李燕傑。因為第二天我要應邀到深圳演講，我認為這位青年的話有一定的代表性，就問他能不能把名字告訴我，允許我明天講他的觀點。這就像兩人談話互相詢問姓名一樣，很正常的，怎麼會是質問呢？

郭海燕：那份材料是有，我寫的，有什麼責任完全由我來負。當時我為李燕傑等幾位老師不平，特別氣憤。正好深圳市團委書記請我幫忙寫一個會議紀要，我就起草了這份「蛇口座談會」始末，並點了那位遞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但根本談不上擴散，只是上報主管業務部門，這是正常的工作匯報，沒有見不得人的小動作。當然，我有責任把個別青年的錯誤言論實事求是地反映出來。

魏海田：在那種氣氛裡用那樣威脅的口吻問人家「敢不敢把姓名告訴我」，能說是正常的嗎？作為目擊者，我們感覺至少是不能平等待人，平等說話，而是居高臨下，以教師爺的身份對不聽話的學生的呵責。更為令人費解之處，是他們在會上表示「我們很滿意你們的誠懇、直率，通過你們的信息反饋，我們覺得很有必要進行研究。至少以後不會剛到一地不深入研究就隨便發表意見。」看上去很理解青年，而十三日開的座談會，十五日就以「北師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義寫出那份完全否定蛇口青年的所謂「材料」。以後又在各地的演講中屢次把蛇口青年作為反面教材拿出來批，這怎麼能不讓人感到氣憤呢？

張夢飛（「蛇口通訊報」總編輯）：老實說，當初沒有打算報導這件事，因為爭論在蛇口的確很尋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嘯在深圳市演講，專門用一段話來貶損蛇口青年，電視也放了，以後又冒出那份不太光彩的材料，我

們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維護蛇口青年的聲譽。報社年輕記者魏海田、王克樸正好參加了座談會，提出了報導設想，才開始報導出來。

對這次座談會應如何評價呢？

問：從「蛇口通訊報」二月一日初次報導這次座談會以後，海內外先後有多家報紙刊物作了報導或轉載。一些文章說：「這次座談會標誌着過去那種『我講你聽，我打你通』的傳道、授業、解惑的方式已告結束」，「青年已不再迷信權威」，「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方式和觀念都要更新」。對這次座談會及其有關的報導究竟應作何評價呢？

袁庚（蛇口招商局董事長）：有兩點可以明確表態：一、既然不是到這裡來傳經送道，就不能只允許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談，就大家都可以談。曲嘯、李燕傑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觀點存在，也應該允許其他的觀點存在。我們還是要提倡，堅持不論對內對外，不論是誰，不論什麼流派，什麼觀點，只要不反黨，不搞人身攻擊，都可以讓他們在這裡發表，在這裡交流，在這裡探討。但有一點要講清楚，我們不歡迎教師爺式的空洞說教，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要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這種作風連我這個老頭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會歡迎的。二、我非常贊賞這句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希望記者同志一定要把這個觀點報導出去，這是保衛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的神聖權利。所以，對那位被迫問姓名並上了什麼材料的青年人，我們一定要加以保護。即使他的發言有什麼不妥，也不允許在蛇口發生以言治罪的事例。

梁憲（蛇口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部總經理）：這種衝突就我看一點也不能避免。雙方的觀念上的差異太大，連一些習慣用語、術語都各有一套。我看曲嘯等人對商品經濟的東西顯得很陌生。你不懂商品經濟以及價值觀，到蛇口這個商品經濟最活躍的地方來，又怎麼能和青年人真正溝通和對話呢？

李燕傑：座談會以及有關報導出來後，我對此一直比較沉默。有人奇怪。我還是在那次座談會最後表的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為什麼沉默？有三條：一是寵辱不驚，風風雨雨見多了，我寫了這麼兩句自勉：「寵辱不驚，看座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碧空雲卷雲舒」。二是實在太忙。你說我們的觀念陳腐，可現在全國各地，包括廣東、深圳發來的請柬有一千多封，排都排不開，要是觀念陳腐，早就給轟下台去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哪一件不要時間和精力？三是相信群眾相信黨，特別相信青年有能力分辨是非，我們認為深圳和蛇口的大多數青年是好的，那幾個蛇口青年代表不了他們。這半年我們收到許多青年來信，有的打抱不平，政法大學的學生還找上門來要當我們的律師，打官司。我謝絕了。盡量不採用「打官司」的辦法，我從來就沒有整人訓人的秉性。至於說我們搞「我講你聽，我打你通」，對發表不同意見的人「扣帽子」、「打棍子」，我認為沒有根據。我是最早反對壓服式的教育方法的。我一貫主張對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愛護。「蛇口通訊報」說蛇口青年不想聽我的「傳道、授業、解惑」，我想，作為這次座談會主辦者之一的該報記者應該清楚，是我們主動去那裡「傳道、授業、解惑」的呢，還是你們採取什麼作法把我們請去的呢？

我們這些年來，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對得起事業，對得起青年，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爲什麼這麼說？我們三位都不是爲了圖名圖利幹青年工作的，我們都有自己的專業，我是教授，曲嘯是心理學家，彭清一是著名藝術家，要圖名談不上，圖利更談不上，我們先後作了幾百次報告，有誰要過一分錢？爲了錢，我隨便出去講學，一次上百元不在話下。我們年紀都大了，身體有病，我一次報告後，血壓低壓不到六十，高壓不到九十；曲嘯患有胃病和關節炎；彭清一更是左眼失明，左腿傷殘。我家有個二十八歲的女兒至今在家待業，這有誰知道？彭清一現在還睡上下舖，等等。說這些不是擺功評好，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是在思想政治工作難做之時，我們站在第一綫，嘔心瀝血，但却得不到應有的評價。這裡就有一個基本的立足點的問題。我們承認自己的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但即使我們的工作有缺點、錯誤，難道不應當以同志式的善意出發來幫助嗎？

我不認爲我們的思想工作就是舊的、過時的模式，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可以說也是最有力量。說到改造和加強思想工作，我認爲像我們這樣專家學者兼做青年工作，橫跨一步，本身就是一個方向，這是體制的改造。另外，我還想從三方面提出改造：內容改造、觀念改造、方法的改造。我們還遵循三條原則：第一要堅持原則，不能搞僵化；第二要堅持改革與開放，不能搞自由化；第三要堅持教育，不搞簡單化。

蛇口那幾個人的做法可以概括爲五不對：立場不對，觀點不對，事實內容不對，路子不對，手段不對。

曲嘯：對於那種少數別有用心專事製造謠

言挑撥是非的人，我們還想奉告一句，如果認爲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或不敢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那就錯了。

吳厚信（珠江電影製片廠導演）：我大概是唯一以旁觀者的身份參加會議的，爲了保留素材，我還爲座談會錄了音。當時給我的感覺是雖然觀念上是兩條路子，但仍屬正常的討論。最近我又聽了一遍錄音，仍不能得出是蛇口青年有意發難之類的結論。我以爲，姑且不論辯論的是非曲直，有一點是肯定的：這幾位專家「富有詩意」的報告、演講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這場風波的實質，是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從形式到內容都受到嚴峻的挑戰。青年人滿足專家們我打你通式的說理，是正常現象。而專家們不習慣與青年對話，則是受了中國千百年來的「傳道、授業、解惑」的灌輸式的束縛。今天和歷史大不相同了，科技的突飛猛進，知識、觀念的急速變化，社會發展節奏大大加速，代際差別日趨明顯，人的學識，尤其是青年人的創造力受到空前的重視，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師道尊嚴」受到平等意識、民主意識的挑戰。傳統的「傳道」、「解惑」的權威大大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對話和溝通。特區青年身處商品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有更多的觀念上的變化，商品經濟本身充滿的平等意識、民主意識使他們要求平等對話，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驚小怪。相反，倒是思想工作必須進行適應這種形式的改造，努力更新觀念，才能與青年溝通。如果自身的思想就不夠解放，又硬要人家服，擺出教師爺的架子，聽不得不同意見，最終只能「撞板」。李燕傑等同志過去對青年工作過卓有成效的探索，對原有的思想教育有改進。正因爲如此，發生在他們和青年之間的風波就更具典型意義。

林口 印刷公司

彩色報紙 各型雜誌 宣傳刊物 大型海報

☎ : 718-937-5141

718-937-5301

🏠 : 50-22 23 ST.

L.I.C., N.Y. 11101

LINCO PRINTING CO.

中國涉外企業所面臨的問題

(國內)張綱

在中國，凡與外商(包括港商)投資有關的企業統稱「涉外企業」，其形式多種多樣，包括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營企業，中外合作企業，來料加工，來樣加工，補償貿易，承包租賃等等。到一九八七年底為止，在中國各種涉外企業已有七千七百餘家，吸收外資六十六億美元。外資企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廣東、福建、遼寧、以及京、津、滬等地，其中僅廣東一省就佔投資項目的百分之六十，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以上。

對於這批涉外企業的效益和作用，國內外輿論界眾說紛紜。有的說效益良好，前途光明；也有的說一塌糊塗，難以維持。為此，筆者對各地的涉外企業作了一些調查，着重瞭解了從外商的角度去看涉外企業的前途。從普遍反映來看，調查結果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困難重重，前途莫測。

據外商反映，涉外企業的困難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非經濟因素，另一個是純經濟因素。

非經濟因素

非經濟因素包括以下幾方面：

(1)法制不善。中國政府雖然已公佈了一些有關涉外企業的法規，但這些法規線條很粗，彈

性極大，幾乎每一個含意不清的條文對外商來說都是一個陷阱。例如有關技術引進的法規對先進技術的定義僅僅是一些原則，如「具有國際先進水平」，「具有國際市場競爭能力」，「有明顯經濟效益」，外商看了這些條文後仍不得要領，他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份具體的所需引進項目的清單。又如，從前特區的法規規定區內企業進口生產資料可以享受減免關稅優惠待遇，可是一些合營的賓館飯店進口的電視機、洗衣機、汽車、空調機等產生很大爭議，這些商品屬於生活資料，可是對於旅館業來說，它們又是生產資料。這種粗線條的法規條文對中方的管理機構十分有利，因為法律的解釋權在他們的手裡，很多法規都有在「其它」情況下的例外條款，以及有關權力機構「認為必要」的彈性條款，這裡面有無限文章可做。當然，法規的彈性也對中方管理機構具有不利的一面，它也給外商留下很多鑽空子的機會，尤其對那些熟悉大陸內情、小額投資並抱有投機心理的港商(全國涉外企業中港商投資佔百分之八十五點五)比較有利。而那些對中國不太熟悉的外商(他們項目少但投資額一般比較大)只能靠法規來瞭解投資環境，對於彈性法規甚至存在着無法可依的現象，茫然不知所措。

法制不善還表現在法律服務不善。外商反映，中國的法規本來就像迷宮一樣，可是還缺少法律諮詢人才，同時法律的宣傳也很差，沒有專門的法規匯編，外商往往不得不要自己去搜集法規文件，專門派人研究，為投資增加了很多麻煩。另外，有法不依的現象在中國也經常發生，外商反映最大的是滙出利潤的條款無法兌現，中國政府在外滙緊缺時凍結外滙，令外商叫苦連天。

(2)政策多變。法律的彈性常常是由各種各樣的行政規定和政策文件來補充的，這些文件一般都發給執法者，即中方管理機構，而外商為了解上形勢變化，還要在法律外搜集其它有關各種文件規定。最使外商頭痛的是兩個方面：第一是這些文件發自中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各個層次，由於其各自立場不同，因此，往往相互矛盾。例如在特區，國務院外經貿委下的文件往往就和當地政府的文件相互矛盾，常常是前者要緊，後者要鬆，當地具體管理機構則按所屬關係和本身需要靈活解釋和運用文件精神，搞得外商無所適從。第二是政策文件在不同時期前後不同。很多涉外企業在簽合同時其產品還規定可以自由外銷，可是一九八五年四月，外經貿委忽然下文規定要進京申請許可證方准出口，於是外商不得不一趟趟跑北京搞許可證，疲憊不堪，一九八七年初又規定許可證審批手續簡化，但至今很多具體問題仍沒落實。外商普遍的牢騷是，不但政策多變，而是在變

「緊」的時候特別迅速，而變「鬆」的時候却拖拖拉拉，經常不能兌現。需要許可證的產品逐年增加，從二十幾種增加到四十幾種，到八五年四月一下增到一百二十多種，搞得人心慌慌。很多外商都表示，不怕條件苛薄；就怕條件多變。條件苛薄尚有條件苛薄的做法，可是條件多變簡直沒辦法做。

(3) 管理機構重疊複雜，辦事效率低下。一家合資企業成立，要與十幾個管理機構打交道，個個廟燒香，過五關斬六將，所有手續齊備往往要一年以上。很多涉外企業在開工之後，原來估計的國際市場形勢早已發生變化，處於騎虎難下，於是靠內銷渡日。有的合資企業申請進口許可證經過七、八次報告旅行，歷時達十一個月之久。甚至企業內部的事務還要受到行政管理機構的制約。按涉外企業法實施條例，外商投資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是董事會，董事會享有經營自主權。但合資企業的中方代表往往是上級主管部門派出或任命的，因此必須聽命于主管部門，事事請示匯報。在合資企業董事會中並不採用多數裁決的原則而往往採用協商一致的原則，即任何一個決議都必須中外雙方同意才有效，也就是雙方都有否決權。而中方代表的否決權還在于其背後的主管部門，這意味着行政主管部門有權決定合資企業的任何事情，董事會的作用有名無實。一些合資企業的外商反映，他們辦很多事情實際上都要直接與層層上級主管部門打交道，仍舊是過五關，斬六將。很多主管部門的「干預」、「批准」實際並無意義，完全是為了顯示權威，否則意味着「不尊重」它們，在很多情況下，一些行政干預往往出于主管幹部個人的私利，要用賄賂來打通關節，否則他們會使用否決權，讓企業辦不成任何事情。很多外商抱怨，當他們辦

不成某些事，需要行政管理機構幫助的時候，這些機構個個都無能為力，什麼事也做不成功，可是當他們自己能辦成的事情需要它們同意時，它們就法力無邊了，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使你失敗。外商在瞭解了中國的行政機構後發現，那些沒有用的機構（在他們眼裡）非常強大，而那些他們認為必要的機構却非常薄弱，例如稅務部門、工商管理部門、金融管理部門、會計審計部門、統計諮詢部門、報稅鑒定部門等等，很多企業根本未經過會計師事務所驗資查帳，稅收稀里糊塗，申請銀行貸款也不查資信，很多外商甚至懷疑，他們層層報批了幾個月的项目報告，到底各主管部門有沒有認真搞過可行性分析。

(4) 服務設施差。外商一般在來投資之前，對於中國大陸比較差的基礎設施狀況是有思想準備的，例如，水電供應、交通運輸、通訊聯絡等這類硬件的服務設施狀況在作可行性研究時都會估計到，所以儘管這方面的服務遠不如香港或國外，但由於是在意料之中，外商的抱怨並不多。外商意見比較大的是軟件的服務設施差，例如諮詢服務、法律顧問、融資保險、仲裁糾紛、內外貿易、人才培訓，甚至購買出差機票、等等。在國外，雖然也有眾多的需申請報批的行政手續，也有相當繁雜的業務手續，但這些事務都有專門的機構去辦，律師事務所會為你辦好所有法律文件，金融貿易機構會為你辦好從申請許可證，一直到融資、換證、運輸、保險、報關一切手續，什麼手續不清楚了，可以找諮詢機構，對方會為你提供一份報告和建議。可是令外商不習慣的是在中國一切都由他們自己去操心。他們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沒有任何機構可以諮詢，如果沒有中方的合營單位，他們幾乎會寸步難行。

(5) 亂收費攤派。中國的很多服務企業都把涉外企業當作搖錢樹，服務收費隨意漲價，例如裝電話，電傳設備的收費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漲了近十倍。外商反映，很多中國人有紅眼病，一看是你賺錢就眼紅，敲榨勒索接踵而來。廣州一家合營菜館辦得頗有成效，大賺其錢，於是兩年內水費、電費、垃圾費等一系列費用都成倍上漲，原協議規定的收費率成爲一張廢紙。同時，那些賺了錢的企業還要頻繁招待上級主管機構的「視察」，每次招待都要破財。

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主要體現在生產要素的供給及市場財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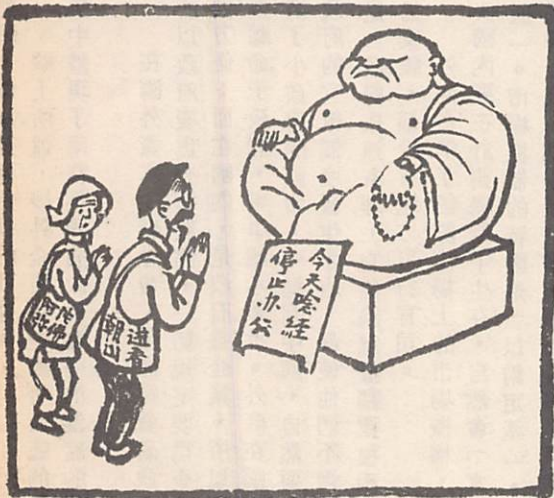
(1) 勞動力的供給上，普遍反映是人才不足，專門的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以及合格的熟練工人短缺，培訓人才的設施不足。相反，非熟練工人和閒職雇員過多。涉外企業法雖明文規定企業有解雇工人的權利，可是由於中國職工的安全保險是由企業承擔的，在社會安全保險系統尚未建立之前，企業解雇職工的權利也很難落實，職工也難以接受。例如廣東一家大酒店就因開除二名職工而引起全體中方職工的抗議，後在上級主管部門調停下妥協。儘管有很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願意到涉外企業工作，但中國的人事制度和幹部制度未改，調人非常困難，原單位將人才視爲私有財產，從中作梗。要調的人進不來，要裁的人退不掉，造成企業一方面效率低下，一方面雇員冗腫。深圳一家飲料公司經理認爲，中國大陸工人的工資雖爲香港人的三分之一，可綜合勞動生產率也是香港的三分之一。這實際上意味着勞動力量便宜

的優勢根本發揮不出來。

(2) 資金供應短缺。外商在來華投資前有很多都只投固定資產而未準備流動資金，打算以固定資產抵押向銀行借款。但中國的信貸資金是按計劃供應的，涉外企業的資金不包括在計劃內，故很難保證供應。申請貸款需層層審批不說，而且還往往不能全部滿足。特別是在銀根緊縮時期，貸款一凍結，人民幣緊缺，外商叫苦連天，工資都發不出去。一九八七年初，為解決人民幣信貸緊張的問題，中國人民銀行甚至規定以外匯抵押人民幣借款，這個方案實際只解決了一個外匯兌換的障礙問題，但涉外企業必須有一部分資金被占用，所以起不到融資作用。在中國，人們常常可以聽到外商（尤其是港商）招搖撞騙，靠銀行信貸白手起家，在大陸發財的傳聞，一些宣傳工具甚至把這當作教訓，告誡企業在與外商合資時要調查對方資信，瞭解對方實力，千萬不要「上當受騙」。實際上，這種傳聞恰恰體現了人們對市場經濟以及國際金融知識缺乏常識，在香港這樣融資非常方便的地方，白手起家辦一個企業並非難事。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訂單，有買主。再有少量資金，就可以以訂單抵押向銀行貸款流動資金，進貨原料，招收工人，至于廠房和設備可以租賃，一家企業十幾天之內就可開工，第一筆訂單的錢馬上就可以賺到。如果以後仍有訂單，企業就越滾越大，如果沒有訂單了，企業關門也不妨，因為沒有固定資產投資。很多港商在香港混慣了，以為到大陸也可以這麼幹，其結果往往碰得頭破血流，要錢錢沒有，要貨貨沒有。當然其中也有個別運氣好、關係多的人靠這個辦法成功地賺了錢，于是一些紅眼病的人一瞭解其白手起家的創業史，就要大聲疾呼受騙上當。當然，有心來招搖撞騙的港

商不是沒有，但上述傳聞大多數體現了由于兩種不同經濟制度而引起的誤會。實際上由于中國內地的資金短缺，融資系統截然不同，想靠以上辦法辦企業的人大部份都失敗，成功的只是極少數人。

(3) 物資供應價高且沒有保障。和資金一樣，涉外企業所需的一切原料、建材、能源均未納入國家計劃，企業只能以議價購買。尤其是短缺物資，不但很難滿足，而且要出比計劃價高得多的價格。由于中國外貿靠政府補貼，價格倒掛，出口的產品反而比國內議價便宜，所以廣東省很多涉外企業寧願到香港去買大陸出口的產品，然後復進口（生產資料可減免海關稅）多費一道周折。國內有些報刊常批評一些涉外企業，明明國內可以生產的東西，也要進口



受官商作爪侍染的弥勒佛 八月五日

，例如建材、原料等，可是他們不瞭解企業也有苦衷，企業何嘗不想花人民幣而節約外匯，可是國內產品的數量、質量、交貨期一系列問題都無法保障，而國際市場上却有保障。

(4) 市場問題。外商到中國來投資，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中國巨大的市場，這是不言而喻的。一項對前來參加沿海城市技術開發區談判的日商和港商的調查表明，在所有的投資動機中，「開發中國市場」的動機明顯占第一位，其得分高出占第二位的動機「便宜的勞動力」一倍左右。很多外商認為市場是中國方面的一大籌碼，中方可以在這方面妥協而換取更大利益，其外匯平衡的矛盾可以以一個全面的進口替代的方案來解決。可是使外商不能理解的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中國竟然沒有一個替代進口全盤計劃，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一方面要引進他們的生產技術，並強調大部分產品出口；而另一方面又每年要從國際市場進口大量同類產品。有的外商認為，以中國目前工人的技術狀況，一下子打入國際市場是很困難的，也不現實，這需要一個以國內市場養活、維持企業的過渡階段，否則企業最初階段便無法生存。

(5) 財務困難。從各地涉外企業的一般情況看，財務狀況普遍不佳，真正盈利較高的企業不多，大部分是微利企業，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另有百分之十七的企業聲稱虧損，一九八六年平均銷售盈利率約百分之十五，低于一九八五年全國國營企業百分之十七點三的平均水平，資金盈利率僅百分之七，而企業平均負債比率平均百分之六十以上，最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盈利率低而負債率高，說明經營風險大，長期償債能力差。另外，財務困難還表現在外匯短缺上，一九八六年中外合資企業北京吉普車廠因外匯不足而停產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國引進投資項目大多是加工裝配項目，其零件主要靠進口，如電視機、電冰箱、錄音機、摩托車、汽車等裝配線，均是吃外匯的老虎。而產品大部分內銷，外匯平衡無法解決。中國外匯充足時尚可「吃大鍋」靠創匯企業平衡，可一碰到金融收縮，外匯凍結，就難以維持生產。一九八六年，以上引進的生產線均有不同程度的減產，有的乾脆停產，更加惡化了財務狀況。一般說服務行業的涉外企業外匯平衡狀況較好，加工業比較困難，如廣州二十二家大酒店有十七家外匯可以平衡有餘，占百分之七十七，而加工業四十八家合營企業，能達外匯平衡的僅二十三家，不到百分之五十。汽車、電器、建材等行業，問題最大。外匯平衡問題可說是涉外企業能否生存下去的性命悠關的問題，最近廣東、福建鼓勵合資企業以購買國內產品出口的辦法來消化其多餘的人民幣緩和和平衡外匯的問題，但這

(上接26頁)

的競爭使他們養成了對待業務一絲不苟的習慣。我國第一位演「卡門」的女主角苗青，出國學習演出後在歐洲有了一定的影響，今年初應中央歌劇院之邀參加赴港演出，她那嚴肅認真的演出態度贏得評論界的稱讚。

對祖國和事業的感情促使在國外的藝術家們盡可能尋求為祖國服務的機會。北京舞蹈學院院長呂藝生說，出國的舞蹈工作者們這幾年幫助學院聯繫很多與國外的藝術交流，包括請著名舞蹈家講學等等。湯沐海與文化部訂立每年回國指揮三個月的合約。苗青表示原來她所在的劇院一有要求即可回國隨團演出。中央音

種作法只是局部改變了外匯的分配，並沒有從整體上解決外匯短缺的問題。

綜上所述，涉外企業在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集中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衝突。

在國外資本主義社會，是企業養着政府，所以政府要為企業服務，一切規定要為企業提供方便；而在國內，是政府養企業，所以企業要聽命于政府，事事請示報批。外商在國外習慣了小政府的社會，一進到中國，自然要與大政府的官僚制度發生矛盾，最使他們不習慣的是，政府永遠有理，它無論怎樣翻雲復雨，背信棄義，都沒有地方可打官司。

外商習慣了國際市場上的市場機構，而進入國內要在計劃機制下生存，自然會「水土不服」。市場機制的特點是「以銷定產」，市場需要什麼，就生產什麼，根據生產的需要來籌集資金，採購原料，招聘職工；可是國內計劃

樂學院紅領巾樂團有幾十年歷史，擁有呂思清、董昆這樣的具有世界水平的樂手，却因受經費限制，從未奢望能到世界舞台一展風采。最近，却由曾在該院任教過的小提琴教師趙元籌劃，得到趙元在瑞士任職的「萊森柯」公司的資助，將於今年九月赴瑞士、意大利演出，堪與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媲美的中國少年合唱團，也將接受同樣的資助奔赴世界舞台。

指揮家鄭小瑛對此發表看法說：「由於交通的便利，世界變小了，使用藝術這種世界共通語言的藝術家是世界文化寶庫的共同財富，每一個地方的觀眾都有權利看到他們的表演，年輕藝術家以新姿態新方式進入這種高層次的

機制的特點是「以產定銷」，既然生產是已知數，那麼生產要素、資金、原料、勞力均可以事先計劃好。當兩種體制一銜接，矛盾就會出現，外商什麼時候來投資，投在什麼項目，投多少自然是無法納入計劃的，中國政府也不可能留下一筆人民幣配套資金以及原材料儲備、人才儲備等着外商來投資。所以當涉外企業建立時，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沒有現成的計劃供應，而市場機制又不健全，自然處處面臨困境。

涉外企業所面臨的問題體現了中國在對外開放中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抉擇；在兩種經濟政治體制相銜接的時候，以誰為主導？是讓國際上的市場機構去服從國內的計劃機制呢？還是讓國內的計劃機制去服從國際上的市場機制？涉外企業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完全取決於這兩大體制較量的結果。如果是前一種結果，那麼意味着它們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無法生存下去，如果是後者，那麼它們可望有比較光明的前途。

大循環是應該的。」同樣是出國學習過又任中央樂團的指揮，在出國手續辦理的難易上，居住國外的湯沐海與居住國內的陳佐湟便有很大差別，陳佐湟為繁瑣的層層審批手續而不得不放棄一些出國活動，而湯沐海却無此煩惱。

鑒於以上事實，權衡利弊，建議有關部門或藝術團體、院校，明確選擇最能發揮出國藝術家才能的來去自由的政策。這樣，將吸引高尖藝術人才更加自願地與國內合作而放射出更多的光彩，吸引更多資金和人力支持，而使目前已具相當實力的人才和表演團體不因種種限制而失去發揮自己水平的機會。

轉自光明日報

試論中美經濟法規的異同

高標

從八十年代起，大陸開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這無疑引起了國內外各屆人士的關注和不同程度的歡迎。曾有一段時間，很多外國商務機構紛紛在大陸設置代表機構，有的甚至投資聯營，希望通過使用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而使得其產品更富有競爭力。殊不知這股熱情很快就開始冷卻下來，有些公司開始收縮，甚至完全撤出駐大陸的代表機構。較為普遍的原因之一是大陸的商業法律環境還未健全，面對着無數不知出處的「紅頭文件」，令人昏頭轉向的呈批手續及「馬拉松」式的談判，還有中國式的政治——經濟裙帶關係等，都令到許多外國的實業家望而生畏。

時至一九八一年，中共方才頒布了其建立政權以來的第一部經濟合同法。這個合同法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乃是十分原始的，然而考慮到制定這部法規的人並無自己成熟可靠的先例個案作為參考，其粗糙倒變得有情可諒了。然而有些本質上的不同之外，則是源於制度及觀念的差異。

由於題目之大，而篇幅有限，作者只好就一些較為典型的部分來試論大陸和美國經濟法規的異同。

經濟法規只是法律體系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就法律的本質而言，美國著名法學家（O LIVER WENDELL HOMES）認為：法律作為一整套規則，使得人們可以預見法院對某一爭紛將可能作出何種裁決。美國人普遍認為法律作為社會的規範，是用於指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為取得正義，司法權力應獨立於任何的社會組織之外。

中共政權遵循着傳統的，同時又是極端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並受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

事實上，在現實中的大陸，即便是一般性的商業或民事糾紛，人們都是無力與任何一個國營機構相爭，因為每一個國營機構都集政治、經濟、司法權力於一身。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這些機構頭面人物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其意志同等於法律。

話說回頭，自七九年起，中共似乎開始意識到設立一個商業法律體制的必要性，並為此相繼頒布了一些經濟法規。但實際上，這些法規的落實情況並不理想，官方不得不再三借助政治運動（如：「反貪污」、「端正黨風」、「打擊經濟犯罪活動」）的方式來解決經濟罪案。究其原因，乃是社會體制本身存在嚴重的缺陷。司法體系不能獨立於行政經濟體系之外已是共產黨國家的通疾。

由於大陸的司法權力並不獨立於任何社會組織之外，而是受中共的控制，因而社會正義的申張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首先，中共黨內主管司法部門的人物，大部分對法律並不通曉，其次，黨的各時期「路線」（如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對司法實踐產生直接的干擾，其特徵為：寬、假、錯案不斷地出現，而又不斷地「平反」，結果給無辜百姓帶來極大痛苦，同時，對法律本身亦是莫大的譏諷。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大陸的法院均極少受理經濟糾紛案件。通常的經濟爭執都是由當事人的上級主管部門「協商解決」。出現所謂「嚴重經濟犯罪案件」時，法院則將其作為刑事政治案件處理。只是這幾年，法院才開始受理各種經濟糾紛的訴訟，但苦於沒有商業環境下的各種經驗，處理方式和結果通常不能起到借鑒的作用。有部分則干脆另設「經濟法庭」來專職處理這類訴訟。由於上述

種種原因，大陸偏向於採取仲裁的方式解決各種經濟糾紛，為此，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構普遍都設立了仲裁委員會。

與美國極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不一樣，中共政權自它成立之日起，便全然否定了自它之前的所有法律遺產；另外，在它施政的三十年內，亦未建立自己的先例法（CASE LAW）。這種法律上的「先天不足」和後天「營養不良」症對大陸的經濟發展產生極為不良的影響。最明顯的是，由於人們對司法判決捉摸不定和信心不足，促使經商者尋求行政或黨務系統的「疏通」，從而導致這些系統的腐敗，因其腐敗而獲利者則萌發更大的冒險念頭。如此惡性循環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正常商業、經濟活動的阻滯和商業道德的崩潰。對外國投資者來說（尤其是民間的），也會令他們裹足不前。

衆所周知，經濟合同是人們在其經濟活動中因相互需要而用語言或文字表達出來的一種互相依賴的承諾。這種承諾是對等的。其目的是使承諾的任何一方都能得到某種經濟利益或補償。這種承諾一旦為雙方所確認，任何一方就需履行承諾規定的義務和接受承諾規定的利益。至於合同的形式，中美兩國各自有相應的限定。

根據中國合同法的規定，經濟合同，除即時結算者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該法還進一步規定了合同的主要條款應包括標的，數量和質量，價款或者酬金，履行的期限，地點和方式及違約責任。顯然易見，越是詳盡的書面合同，其安全性也就相對越高，訴諸於法院的可能性便越小。然而，在現實的商業活動中，這樣的規定也未免過於僵硬而不利於大量的中小規模的商品貿易活動。例如一個人打電話給一家書報行，訂購五十本教科書。對這樣的採購

合同，中國的合同法根本就不予以承認。而在美國，法院則可能認為合同已產生，違約的一方將承擔造成對方損失的責任。根據現實商業活動的特點，美國合同法規定，五百元以下的口頭買賣合同即受到法律的保障。五百元以上的，則要求具備某種書面形式。便條、備忘錄、電文、信件等都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形式。更有趣的是，購銷合同的條款甚至可以節略到剩下兩條：商品數量和簽字。因為有了簽字，法律便可確定損害的範圍。有了簽字，便可追究違約的人。至於其它省略了的條款，法院都可以根據當時的市場情況，第三人標準及合同法條例予以補充。

大多數的合同都是以雙方履行合同條款而終結的。美國合同法區分三種形態的履行行為：（一）「完全履約」。其發生於「合理預測」的範圍內；（二）「基本履約」。其發生於輕微偏差於「合理預測」的範圍內。（三）「實質履約」。其發生於遠遠偏離「合理預測」的範圍內。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類自身的限制，有些履行行為有時是不可能完全滿足雙方的預期目標的，為取得公正及合理，美國法院認定「基本履約」的一方已具備足夠的理由要求對方同時履約，而對方則有權要求這一方賠償「輕微偏差」引起的損失。

中國合同法則要求「完全履約」作為完成合同的唯一方式，並自稱這是社會主義合同法的特點之一。敞開空洞詞藻，其中的漏洞還是赫然易見。例如：該法本身並沒有明確規定，當一方未能「完全」履約，另一方是否意味着可以解除自己的履約責任。該法的第二十七條款似乎表明了這樣的觀點：即使某一方未能完全履約，但由於合約涉及到國家計劃，另一方亦不能因此解除履約義務。除此之外，「完全

履約」的測驗標準也值得考究。在缺乏國家或專業統一標準的情況下，而中國法院又缺乏豐富的經驗及不懂運用第三人標準，合約當事人很可能為履約的結果而各執己見，爭吵不休。

除了履約而終結合同外，大陸和美國的合同法都允許當事人協商中途解約。美國合同法規定，協商解決合同的當事人需歸還從對方獲得的任何利益。大陸的合同法對這一點並沒有明確規定。同時，應引起讀者注意的還有，大陸的合同法並不表明所有合同解約均可生效。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合同涉及到國家計劃，即使當事人自願解約，也未必能獲得當局的批准。反之，如果國家計劃需要中途修改，即使當事人不情願，合同亦會被迫中途解除。

關於合同的解除，美國合同法還包括了合同的轉讓、取代和折衷。而大陸的合同則沒有如此詳盡。此外，還有一種合同解除方法，美國稱之為「不可履約」（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大陸稱之為「不可抗力」。美國合同法區分為兩種「不可履約」：（一）客觀的不可履約（OBJECTIVE IMPOSSIBILITY），其特徵為「做不了」（IT CANNOT BE DONE）。（二）主觀的不可履約，其特徵是「我不能做」（I CANNOT DO IT）。第一種情形為法律所接受，而第二種情形則不然。再次，大陸的合同法並不作此區分，但却允許「不可抗力」包括了國家計劃的修改、取消，企業關閉、停產或轉產等作為解約的理由，儘管這種理由的主觀成份較明顯。

當合約的某一方未能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義務，這一方便違反了合約，而非違約的一方將有權獲得補償。最普遍使用的補償方式是賠償、解約或強制履約。

美國合同法關於違約補償的原則或出發點是：補償應相當於受損方因合同被撕毀而喪失了的利益。對於違約罰金，美國法院通常持否定態度，除非簽約時對未來的損失無法核算，同時其數額並不超越合理的範圍。法院的理由是：簽約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執行懲罰他人的權力。

至於強制性履約，美國法院通常也是在極為特殊的條件下才予以批准。例如土地的交易，買方可能認為金錢的賠償並不能補償他失去某一塊土地的價值，從而堅持繼續執行合同的權利和義務。在發現有替代的辦法的情況下，法院則不會批准強制履約，只是要求違約方補償非違約方的金錢損失。

大陸的合同法是認可定額賠款條款的。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時，要向對方支付原定的違約金。與美國大同，大陸法院不會追究合同的違約金條款是否帶有懲罰意味，也不會探究違約金額是否與實際損失相符，更不會去瞭解解爭執雙方的立約地位及立約時的背景。而在美國，即使是龐大的，或有壟斷能力的集團公司，也很難憑藉自己的勢力在合同上使自己盡佔便宜而使對方蒙受損失。不公平的合同條款是沒有任何法律地位的。至於哪些條款屬於不公平，翻開美國過案記錄便會一目了然。只可惜大陸至今並沒有成熟的法庭個案可供公眾及律師界人士參考。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案例制度未能為大陸司法所採納，以致造成今天大陸各商業單位在訂立合同時都會耗盡腦汁去防範對方，各色「私家條款」可令外界人士嘆為觀止。

當一個國家的法律允許當事人制定和執行懲罰性的合同條款時，只能表明該國法律對經濟生活要麼就是無能為力，否則就是毫無興趣。

全美創辦最早，
最具規模的移民律師事務所

移民·大赦·不動產買賣·商業登記·酒牌申請等等

畢斯特 ● 慕嘉模 法律事務所
BARST & MUKAMAL

傑史格(Jay Segal) 美羅省移民局前任首席法官
馬丁譚士澤(Martin Danziger) 前美司法部移民局副局長
亨利杜根(Henry S. Dogin) 美司法部移民局紐約總局

紐約總公司 2 Park Ave. 1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Tel: (212) 686-3838 Fax: (212) 481-9362	加州羅省 Tel: (213) 623-4592 Fax: (213) 623-3720	佛州邁阿密 Tel: (305) 371-3838 Fax: (305) 374-3381	華盛頓首府 Tel: (202) 659-0712 Fax: (202) 659-0194	紐約法拉盛: 39-01 Main St. Suite 402 Flushing, N.Y. 11354 (718) 463-8500	紐約華埠 8 Chatham Sq 8F New York N.Y. 10038 永發大廈八樓 Tel: (212) 513-7800
	加州三藩市 Tel: (415) 398-8887 Fax: (415) 398-6757	佛州棕櫚灘 Tel: (305) 832-2369 Fax: (305) 832-7370	香港辦事處 代理廣州、台灣 Tel: 5-200818		

你想合法留在美國嗎？請找 律師 Roland Gell

專辦

H-1 簽證 工作許可 超速罰款
政治庇護 學生簽證 違章駕駛
婚姻案件 刑事犯罪 執照吊銷
遞解出境 意外訴訟 房屋買賣

請電話預約：

(212) 619 5520
(212) 619 2859

免費保密 諮詢

地址：299 Broadway Suite, 420, New York, N.Y. 10007 (Near City Hall)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辯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立民

中共「十三大」結束了。「十三大」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在此基礎上確立了它的「基本路線」。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是試圖給中共自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九年以一個理論的總結，並為今後中共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經濟改革」提供一個理論基礎。

從鄧小平到戈爾巴喬夫，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一片改革聲浪，其實都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在困難重重中尋求一條生路。一九八七年，蘇共與中共分別召開代表大會。蘇共拋棄了所謂「發達的社會主義」一說，而中共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說，可謂異曲同工。其實質，無非是承認，從一九一七年至今，七十年過去了，不僅共產主義還是遙遠模糊的海市蜃樓，連社會主義也沒有建成，所以現在只好倒退，儘管扭扭捏捏，但剝開來看，都是承認失敗的宣言。失敗儘管失敗，但他們都沒有，也不願放棄自己的一黨專制，所以有所謂「改革」，即在維持自己的獨裁專制的同時，來修補一下這個千瘡百孔的社會。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與其他死硬派不同之點，就在於他們感到了自己統治的危機，而要尋求一條生路。鄧小平的生路，就是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既不是創新，也不是發展，只不過是毛澤東老一套的延續和變種。這一學說，從理論上講是混亂的，從實踐上講只是一種機會主義，是為了適應改革而提出的，因此是在「夾縫」中試圖左右逢源。本文試就此而加以剖析。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是新貨色嗎？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理論上根本不是什麼新貨色。熟悉毛澤東當年對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的理論的人，乍一聽到這個名詞，都覺得耳熟。熟就熟在，這只不過是毛澤東老的貨

色的翻版。

從毛澤東在延安的窑洞裏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始，經「新民主主義論」到「論聯合政府」，毛澤東提出了一整套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概括地說，他認為，在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後，在中國將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是社會主義，亦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而是一個過渡階段，並且是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存在着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性。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將他的主要論點，引述一下，以求「溫故而知新」。

「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解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毛選一卷本，六一〇頁）。

「沒有問題，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既然是為了變更現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地位，即為了完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而奮鬥，那末，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後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毛選一卷本，六一三頁）

毛澤東當時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其本質來講，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而因為中國經濟落後，要想讓經濟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與此一資本主

義經濟發展所共生的，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逐步發展等等，這些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因素。當毛澤東提出這一套理論時，共產黨還是一個弱小的力量，他自知在當時就提出社會主義革命，不僅不可能，而且會把自己的同盟軍吓跑。所以他提出了這樣一種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設想。

在這樣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他強調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以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毛選一卷本，六三八頁）因為共產黨當時處於無權的地位，所以他要求這樣的普選。

在經濟上，他強調了孫中山先生的「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兩大政策，並且特別強調了「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宜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因素。」（毛選一卷本，六三九頁）

直到「論聯合政府」，毛澤東始終保持着他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解釋，他有一段話是很精彩的，這一段話拿來與他後來的所作所為相對照，實在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他說：「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着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着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毛選一卷本，九五九頁）。這一段話說得

多麼好啊！那種對私有財產權，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熱衷，真是讓人感動。難怪當時有許多所謂民主自由主義分子上當。過去三十幾年，對中國人民的個性是怎麼發展的？中國人民的私有財產是怎麼受到保護的？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又是怎樣的命運？人人有自己切身經歷，無需筆者囉嗦。

嚮往民主與自由的中國人民，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地深通列寧主義，他們忘記了，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國家裏，核心的一條是所謂工人階級的領導。而工人階級的領導，是通過共產黨來實現的，而共產黨，是由其領袖集團領導的，歸根結底，這個國家是由毛澤東及其親信來「坐龍庭」。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邏輯，由毛澤東發展。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既然是毛澤東帶人馬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依中國幾千年的政治邏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毛澤東不坐朝，誰來坐朝？民主與自由，是與中國人無關的事。這就是當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後，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裏，強調向蘇聯「一邊倒」及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的背景。從此，他們的重點，就移到了如何維護已到手的政權。為此，共產黨當然不能容忍中國人民個性的發展，不能容忍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容忍言論自由，不能容忍任何人對其統治的合理性的懷疑。於是，新民主主義就此不再提了，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弄得人人胆寒，全國上下，一片肅殺之氣，除了幾個馬屁精在那裏爭寵獻媚，中國人民哪裏還有一絲活氣？！

在經濟上，強行推行「農業合作化」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化」，「耕者」沒有其田，農民都簡直像奴隸一般。在城市裏，強制推行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哪裏還有什麼資本主義

經濟的相當發展？到後來，連小商小販都不能倖免，全國經濟一片蕭條。

自從毛澤東拋棄了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揀起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中國向一個民主自由社會發展的最後一絲希望也就破滅了。

三十幾年過去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終於把中國帶到了絕路，乃有今日鄧小平、趙紫陽的「初級階段」論。讀者諸君如將此理論與上所引述毛澤東氏之新民主主義理論相對照，即可看出，這一理論不過是毛氏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翻版而已。但今日再把毛氏的老調拿來重複，那就太讓中共下不來台，所以只好發明一個新名詞，所謂「掛羊頭，賣狗肉」，用心可謂良苦，但又有何用？！

其唯一不同之點，在於，由於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中國已無像樣的私有經濟成份，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因而也是僵化的）國營經濟體系。這個國營經濟，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官僚資本。這個龐大的官僚資本，是無論怎樣改革，也碰不得的。陳雲所謂的「烏籠經濟」，這個籠子，就是這個官僚資本。經濟改革之所以停滯不前，且有失敗的徵兆，其死結便在這裏。既然不能碰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共產黨官僚資本），又想放出私有經濟這隻鳥來，只好發明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來掩人耳目。

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要堅持的，仍然是毛澤東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仍然是「四個堅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辨析

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理論創造的時候，最

擅長的就是創造名詞，並且是帶有許多模稜兩可的限定詞的名詞，然後依據形勢需要而對這些名詞加以解釋。所以，中國大陸現代政治名詞術語之多，可謂世界之冠。細細推敲，趙紫陽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法寶的論述，就可以看出這一套手法運用之巧妙。

1.「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

曰：趙紫陽先生在違背「四個堅持」，和老祖師爺毛澤東唱反調。據前文所引，毛澤東一直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是為資本主義掃清道路，而落後的中國經濟，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三十幾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搞好，是因為毛澤東後來拋棄了這個理論。到底毛澤東思想的那一部分是為現今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堅持呢？趙先生斥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毛澤東為「右傾」，而在堅持後一半的毛澤東思想，其作為改革派的實質，不是很清楚了嗎？

趙先生在此還要了點小聰明，發明了一個所謂「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的名詞。什麼叫「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是指十八、十九世紀歐美的工業革命時期？還是指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工業化社會的發展？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叫做充分發展了的？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又叫做沒有充分發展的？當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成為當時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工業國時，馬克思、恩格斯覺得，英國，及後來的法國，資本主義是夠「充分發展」了，因此還曾設想社會主義革命會從英法開始。但是，歷史說明，他們錯了。要拿當時的英法與後來居上的美國相比，似乎英法的資本主義又大大不夠發展。可是要拿二十世紀初的美國與

今日之美國相比，似乎當時的美國也不夠充分發展。這是縱向比較。再看橫向比較：人人都承認，今日之美國，仍然還是「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應該算是充分發展了的。但是日本呢？它還有一個天皇，社會習俗中還有許多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日本的資本主義是不是充分發展了呢？至於英、荷蘭、瑞士、瑞典等等，哪一家算是充分發展，哪一家不是？法國是二次大戰戰勝國，西德是二次大戰戰敗國的一半，誰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我想趙先生在唸這一句話時，沒有想到有這許多國家會有這類問題吧？

或許有人會說，所謂「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就是一個泛指這所有國家的這一大段歷史。如果是這樣，則資本主義發展史並未結束，資本主義在各個不同國家以各種不同形式發展起來，並在繼續發展中。趙先生所謂「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究係何所指，似乎仍然是大大的疑問。

既然我們無法對這個杜撰出來的「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有一個嚴格的理論說明，自然也就在理論上無法說明為什麼中國可以繞過這一階段而走向社會主義。如果要問趙先生，這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又如何與社會主義相銜接，他自己恐怕也沒有什麼高見，只不過在那裏亂講一通罷了。

2.「以為不經過生產力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

曰：這是一種循環論證的妙着。趙先生事先規定了我們必須有一個以發展生產力為首要目標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然後說我們必須在這個階段上大大發展生產力，這一套話，並沒有說明這個「初級階段」到底是什麼

？也沒有解決為什麼非要有這樣一個初級階段的問題，等於什麼都沒說。

值得多說幾句的，是關於生產力的問題。任何研究過馬列八股的，都知道這個生產力是指的什麼，雖然中間斯大林攪了渾水，但其基本定義，人們心裏還是明白的。問題在於，趙先生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要有巨大發展，這個生產力是指什麼樣的生產力？以生產工具為例，老牛拉車是一種生產力，蒸氣機是一種生產力，現今的太空船、超導體、電腦、光導纖維、生物工程，也是一種生產力；以生產者講，奴隸、農奴是一種生產力；工匠是一種生產力；工廠工人是一種生產力，現今以高級科技掌握電腦，操縱飛船，管理自動化生產綫的工程師、技術人員也是一種生產力；請問趙先生，在您定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要發展到什麼樣了，才是「巨大發展」，才能滿足這個「初級階段」的上限要求，或者說才能達到「社會主義中級或高級階段」的下限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請趙先生指教，除了毛澤東喪心病狂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有那一個階段的歷史，不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內容的？

正如科技的發展是無止境的一樣，生產力的發展也是無止境的，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等於是讓「初級階段」這樣一個有限的定義去包括一個無止境的發展過程，這個定義，等於沒有定義。而且這個生產力的發展，也完全不足以指明這個「初級階段」的特徵。

這種沒有定義的定義，或者有無限內容的定義，是中共理論權威的老把戲。妙就妙在，這樣一來，就給隨心所欲的解釋敞開了大門。既然籠籠統統的概念，這個「初級階段」也就

是個籠籠統統的概念。今天我說是初級階段，它就是初級階段；明天形勢變了，我說它不是初級階段，它就不是了；是是非非，都在這些掌權者的一轉念之間，這就是中共的理論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妙訣。

3.「……」。但是，也正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後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

曰：毛澤東說，由於中國經濟落後，所以需要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讓資本主義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並與此同時發展工人階級與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比重。也就是說，毛澤東當初曾設想在這樣一個階段，由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來實現工業化和改變中國的經濟落後狀態。現在趙紫陽先生變了一變，讓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去取代毛澤東氏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後希望用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去實現工業化等等。可以印證，當趙先生談這個初級階段時，如本文上面已經闡明，實際上是在重複毛氏的老一套理論。

趙先生說，別的國家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但中國不行。為什麼不行？趙先生只是重複了一遍那一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陳詞爛調。事實是，近代中國歷史，迄今在大陸上，根本就從來沒有過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因此，根本就無從說明資本主義在中國行不通。退一步講，即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不通，那麼毛澤東、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通了嗎？三十幾年過去了，鄧小平掌權也已近十年了，歷史證明，這條路也不通。如果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通了，還要鄧小平來改革什麼？如果鄧小平的改革的社會主義成功了，還要趙紫陽先生今天來談「初級階段」幹什麼？趙先生發明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不能解決社會主義是否在中國就一定走得通這樣一個問題。

當初毛澤東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的社會。他只是說，在一定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中國存在着不走資本主義，而走社會主義的極大可能。儘管極大，也只是可能。後來，他背叛了自己的理論與宣言，一巴掌將助他成功的那些「民主自由主義分子」打



趙紫陽

下去，來了一個一黨專政。幾個「鎮反」，「三反五反」加上強迫合作化和公私合營等等，就把中國僅有的一點資本主義經濟消滅掉了，哪裏還有什麼「資本主義因素的巨大發展」。中共驅使中國人民在他們規定的「社會主義道路」上走了三十幾年，弄到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的地步，現在忽然來個變招，亮出一塊「初級階段」的牌子，其實還是要強迫中國人民在這條已經失敗的道路上走下去。

這裏，根本的矛盾在於中共要強迫用非資本主義手段去達到資本主義的目的。誠如趙先生所說，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

代化是資本主義的特徵，則中國大陸的社會根本就缺乏這些特徵。中共掌權後，何嘗一日不在企圖工業化，夢想變為世界強國，什麼超英趕美，大煉鋼鐵，一天等於二十年，爆炸原子彈，等等，無一不是為此。中國的經濟決策，是服從於政治需要的，因此急功近利，大起大落，違反根本的經濟合理性的要求，是其根本特徵。所以，現在的中國，工業是有的，但並沒有「化」；商品也是有的，也並沒有「化」；至於現代化，社會化，那就更談不上。所以現在中國社會是個跛腳鴨。為什麼沒有「化」成？因為中共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與這些「化」是個根本矛盾的東西。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大陸上，中共叫得最響的是所謂「住宅商品化」，請中共的達官貴人，公子小姐們也「化」它一下，交代一下他們花了多少錢或租或買他們現在住的洋房別墅？恐怕他們也「化」不起來的。

4.「那末，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階段呢？……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時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曰：這是趙紫陽先生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下的定義。細觀這個定義，還是混混沌沌。首先「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這又是老手法，發明一個定義、名詞，然後做文章。什麼叫「社會主義現代化」？怎麼才叫「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這個「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別的什麼「現代化」又如何不同？等等，這些問題，一個也沒有回答，憑空來了個「社

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則這個實現，既可以是今天的事，也可以是遙遙無期的事。至於說需要上百年時間，更屬無稽之談。毛澤東過去也說過這一類話，他可曾預料他一閉眼，今日趙先生會發明一個「初級階段」？所以，這樣一個對「初級階段」的界定，實際上在邏輯上是根本不通。至於所謂「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的矛盾」，這也是拾了毛澤東的似是而非的牙籤。這種矛盾，既存在於社會主義，也存在於其它社會，因為有了這種矛盾，人類才創新，才發展科技，發展生產，才有今日之現代社會。如果人類從一開始就滿足於茹毛飲血，則恐怕根本不會有今日如趙先生之流西服革履地做長篇報告。趙先生何以得出結論這一矛盾是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獨有？又為什麼只有發明這樣一個「初級階段」才能解決這個矛盾？

這個定義告訴了我們什麼呢？什麼都沒有。趙先生只是在這裏給中國人民開了一張空頭支票而已。他擔保在經過了「初級階段」這樣一通修煉之後，十億生靈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在他的一大堆「化」中，得到無限的好處。這個「初級階段」宛如一付靈丹妙藥，只要中國人拿來一服，就天下太平。至於現在，則對不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四個堅持，官僚資本，都是碰不得的，誰胆敢碰一碰，那個「人民民主專政」就要給你點顏色看。

十三大開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拿出來了，這個理論除了一堆似是而非，模模糊糊的名詞、術語等等的拼湊之外，毫無新意。結論是什麼呢？那只有一個，要想共產黨可以通過這種所謂「改革」而使中國進入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這個希望是完全破滅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已經死了！

中國大陸學生

民意測驗結果

摘自世界日報

最近，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委托普林斯頓大學三位博士研究生閻焱、李少民、于大海進行了一項民意測驗調查。調查分別在中國大陸本土大學生和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中進行。對前者調查組專程派人回國，到各大學發放問卷的方式；對後一類對象採用郵寄問卷的方式。

對大陸本土學生調查部分：

調查採用分層抽樣 (STRATIFIED SAMPLING)，調查對象為「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經濟學院」學生。發出問卷八百份，回收有效問卷三百四十四份，回收率百分之卅九。受訪者中，文科學生佔百分之六十一，理科學生佔百分之卅九；大學生佔百分之八十四，研究生（碩士、博士、博士後）佔百分之十六。七成六的學生來自城鎮，二成四來自

鄉村（縣以下）。女性比重為百分之四十二。中共黨、團員比重佔百分之九十六（其中黨員比重為百分之十一）。被調查者的平均年齡為廿一歲。由於北京大學的學生大多來自全國各地，因此樣本具有一定的地區代表性。調查結果如下：

一、關於台灣四十年來發展情況的評價

絕大多數受訪者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持強烈的肯定態度；對國民黨四十年來在台灣的表現，亦表示出相當的肯定。

當問及台灣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狀況時，七成七的人認為成功，僅百分之三的人認為不成功。二成一人選擇其他（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填寫「不了解情況」）。當綜合考慮全面情況，評價國民黨四十年來在台灣表現時，認

問：什麼叫高盈利保險儲蓄？

答：它既有保險功能，又有儲蓄盈利功能。

請看下面的例子：楊小姐，30歲，參加\$100,000 人壽保險儲蓄

存款年	每月存款需存	每年存款需存	每年大約紅利	累積大約紅利	退保大約可取	人壽保險款
1	97	1,075	NONE	NONE	NONE	100,000
2	97	1,075	450	450	450	105,027
3	97	1,075	504	992	1,092	110,568
4	97	1,075	564	1,642	1,942	116,657
5	97	1,075	632	2,416	3,216	123,345
6	NONE	NONE	708	2,165	3,565	119,929
7	NONE	NONE	749	1,934	3,934	116,955
8	NONE	NONE	792	1,725	4,325	114,411
9	NONE	NONE	840	1,545	4,845	112,311
10	NONE	NONE	887	1,397	5,297	110,619
11	NONE	NONE	942	1,292	5,892	109,368
12	NONE	NONE	995	1,230	6,630	108,518
13	NONE	NONE	1,053	1,221	7,321	108,077
14	NONE	NONE	1,115	1,273	8,173	108,048
15	NONE	NONE	1,181	1,395	9,095	108,432
16	NONE	NONE	1,252	1,599	10,099	109,237
17	NONE	NONE	1,324	1,891	11,291	110,447
18	NONE	NONE	1,402	2,285	12,585	112,074
19	NONE	NONE	1,483	2,792	14,092	114,114
20	NONE	NONE	1,572	3,429	15,729	116,588
AGE 65	NONE	NONE	2,704	34,971	67,471	189,671
AGE 79	NONE	NONE	4,242	143,377	203,777	323,416

請注意表格中的以下幾點：

- 只要每月存97元（或每年存一次，存1075），存第一筆錢後，就有了\$100,000的人壽保險。存款人因任何原因發生不幸（二年內自殺除外），家屬都可以至少獲得\$100,000現金賠償。
- 僅存五年，即可不必再存而保一生。若認為五年時間太長，也可將五年應存的5,000多元一次或分兩次存清（提前存錢，有約5%的折扣）。

- 可以在任何時候退保取出現款。16年後，可取出約\$10,099，增值近一倍。20年後可取出\$15,729，增值3倍，此增值較銀行零存整取的增值率為高。
- 可在世界任何地方取款，只要填一張取款單即可。
- 如果每年取出紅利，存款所需時間將相應延長。第五年停止存款後，累積紅利替自己自動存款，而因出現數年累積紅利下降的情況。

您想知道您的存金、保金和盈利情況嗎？請與我們聯系

- ▲中國人喜歡把錢存入銀行，但您知道存入保險儲蓄帳號的好處嗎？
- ▲在美國，人壽儲蓄保險是每個人生活的必須品。
- ▲美國人、日本人投保率很高；華人投保率却較低，乃不知其好處之故。
- ▲人壽儲蓄保險，或早或晚一定要辦。但晚辦不如早辦。

王炳章保險儲蓄服務

(中國之春創辦人) (擁有美國各大州營業執照)

專辦高盈利人壽保險儲蓄

目前利率7.5%—12%，高於銀行存款 也做個人和集體醫療保險

原理 ● 投保人把錢定期存入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集中分散資本進行大規模長遠投資，獲得高額利潤，再回饋於投保人。

● 這是一項人們互相幫助，分散個人風險的社會計劃。

公司 □ 您將投保的公司是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之一——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

□ 大都會公司有一百多年歷史，分公司遍佈全球。僅美、加兩國計有四千四百萬人投保，總資產一仟多億，平均每分鐘付給投保人和受益人的現金達四萬多元。

□ 大都會公司不是私人擁有的賺錢公司，它是投保人共同擁有的集體所有制公司。每個投保人有投票權選舉董事會。公司盈餘將以紅利方式分給每個投保人。您投保（投資）越多，紅利就愈多。

□ 保險公司業務由聯邦和州政府立法保障。

手續 ● 類似長期定期存款。先填寫申請，批准後，即可開辦保險儲蓄。

好處 □ 開戶投保後，保值立即有效，全家福利即刻受到保障。

□ 急用款時，可隨時退保取出存款和利息（但要扣除行政消耗），或是貸出存款（保險仍有效）。

□ 每年有紅利（紅利不付稅）。

□ 向銀行貸款時，人壽儲蓄保險可做為信譽和抵押財產。

□ 給兒女大學教育經費提供保障。

□ 補充退休金。

請您撥個電話，或寄此單至下述地址；

申請辦理人：姓名

由王炳章博士給您親自解釋和辦理：

地址

請寄：

DR. WANG BINGZHANG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電話：718-639-0624 (24 小時)

電話

關於保險儲蓄的調查及申請

- 1 對於保險儲蓄：以前不知道 略為了解 了解 已辦
2 我的身份是：大陸新移民 台灣、香港新移民 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
台灣、香港留學生 美籍華人
3 我投保的公司是（已辦者）：大都會 Prudential 公平 紐約人壽 其它：
4 我認為保險儲蓄計劃：非常必要 必要 不必要 不可靠 無意見
5 我對保險儲蓄：很有興趣 有興趣 無興趣

姓名： 性別 年齡 我介紹下述人參加保險儲蓄
地址： 姓名：
 地址：
 電話：
最方便打電話時間： 電話：
和我的關係是：親戚 朋友 同學 同事

關於保險儲蓄的調查及申請

- 1 對於保險儲蓄：以前不知道 略為了解 了解 已辦
2 我的身份是：大陸新移民 台灣、香港新移民 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
台灣、香港留學生 美籍華人
3 我投保的公司是（已辦者）：大都會 Prudential 公平 紐約人壽 其它：
4 我認為保險儲蓄計劃：非常必要 必要 不必要 不可靠 無意見
5 我對保險儲蓄：很有興趣 有興趣 無興趣

姓名： 性別 年齡 我介紹下述人參加保險儲蓄
地址： 姓名：
 地址：
 電話：
最方便打電話時間： 電話：
和我的關係是：親戚 朋友 同學 同事

關於保險儲蓄的調查及申請

- 1 對於保險儲蓄：以前不知道 略為了解 了解 已辦
2 我的身份是：大陸新移民 台灣、香港新移民 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
台灣、香港留學生 美籍華人
3 我投保的公司是（已辦者）：大都會 Prudential 公平 紐約人壽 其它：
4 我認為保險儲蓄計劃：非常必要 必要 不必要 不可靠 無意見
5 我對保險儲蓄：很有興趣 有興趣 無興趣

姓名： 性別 年齡 我介紹下述人參加保險儲蓄
地址： 姓名：
 地址：
 電話：
最方便打電話時間： 電話：
和我的關係是：親戚 朋友 同學 同事

在美國，如果你掙十元錢，其分配計劃應該是：
八元用於衣食住行和投資，一元存入銀行，一元
存入保險儲蓄。

——一位財務計劃師

在美國，唯一使你辛辛苦苦置下的產業和掙來的金錢不被美國徵稅的方法，就是人壽儲蓄保險。

——一位美國大法官



BUSINESS REPLY MAIL
FIRST CLASS MAIL PERMIT No.923 FLUSHING,N.Y.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Wang Agency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NO POSTAGE
NECESSARY
IF M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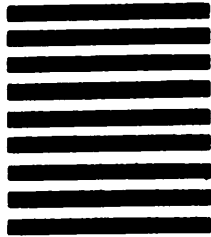


BUSINESS REPLY MAIL
FIRST CLASS MAIL PERMIT No.923 FLUSHING,N.Y.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Wang Agency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NO POSTAGE
NECESSARY
IF M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REPLY MAIL
FIRST CLASS MAIL PERMIT No.923 FLUSHING,N.Y.

POSTAGE WILL BE PAID BY ADDRESSEE

Wang Agency
80-50 Baxter Ave. # 777
Elmhurst NY 11373

NO POSTAGE
NECESSARY
IF M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為很好和好的人有二成四；認為不好和很不好的人只有百分之八；認為表現普通的佔三成。填寫「不知道」和「沒意見」的人佔最大比重（三成八）。

二、關於台灣發展經濟大陸可否借鏡

當問及「若您認為台灣經濟成功，那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大陸可否借鏡」時，七成五的人認為可以借鏡，僅一成的人認為不可借鏡。但問及「您是否贊成在大陸實行像台灣那樣的私有制經濟」時，三成九的人贊成，四成一人不贊成。在不贊成的人中（一百廿九人），有卅七人認為實行私有制會造成兩極分化；一百零四人認為私有制不適合大陸國情，其中一部分人認為應「公有制和私有制並存」（大陸式的公有制）、「在適當控制的基礎內可以發展」，另外一部分人則認為在大陸實行台灣式私有制經濟「不可能」、「官僚們將反對，因為他們將喪失特權」；十四人認為私有制有剝削；十三人認為實行台式私有經濟和馬列、毛澤東思想違背（此題為複選）。

當問及在大陸實行台灣式私有經濟大多數人是否會接受時，近五層的人認為會，四成的人認為不會。在認為不會的人中，一部分人認為幾十年社會主義「大鍋飯」造成人們的人格情性難以接受私有市場競爭的衝擊和風險；一部分人認為既得利益者將全力反對，因為那樣會失去他們的既得利益；極少部分人認為因為社會公有制優於私有制經濟而人們不會接受。

三、關於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估計及條件

當要求受訪者對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歸還

大陸之前的大陸和台灣關係做估計時，一成二的人認為會保持現狀；二成的人認為雙方會展開有關統一的政治談判；六成九的人認為雙方尚未展開政治談判，但各方面交往頻繁；不到百分之十的人認為台灣會獨立。當要求受訪者對三十至五十年後的大陸和台灣關係作估計時，一成一人認為會保持現狀，二成二人認為大陸會統一台灣，僅一人（百分之零點三）認為台灣會統一大陸，二成的人認為台灣會獨立，三成七的人認為雙方會成立聯邦式政體，二成一人填寫「沒意見」和「不知道」。

當問及是否贊成大陸和台灣報紙相互在對方銷售時，九成的人贊成，百分之三的人不贊成，百分之七的人填寫「不知道」或「沒意見」。在問到「如果台灣人民要求國民黨和共產黨平等競爭，作為政治談判的先決條件，您認為大陸『政府』是否應該同意」時，六成二的人認為應該同意，二成三的人認為不應同意，一成二的人填寫「不知道」或「沒意見」。另有八人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應同意，但不會同意」。當問及「您認為將來大陸是否會出現多黨競爭的局面」時，五成八的人認為不會，二成一人認為會，一成七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沒意見」。另有百分之五的人填寫「應該出現」或「有可能」。如果受訪者認為可能出現多黨競爭局面時，問卷請其估計約需多少年後，這種局面才會出現。廿八人認為五十年後，廿七人認為一百年後，有十五人認為需一千年後，才可能出現。

當要求受訪者對五十年後，大陸和台灣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做估計時，四成五的人認為台灣會領先大陸，二成四的人認為會大致相同，一成四的人認為大陸會領先台灣，一成七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沒意見」。

四、關於對台獨的看法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對「台獨」持極強烈反對態度。但大多數人不傾向使用武力統一台灣。當問及「如果台灣宣布獨立，您認為大陸『政府』會如何反應」時，二成五的人認為會出兵干預，六成的人認為會出兵，但以其他強硬政治、外交手段干預；百分之一的人選擇「不採取任何行動」，一成三的人表示「不知道」或「沒意見」。當進一步問及「如果因為出兵制止台灣獨立，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您認為大陸『政府』應該如何？」時，二成三的人認為仍應不顧代價，出兵干預；六成四的人則認為應衡量得失，量力而為。

五、其他

關於美國和日本對待中國統一的態度，受訪者表示出不信任和消極的估計。六成一人認為美國政府是公開支持，暗中阻撓；三成二的人認為他們是公開支持，但私下中立；僅百分之二的人認為他們公開、私下都獨立支持。

當問及如何評價大陸「政府」對待來訪和探親的台胞時，四成八的人認為過分優待，四成一人認為正合適，僅百分之二的人認為過分冷淡；有百分之八的人選擇其他的答案，他們認為「某些方面過分優待」、「應順其自然」、「量入而待」。

對大陸留美學生調查部分

調查係採用郵寄問卷之方式。問卷之發放，乃根據集群抽樣（CLUSTER SAMP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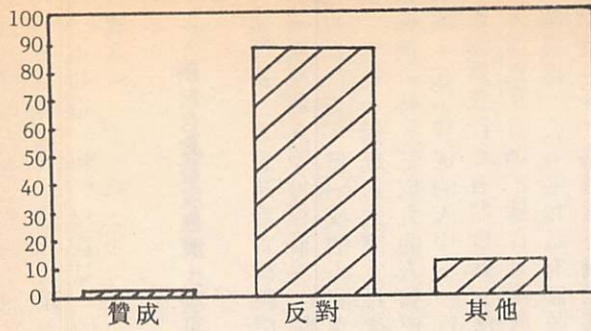
設計；先選出若干有代表性的學校（如東北部、中西部、南部、西部學校等），再在選中的學校中，根據該校的所有大陸學生之名單，每人發給問卷。一共寄出兩千一百份問卷，回收六百零七份，回收率為百分之廿九。調查結果如下：

一、大陸留學生之政治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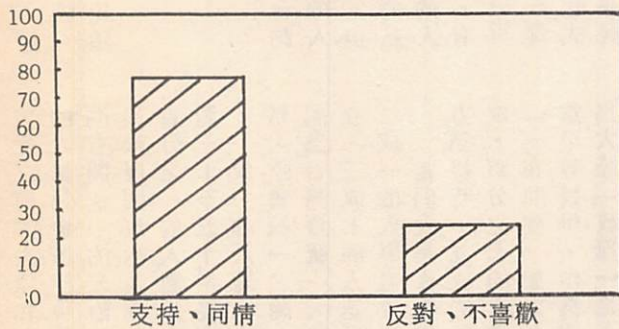
大陸留學生的政治態度，可概括為：自由民主傾向明顯，富於獨立思考能力，但同時亦表現出對政治之厭倦。

當問到是否同意將「四個堅持」寫入「憲法」時，八成九的答卷人不同意，一成的人未明確表態，而同意的只有百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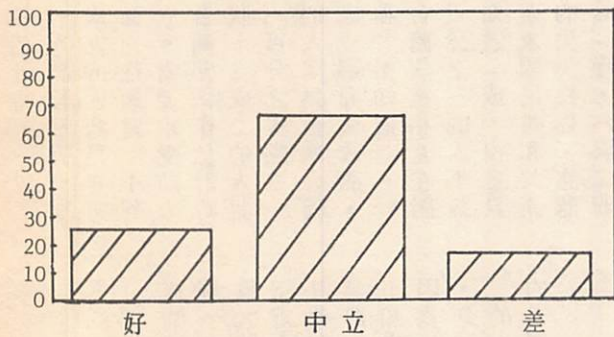
對憲法中寫進「四項基本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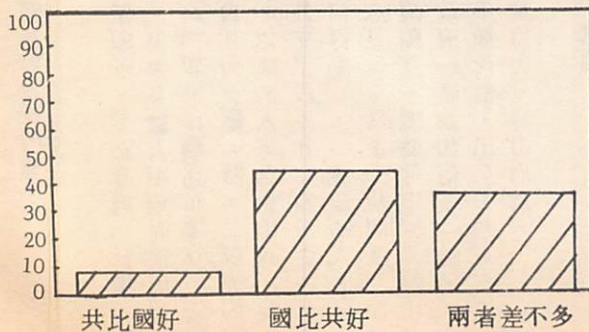
對中國之春的態度



對國民黨的印象



國民黨與共產黨比較



這個百分比反映出大陸留學生的民主意識與獨立思考傾向。從答卷者對「中國之春」的看法中，亦可作出同樣的結論。

在答卷的學生中，對「中國之春」持支持或同情的態度者，佔百分之七十六。當問及支持或同情的原因時，半數以上認為是因為「有個反對派（相對於共產黨）的聲音總比沒有好」。反對或不支持「中國之春」的人佔百分之廿四，其中大多數人（百分之五十八）認為「中國之春」「不客觀」。

多數受訪者表示出對政治厭倦。在給「政治前途」、「經濟待遇」、「學術成就」在每入生活中的重要性打分（〇—十）時，學術的平均分最高，為八點四，經濟為七點一，而政治只有五。

二、對台灣之態度

在調查中，當問及「是否贊成在大陸實行像台灣那樣的私有制經濟」時，許多人贊成私有制，但不贊成（或不瞭解）台灣的私有制。有二成一人對國民黨在台灣領導的政府有好感，大部分（六成二）持中立，一成三的人有反感。

對台灣經濟近三十年來的發展，九成二的人認為成功。但問到「台灣經濟發展經驗大陸可否借鏡」時，比率降為八成六。在比較四十年來國、共兩黨在海峽兩岸的作為時，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國民黨比共產黨為人民做的好事多；百分之四的人認為相反；三成五的人則認為兩黨差不多。

公有制與民主

峻天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人類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鬭爭日益高漲，就連最專制的中國大陸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游行。爭取「民主、自由」已經成爲當今世界的一種潮流。這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有人指出，縱觀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國家是計劃經濟同時又是民主政治。一些政治學家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實行真正的民主？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應該搞清爲什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產生民主政治？

無產階級革命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

讀過西方歷史的人都知道，民主政治起源於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於這些國家的商品經濟發達，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在民主革命的初期，革命的目的是保護人民的自由不受專制的侵犯。到了民主革命的後期才發展成建立民主政治。這一革命的性質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民主革命性質。

無產階級革命大多發生在貧窮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商品經濟不發達，貧富懸殊，多數無產階級得不到溫飽。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革命具有下列特點：

(一)由於無產階級處於社會的底層，經濟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低下，社會活動範圍狹窄，從而決定了他們的政治意識的局限性。

(二)無產階級革命是以均富和消滅私有制爲主要目的。以無產階級爲主的共產黨，如果不以均富爲，消滅剝削制度爲號召，是得不到爲數衆多的無產階級支持的。參加這一革命的多數人是因为生存受到威脅。而資產階級革命從一開始就是要達到保護人類自由的目的。這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

(三)共產黨以暴力革命爲主要手段，主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本身就是反民主的，結果必然演變成少數人的集權政治。

由於以上的種種特點，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是非民主的，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的。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質

具體看中國，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起源於最貧窮的江西省。中國的革命是以農民爲主的農民革命，參加革命的農民多數因爲得不到溫飽而造反的。大多數人沒有受過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求生。中共正是利用這些人的弱點，以均富和無產階級專政爲號召進行暴力革命的。中共的專制早在一九三四年就開始了，從遵義會議毛澤東奪取了領導權開始，經過黨內十幾次鬭爭，先後打倒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等人，到了四九年中共的專制已經定形，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已經徹底被破壞。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整風，毛澤東爲了樹立起

個人的權威，對王明爲主的中共領導人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殘。多少共產黨員不斷地重復毛澤東的話，以毛的話爲真理標準，這與後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多麼相似。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歷代的農民起義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它不過是兩千多年農民起義的繼續。就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不可能產生民主政治一樣，中共的集權也不過是中國兩千多年王朝的繼續。

公有制與民主結合的可能性

有人指出：從理論上講，公有制與民主政治並非絕對不可結合。

隨着民主國家的經濟日益發達，民主政治的影響不斷擴大，人類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已經成爲世界潮流。使今天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增加了。

今天的公有制國家雖然不存在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但是公有制國家的人民與四、五十年代的無產階級也是不同的。以知識分子爲代表的人民，已經開始懂得民主、自由對社會的重要。而是爲生的民主運動決不是僅僅爲了溫飽，是爲了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這與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同樣的性質。

例如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爲首的捷共就是在人民的壓力下取消書報檢查制度的。如果沒有蘇聯的外來鎮壓，捷克也許已經實施了民主。這一事實向我們揭示了民主是可以靠鬭爭取得的。公有制與民主政治的結合也是可能的。

公有制與民主政治不可能長期共存

當公有制國家在民主力量的壓力下，實施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大多數人贊成公有制，以民主的方法決定社會的經濟形式，而少數人的民主權利仍然受到保障。顯然這個社會仍然是民主的。但是公有制是否能在民主政治下長期存在？

人類社會是以人為基礎的，人對社會形式的態度，換句話就是群眾對公有制的支持或反對是隨着社會的發展不斷的變化的。

社會的生產力是否被這個社會的生產關係促進將是決定這個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相互依賴的，生產力的發展依靠與之相應的生產關係，如果生產力的發展受到生產關係的阻礙，必然帶來經濟落後，社會不穩定，甚至出現危機。最後發生打破這種生產關係的變革，產生新的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使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公有制的缺陷正是公有制的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企業缺乏效率。企業既不是廠長的也不是工人的，而是一個抽象的國家的。如果沒有人監督，工人會怠工。企業代理人對產品質量的改進，設備的改善，以及產品成本的降低漠不關心。公有制計劃經濟下不存在那種你死我活的競爭，而這種競爭正是生產力發展不可缺少的。社會主義企業成爲懶漢的溫床，均富的結果使人們喪失工作的積極性。因此，公有制計劃經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必然使經濟落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甚至下降。

另一方面，計劃經濟使國家包攬一切，顧此失彼。社會的總需求是隨時變化的，在今天這樣複雜的經濟活動中，要想找出一個最優的計劃，顯然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產生嚴重

的官僚主義，計劃失誤。

馬克思認爲人類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公有制的發展是依靠人的覺悟提高的。共產黨一向以具有改造人的能力而自誇。四十年來搞了大量的思想教育，什麼「社會主義教育」「學雷鋒」「五講四美三熱愛」等等，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結果是人的素質不斷下降，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共產黨對人性改造的失敗，說明人類的本性是不可能通過簡單的說教改造的。

以上幾個方面證明公有制計劃經濟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必然導致人民對公有制不再支持。如果這個國家的政治仍然是民主的，最後人民會以投票的方法取消公有制。所以公有制與民主政治是互不相容的。公有制國家實現了民主政治，最後公有制會被民主政治消滅。

民主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今天中共的改革已經進入第十個年頭了，改來改去，進展不大。就連農村也失去了最初的活力。趙紫陽提出的「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說穿了就是爲中共改革失敗作掩護。進來中共又把希望寄托在價格改革上，沒有一個市場調節的私有制經濟體系，單純的物價改革只能引起過度的通貨膨脹，增加社會動亂。最後倒霉的還是中國人民。

中共的改革是以不危害中共的集權統治爲前提的，而改革的症結正是中共集權本身，不改變這個集權統治，不放棄「四個堅持」實施民主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民主政治是科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人類社會幾千年演變的結晶，也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爲你提供諮詢服務。

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收取服務費，爲你提供諮詢服務。

本會通訊處：Chinese Political Refugee Association 聯繫人：王忠蜀（會長）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Jackson Heights
New York 11372 TEL: (718) 896-9700

朱永祥（理事）
劉 樞（理事）



從「反清復明」

到「明復共和」

尚昆

到學習西方文明

少林寺的高手們，雖然身懷絕技，他們反清復明的壯舉終於毀在清兵的炮火之下。孫中山先生發動了革命，欲建立共和，不幸日帝侵華，革命成果落到了另一群「反清復明」的人手中。他們號稱中共，全名是「中國反清復明共產黨」。當時，很多人誤以為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是革命志士。事實上，他們是保皇黨，建立了一個封建的新王朝。革命者應和皇帝勢不兩立，又怎肯選天安門這封建的建築物為檢閱台？中華人民王朝的始皇帝却選中了這個地方。自古皇帝登基，一定要大殺功臣。於是高崗、饒漱石、彭德懷……一個個就被清掃了出去。在舊明朝，「文字獄」很普遍，在中國或新明朝中，講錯一句話就帶來殺身之禍。在新明朝中，講究出身，「你父親是什麼人？」在這封建血統論下，毀滅了多少青年人的前途！新明朝始皇帝很少讀馬克思的著作，始皇最愛不釋手的一本書是「資治通鑑」，一本關於皇帝如何統治子民的書。始皇像歷代皇帝一樣，有絕對的權力。他竟得意地說出：「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個革命者，是人

民的僕人，絕不會以百姓救星自居，絕不會接受「萬歲」的稱呼。始皇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千百萬人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始皇厚着臉皮竟說是別人崇拜他，他被迫接受。始皇實際上不會被迫接受什麼東西。彭德懷提一句異議，結果就坐到監獄裡去了。始皇沒兒子，在他駕崩之前，以「你辦事我放心」一句話就指定了華大員為繼承人。始皇的舊部下先後逝世，高幹子弟們馬上承繼父位，成為高官。在新明朝中發生的一切，是標準封建皇朝中的故事。

人民忍受夠了，看清楚了。要反明朝，復共和，革命可能會爆發。革命有兩種，一種是法國式的革命，把對方推上斷頭台，後來自己又被人推上斷頭台；一種是英國式的和平、鬥爭、漸進式的革命。今天英、法都達到高度民主的社會，可是法國人民經歷的痛苦就大得多。

若採取法式革命，先將中共捨不得懲罰的四個自己人（——四人幫）五馬分屍，再從高

幹子弟手中奪過政權。而對方有重兵和軍權，自不甘失敗，於是內戰爆發，殺得人頭滾滾……顯而易見，中華民族從抗戰到內戰，經歷次運動乃至文革負傷太重。任何「人頭革命」都是不適合的。在一個國家內，流血革命，往往是易暴易亂，很難建立和鞏固民主政治。革命專制，再革命，再專制，這個惡性循環不應再繼續下去。

另一種是英國式的鬥爭方式，是漸進式革命。這種革命的理論依據是中國人的一句箴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個理論不符合一個猶太人——馬克思的趕盡殺絕，鬥爭至死的專政哲學。但符合另一個猶太人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於是，首先將四人幫放出監獄。他們也是人，人之初，性本善。這些人受到權力的腐蝕，越變越壞，像生了政治麻瘋病那樣。繼續讓高幹子弟享有特權，支持他們經商，由官商開始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化。像英國和西班牙那樣把皇室貴族們供養起來，實際上花不了太多錢，又能使改革順利化，避免流血鬥爭。以民主思想影響現在中國的當權派，及潛在的當權派，及高幹子弟們。讓他們和民運潮流一起共進，互相利用。若能在軍事領袖中求得像蔡鍔這種人更是求之不得。我認為，民運若不能影響當權派和高幹子弟，若得不到他們的合作，是很難成功的。這些人可以被影響嗎？答案是肯定的。當年元朝和滿清先後用武力征服過漢人。而漢人的文化高，漢人的思想却征服了他們，他們被漢人同化了。這是歷史上思想征服的先例。毛始皇在過去三十多年，一向推行愚民政策，在中國實行封建家長制的政治，破壞生產發展。這些封建東西是早就過時的古董。毛始皇，自稱像太陽，不錯，他的封建思想正像日薄西山的殘陽，反動且沒

落。而民運的指導思想是進步的，民主的真理一定會影響中國的當權派，只要民運人士繼續進行「思想征服戰」，繼續進行「滲透戰」。共產黨會變嗎？答案也是肯定的。沒有不變的東西。右派會變成左派，左派又會變成右派，共產黨是可以變成民主黨的。我們應看到人性的光明一面。

文革時造反派狠批趙紫陽。揭出他說過：「引蛇出洞，慢火煎魚，學生中的右派留待運動後期處理」。我當時，驚服此人真厲害！但文革引出洞的是趙紫陽，煎的也是趙紫陽。經過文革的慢火一煎熬，這位未來的總理變成了另一個人。他變得比所謂學生中的右派更右，他進行經濟革命，在與保皇封建派的鬥爭中，一馬當先，對付中國幾千年封建的老樹盤根真不簡單，於是我還是說，這個人真厲害！當然是讚揚他。這令我想起保羅的故事，保羅先是與耶穌的人作對，後來他變成耶穌的堅定使徒。中國是東方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不是誇口，日本也借用中國人的漢字。但中國也是東方黑暗封建的堅強堡壘。這個封建根據地，能容納四書五經，本草綱目，甚至三教九流，無所不容，却包容不下十個字的確！這封建大堡壘裡在羅泊湖容忍一顆原子彈意外爆炸，却容忍不下這十個字，到底是哪十個字？原來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今天，爭取民主的鬥爭仍然很殘酷。在此，也不必提醒大家。講了幾句話至今仍在坐牢的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相信大家不會忘記的。我不是信徒，但讀了很多聖經故事。此刻聯想到，民運鬥爭的形式很像耶穌使徒們的鬥爭形式。民運戰士們從不講暴力，只是傳播民主的福音。却被送到監獄中去。民運人士手中不拿刀槍，中共視之如洪水猛獸，談「民」色變。寧可與和

中共仇殺了十多年的國民黨人接觸，准讀「中央日報」，却不敢和民運的文弱書生接觸，不准讀「中國之春」。

民運戰士為佈道民主的福音，披荆斬棘，坐牢、犧牲。他們的偉大事跡將會像聖經記載的使徒行傳那樣，記錄在中華民族的英雄榜上。團結在「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十個字之下的新十字軍，以西方為基地向祖國進行新十字軍「東征」。中華民族不是下賤的民族，他們同樣有權享受美國人的自由生活。若要振興中華，只有接受西方文明。抱着大刀長矛不放的非洲小部落，許多被滅於洋槍洋炮之下。中國人較部落人聰明，很快放棄了十八般兵器，學會了使洋槍洋炮，今天還學會了造洋人的子彈和原子彈，中國人先是用打火石、點油燈，後來學西方用「洋火」（火柴）點洋燭，最後學洋人用電燈。設想一下，中華民族若不接受西方現代文明，軍隊仍用關刀、蛇矛、刀劍，沒有電燈，沒有汽車，沒有飛機大炮，沒有電報機，相信中華民族今天早已被人滅了。「應虛心向洋人學習」這個論點是毫無異議的了。問題在於向哪些洋人學習呢？中國人之外的人，都是洋人。毛始皇一向主張學北方的洋人，學俄國人——伊里奇·列寧和約瑟夫·斯大林，日本人則一向學西方的洋人。日本戰前學美國，成為強國。戰後更加學美國，連憲法都像美國，戰後的日本就更加富強。今天的日本在許多方面已經超過美國。從前有個西方記者狂妄地說：「亞洲沒民主。」他今天一定會後悔說過這句話。日本已經是一個標準的民主國家，再看一看中國，毛始皇一方面保持了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從俄國洋人處學來了許多「黨支書」、「政委」等等洋東西。天安門廣場上供奉着四個洋人的巨像，他們是卡爾

·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列寧、約瑟夫·斯大林。我的一個朋友曾作過一番風趣的評論，他說：「我已經夠崇洋了，我發現外國的姑娘，三圍特別夠『勁』，我總忍不住多看兩眼。而男人們的鼻子又高又直，特別威風。可是連像我這樣崇洋的人，對天安門上的四幅洋人像都很反感，不知為什麼？」列位看官，連「崇洋派」都看不順眼的「洋人四人幫」，中共却要三十多年來如一日，把這「洋四人幫」當成祖宗來拜。凡是「洋四人幫」講過的話就是真理，稍有疑問都不可以。這樣的崇洋，若用林彪的話來形容叫「到了我們當代的最高峯」。我朋友對「洋四人幫」的反感，是因為他們的理論，禍害中華民族非淺！我的朋友說「若天安門廣場那四幅像架是一定要留給『外賓』看的，是非掛洋人像片不可的，那麼，我希望改掛華盛頓、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林肯。讓國內老百姓開開眼界，不必掛三十年，掛三年就夠了」。

今天的中國，急需政治改革。五個現代化中，政治現代化應擺在首位。過去，中國生活在昏暗的油燈照明之下，今天，中國已生活在來源於西方的電燈照明之下，倍感光明。明天，中國人將生活在自由神萬丈光芒的火炬之下。那就是振興中華的日子！中國，要像日本那樣，努力學習西方文明，學習美國，甚至將來有一天超過美國。民運的目的就是如此。要把封建中國改革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列位看官，各位愛國志士，讓我們一齊來支持民運，支持中國之春運動，出一點力量就是一點力量。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中，馬拉松長跑傳火炬那樣，把美國自由神手中的火炬，傳到我們的故鄉祖國，需要千萬萬個跑手、傳手，你就是其中一員，祖國在等待着你們！

談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關係

程玉

(這篇文章在八八年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上宣讀過。)

引言：

傳統的計算公式和新的變量參數

當今時代，人們已普遍地信服了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與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經典的理論家們如亞當·斯密 (ADAM SMITH)，約翰·斯圖亞特·米爾 (JOHN STUART MILL)，卡爾·馬克思 (CARL MARX)，馬歇爾 (MARSHALL) 等都對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做過宏觀的系統觀察和總結。現代經濟學家則更偏好用數學的語言來定量地研究這兩者間的關係，其中頗值得提及的是奧克拉斯 (AUKRUST) 在五十年代對世界大戰後歐洲生產總額的一項研究，該研究開始試圖用經典的計算公式 (COBB-DONGLAS PRODUCTION EQUATION: $P=ALC$)——其中以勞動力與資本作為參數——來計算歐洲在戰後的生產總輸出額，發現勞動力與資本的

增長已完全無法解釋生產總輸出值的增值，於是奧克拉斯便引進了新的變量參數，即所謂「技術進步」值 (TECHNICAL PROGRESS)，也就是說，他將戰後西歐生產總輸出值的猛增歸結於勞動力市場的廣大，投資的增加以及技術的進步這三種因素。考慮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即科學實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一系列重要軍事技術、發明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以及組織化工業對科研成果的成功有效的應用，我們便不難想像為什麼奧克拉斯會將「技術進步」與生產實踐聯繫到一塊兒，不難想像他的新公式為什麼會獲得普遍的承認，並且對此後這方面的研究，甚至對許多國家的具體實踐產生重大的影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許多新的獨立國家，新的政治環境給經濟繁榮帶來了新的希望。一時間，經濟發展成了這些國家的普遍議事重心；另一方面，大部分東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冷戰階段，其中具體的體現之一，就是經濟與軍事的實力競爭。因而很多發展中國家和

發達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上述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下，把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當作是經濟發展、樹立國際威望的杠桿。許多學者也紛紛製造輿論，聲稱如不發展本國獨立的科研、技術力量，經濟的發展將無從着手、無法展開、更不會成功。從這一段科研與經濟發展結合的密月期迄今已有三、四十年過去了，這些國家的實驗為我們對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反省和認識提供了大量的事實材料，特別是中國目前也把科技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作用提到了相當的高度，因此，更有必要在對其他國家經驗的研究中對這三者間關係作出客觀、清醒的認識。本文就是想對此作一初步研究的嘗試。

科學研究和經濟發展之間

沒有絕對的關係

一般來說，認為科學的發展將刺激技術上

的革命，進而導致經濟效益的提高，這一因果觀念來自於對西方國家一些成功先例的總結。然而，即便是在這些所謂成功地結合了科研、技術與發展的先進國家，大多數研究科技史、經濟發展史等有關學科的學者們仍然認為，從科學發現導致技術發明，再導致經濟發展這一系列過程是相當複雜的，需要在具備了很多必要和充分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實現，由於這些條件的限制，成功地完成這一過程的實踐往往是特例，而並非是慣例。早在六十年代初，很多有關研究在聯繫歐洲各國對科學研究經費的投資與經濟增值時均發現這兩者的相關性微乎其微，從這些宏觀的「相關性」研究中，當然不能得出科研與生產或經濟發展無關的結論，但至少指出兩者的關係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換言之，不是說在科研上花的錢越多，在經濟上的收益也就自然而然的會最大。較之這類「相關性」研究更為微觀的分析，使很多學者把着眼點深入到溝通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從技術發明到工業應用，從工業成品到市場效應這一系列的轉化過程，什麼是推動中間轉化的因素？什麼又是妨礙轉化的因素？譬如：通過這一類微觀性的研究，有些學者指出，絕大部分科研成果在工業生產上的應用，一般都需要經過更進一步的創造性設計或技術發明才能得以現實。然而這些進一步的設計和發明，加上技術革新對舊生產過程的改造，以及對市場能力的調查研究等等，均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說，對於工業製造業來說，應用新科研成果，採用新技術是要冒風險的，更尤其技術革命往往要求對舊的行政管理制度加以改造以求配套。以上這兩點：即革新的風險性、革新對管理技術上的新要求——大大地限制了科學發現對經濟發展產生直接、有效的影響。由上

述可見，由於科學技術的應用與傳播是十分複雜、艱苦、冒險的過程，人們對其的選擇就必然是在某種壓力下挺而走險的舉動。然而光有壓力還不夠，壓力——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罷——可以轉變為要求技術革新的願望和積極性，但這一願望和積極性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得到建設性的發揮。舉個例子來說吧，在比較了英、德兩國的化學研究對工業發展的貢獻後，一位學者發現，對科學的應用往往依賴於是否存在著學術研究機構中不能吸收的「剩餘」科學家，德國在本世紀初便有大批這樣的剩餘科學勞動者，而英國則不具有。德國的「剩餘」科學家由此轉入了應用界並發揮了作用，使德國的化學工業遙遙領先於英國。這位學者認為，當傳統的學院學術活動發展到十分成熟完備的階段時，往往可以成為妨礙其科研成果轉化為工業效益的障礙。因為一個完善的學術環境往往會使其成員（學者或學生）過份地與其認同，因而使他們的學術興趣、熱情、對榮譽的追求等等統統局限在學術圈子裡，而不再到陌生的環境中去尋求挑戰和發展。因此只有在學術機構人員飽和的狀況下，剩餘的科學家才會迫於就業的需要而在工業應用的科研機構中另辟蹊徑。

科學研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通過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所形成的

我們剛才提到了工業界往往是在某種壓力下才產生出對科學應用或技術革新的要求，還談到了科學家在某些國家中往往是在迫於就業需要的壓力下才進入應用界尋找機會。但如果這些壓力要能真正把科研與應用、與搞各方面

生產的人材結合起來，首先還需要一種自由競爭的、開放型的社會組織結構，以保證相當程度的橫向，即跨行業人員的流通，以及行業間自由的、便利的、高效率的信息流通。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形成了促使工業界要求革新的壓力，由此才會想方設法通過優厚的生活待遇、工作條件以吸引科技人材；同時也只有在開放型的組織體制中，科技人材才有可能在應用界的吸引力或學術人材過剩的推力下被擠入工業、應用界。而學術科研與應用科研之間信息渠道的暢通是兩者之間能夠相互刺激和影響的基本條件。

妨礙科學人材流入應用行業的原因不僅僅可能來自於結構或制度的制約，同時可能來自於觀念上的局限。譬如，有些學者認為，英國的實業界與學術界同時存在一種極為強烈的相互輕視的傳統意識，這種意識阻礙了人員和信息的交流，致使英國的學術科研對生產應用貢獻甚微。

其實學術界與應用實業界保持距離也不完全是非理性的舊觀念在作祟，其中關係到純粹學術科學能否獨立履行自身使命的原則問題——即學術自由問題。我們知道，科學為人類提供了迄今為止最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解決人類的問題僅僅是科學的功能之一，而絕不是它的全部使命。科學的目標旨在理性地揭示了人類環境中的未知世界，科學根據自身的規律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這些課題可能與人類的其它活動毫無關係，或在一時一地暫時不存在任何關係。如果學術科學界沒有自己的課題，而總是為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實用需要牽着鼻子走，科學自身的發展將受到極為嚴重的威脅。所以說，科學活動的相對獨立性是十分必要的，也正因為如此，科學研究發現對

人類經濟、生產活動的貢獻就理應是間接的，即通過向實業、應用部門輸送人材，通過將自己的科研成果發表出去，并同實業、應用部門的科學人員進行積極、有效的交流活動來實現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的總結：首先，科學研究的成果可能會為生產革新、進步以及經濟繁榮創造機會。第二，科學研究是否真正能促進經濟發展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有能力、有條件利用這一機會。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實踐的過程是艱苦而冒險的，人們往往只有在有壓迫感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出革新的動機，這種壓迫感可能來自革新帶來的物質利益的刺激或不革新帶來的物質利益的損失，或兩者兼而有之。有了動機之後還需要有能力，譬如說需要有能力強，有創造性的工程、技術、科研人材可以為應用界提供服務。最後人的能动性與才幹還需要在獲得社會的政治、文化結構與觀念的鼓勵或認可的情況下才能得到發揮，當人們對生產革命的要求遭到政治制度、社會氛圍、文化意識的壓迫、打擊時，這種能動的要求不僅不可能成為導致生產進步的建設性力量，相反還會轉化為消極的破壞性因素。

以上有關科學研究、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討論基本根據於對西方發達國家這方面實踐經驗的總結，結論是科研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通過複雜的間接的渠道實現的，那麼，科研與發展的關係又是怎樣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體現的呢？

發展中國家學術研究與經濟發展

計劃中的「障礙因素」

由於目前的經濟發達國家一般來說同時又是科技的先進國家，人們很容易從中得到科技先進導致經濟發展的結論，也就是五十年代左右盛行的所謂「直棧模式」，按照這一理論模式，技術革新是科學發現的必然產物，一旦科學基礎研究的能力上去了，經濟自然會跟上去。由此可見，國家對科學的政策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總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七十年代初，這種「直棧模式」開始受到普遍的懷疑，許多國際性的有關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組織開始以審慎的觀點來看待經濟與技術、技術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並着重討論銜接科學、技術、生產各領域之間的「障礙因素」，以及技術的供、求能力在第三世界的種種表現，等等。

例如，學者們在研討拉丁美洲諸國學術科研與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的相互關係時，討論了一些「障礙因素」，其中有一些是與發達國家相同的，有些是發展中國家或某些發展中國家共通的，也有一些是拉美國家所特有的。根據本文需要可以例舉以下障礙因素：首先，拉美國家的大學、科研圈子與某些發達國家一樣具有一種輕視非學術性或說商業化科技研究的傳統，造成了學術界與工業實業界的相互隔絕，這種隔絕自然妨礙了兩者間的相互交流、刺激，使科研不可對生產發生間接的促進作用。此外，這些拉美國家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科學研究的組織結構自身有與科學發展及其與生產、社會實踐的結合不相吻合的弊端，其中之一即是教育與科研的脫節，科學知識在教學過程中被當作靜止的、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來傳授，學生只學會了簡單、機械地重複科學的結論，而沒有理解科學的創造過程和方法，因為沒有機會與科學家，更不要說與第一流的科

學家（從事科學教育的往往是職業教員，而不是科學家）相接觸。同時也缺少在實際「問題處理」過程中動手、用腦的能力和習慣，更不可能培養出對科研的廣泛、深入的興趣和科學家的獻身精神，低質量的、僅掌握一些陳舊書本知識的學生進入了應用實業領域不能為後者帶來新鮮的科研信息，也沒有能力投身創造性的技術革命活動。此外，這些國家的學術研究機構往往有分工過於死板、過份專業化的傾向，學科間人員和信息的交流、合作缺少渠道，甚至受到限制，然而技術研究項目往往是跨學科的，學科間的隔離使這些項目難以展開。由於以上談到的以及其它「障礙因素」，儘管在近二十年間，這些拉美國家為科學與技術的研究提供的經費有相當顯著的提高，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却極不可觀。但是，國家對科學的投資越多，對收效的期望自然也越大，低成效、高期望的結合，產生了對投資科學研究的懷疑，特別是一些小國家，似乎借用發達國家的技術比發展獨立的科研隊伍要經濟合算的多，當然，很多人也看到，借用其他國家的技術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也是一些中、小拉美國家面臨的一個沒有解決的難題。

技術轉讓不是「靈丹妙藥」， 「人力資本」受社會結構制約

即便一個國家不惜付出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代價而採取技術借用或通常所說的技術轉讓的策略，這些引進的技術能否在生產實踐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產生經濟效應，仍然還是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同樣是：這個國家的老百姓有沒有能力、積極性（動機），同時這個國

家有沒有適宜的政治、文化意識結構運用先進的技術為生產活動服務。我說到「老百姓」，是因為技術的使用往往深入到農業、工業、服務業的各個領域，也就是說需要人口中大部分人的積極參與，倘若說技術是靈丹，並不是說買回家裡來了窮病就除了，藥要吃下肚子，作用在人身上才能發揮，道理其實也就是這麼簡單。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技術引進」的文獻中，毫無疑問，人們在接受技術過程中有無積極性已被普遍認為是「轉讓」或「引進」成功與否的關鍵。如果依照前文所述的線索來討論，接受新技術的能力問題很早就為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經濟學家舒爾茨（SHULTZ）用經濟學的語言表達出來了，他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理論也是受啓示於戰後對德、日兩國的投資收益遠遠超過對一些落後國家的事實，認為德、日兩國之所以能有效利用物質資本是因為他們具有人力資本，而後者是由較為發展的教育水平（質量、普及化程度等）所奠定的。相反，一些落後國家的整個國民文化素質差，同時更缺少技術、專業的人材、骨幹，對物質投資的使用效率因之而受到限制。從此，我們可以看到，吸引技術的能力問題與一個國家的整個國民教育水平是有密切關係的。此外，還有很多學者把注意力集中於對人的「積極性」以及「積極性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的討論上，積極性即是我們所說的動機問題，積極性結構是我們所說的政治、社會、文化意識的結構中與激發或抑制積極性有關的部分。許多非洲國家在獨立之後接受了「人力資本」理論的影響，大力興辦教育，旨在提高國民的文化科學知識的基本素養，然而社會的「積極性結構」沒有配合受教育者成長的「積極性」，盲目地普及教育引出

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我們在此暫且不討論這些問題，而是重新回到所謂「障礙因素」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是如何體現的，特別是這些國家所存在的抑制個人積極性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結構。

「障礙因素」在第三世界國家的 主要體現

很多研究這方面問題的學者注意到，許多發展中國家中獨立的中小型個體企業、工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十分單薄脆弱，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期，這部分工業、企業曾經是技術革命的前陣，他們的企業家們充當了最為積極、活躍的角色，出現了很多成功致富的能工巧匠和具有創新膽識的人，而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國家中，情形往往是：一方面是政府機構、國營企業或外國大公司所組成的所謂「現代化經濟體系」（MODERN SECTOR）；另一方面則是貧窮落後的以農業為主體的「傳統經濟體系」（TRADITIONAL SECTOR），兩者的勞動條件、待遇之差如天壤之別，且之間沒有中間過渡階層，小型個體企業社會地位低下，無法吸引受過教育的人才，不可能成為創造或吸引先進技術的場所，因而反過來也就更難獲得發展，提高自身的地位。另外還有一些研究指出，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研究機構內部有很多不適用於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以及其傳播與使用的制度和傳統意識。譬如：第一，學術交流的效率低，質量差，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可能是由於缺少資金提供高質量的學術交流場所，如舉辦年會，出版雜誌、期刊；可能是圖書、雜誌管理不善；可能是傳統觀

念上把信息、情報當作特權或機密，缺乏開放交流的經驗、願望和習慣；也可能是科研、教研人員缺少交流學習的習慣，對現有的材料使用率低，等等不一而足。第二，科學研究以及教育機構之間的人員流通困難，科層制度僵化死板，而科學的創造、傳播、運用過程則是靈活的，是需要跨越學科的，科學的知識是發展、變化的，是需要不斷補充、更新的，組織機構上科研與教學的脫離，科學學科之間的隔絕，造成了科學發展與應用的滯固，我們在前面已有討論，就不再重複了。第三，科研和教育系統也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觀念、習慣、制度上不可能不受社會形態的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形態仍然以保守的傳統社會為主體，舉例說吧，傳統社會往往是老人說了算的社會，反映在學術、教育領域中即獎勵和升遷的論資排輩，這種制度常常打擊了年輕科學工作人員的創造熱情和積極性。再有，傳統的社會帶有很多農業社會的色彩，這種社會的組織形態以及人們的農民心態都會和出類拔萃的人過意不去，一些研究農民社會的學者把農民不把財富積累起來或投資，而是浪費在紅、白喜事或賭博上，以及窮人嫉妒富人要「吃大戶」的現象看成是農業社會保持社會貧富基本均等，因而社會基本和諧、穩定的機制。同樣的心態仍然反映在傳統社會的各個圈子和層面，所以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創新往往使創造發明者遭受嫉妒，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最後，我還想提到有些發展中國家存在阻礙學術思想、學術活動自由發展的正統意識形態，也十分嚴重地扼制了科學的想象、創造性和活力，造成科研學術界士氣低落、蕭條寂寂的局面。

「障礙因素」隨着不同國家不同的政治、文化、歷史背景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程度，

不可能在一篇短文中包羅囊括，需要在對個案與比較研究的結合調查中進行具體實地的分析和總結。要想瞭解科學與技術、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微觀性的具體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盲目地為別國成功或失敗的事例所迷惑，得出輕率、簡單的結論，都會導致政策制定上的盲目和謬誤，其結果往往非但不能促成科研與生產的結合，反而造成對科學活動自身價值的懷疑和輕視。

結論：建立新的社會條件 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綜上所述，本文所試圖討論的問題，可以大致歸納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儘管從世界範圍的直觀觀察，經濟發達國家曾受益於其發達的科學技術力量，然而從具體地對這些發達國家科技與生產關係進行分析研究時，我們發現，對科技的投資與經濟增長並無直綫的正相關關係，而更為具體、微觀的研究則顯示，基礎科研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在這些發達國家中間接進行的，這也就意味着從科研成果到經濟收益之間有一系列的中間過程，對這些中間過程的過渡的有利和有害因素不太為人所注意，但却恰恰是問題的關鍵，應該成為研究借鑒的重點。

第二，從對第三世界國家提高其科研水平或引進技術的經驗中，我們同樣看到從微觀角度研究科技在生產實踐中能否發揮作用的具體過程和條件的重要性，概括其結論，我們認為科技（自生的或引進的）僅僅為其應用提供了一個機會，對於這個機會的利用則有賴於人的能力，發揮這種能力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後者

聯繫到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結構，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點，科研成果或引進的先進技術都可能在轉化為生產實踐的過程中流產，從而無法結出經濟發展的果實。所以對發展中國家有礙發展人的能力，積極性、「積極性結構」的「障礙因素」的研究應該是核心。

第三，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社會形態上繼承了許多傳統、農業社會的遺產，而傳統的社會往往是在靜態中尋求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現代化社會追求經濟的高速度發展，社會從靜態轉入動態，原有的和諧和穩定會被破壞，而要在動態中求得新的和諧則必須拋棄以往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從而建立新的，這對個人，對民族或國家都會是痛苦的過程。舉個例子，以上我們談到「老人社會」的遺留物——職務升遷的論資排輩，是抑制青年科學家積極上進的一種妨礙因素，然而如果改變這種制度，社會的一些價值觀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同時也損害了老年人原來享受的實際利益。同理，中國青年報上前一段登載了一篇報告文學，記述了大部分歸國的ZBA沒有進入生產管理的決策中心，以便發揮作用。但試想，一個工廠或部門的領導人，把自己的工作人員、部下送往國外深造，難道就是為了他們學成之後回來代替自己的職位嗎？簡言之，一些有利於積極性發揮的結構，例如開放、競爭等等會給人們帶來物質上、精神上的壓力。前面的討論我們談到科技要作用於生產必須有一定的社會條件，現在我想要引起大家注意和思考的是新社會條件的建立又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我們在研究科研、技術、經濟三者關係時也應該綜合地估計到這些代價，甚至尋找出產生社會最大效益、最小虧損的最優途徑來，這將是應用社會科學的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

有獎徵集大陸留學生新通訊錄

新的學期開始了，各校迎來了新出國同學，並將編輯新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通訊錄。本刊特有獎徵集這些新通訊錄，以利於與各校留學生們的交流。如有可能，本刊將嘗試編纂全美、全日、全歐、全澳中國大陸同學總通訊錄。

▲凡寄本校全套的新通訊錄者，本刊贈寄過去兩年中國之春，並將贈閱中春一年；

▲提供不了全套通訊錄也無妨，凡提供十名以上大陸留學生通訊處者（寫出姓名和院系），獲贈未來半年及過去一年中春；五名以上者，獲贈中春過去半年及未來半年。

感謝您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援！

中國之春編輯部

政治宣傳與新聞報導

民聲

談中國新聞媒介的「喉舌」作用

年初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幾則關於中國新聞改革以及製訂新聞法的報導，不禁啞然失笑。大凡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多會有這樣的體會：中共製訂的各種名目繁多的條文法令只不過是中共貪贓枉法，無法無天的遮羞布。而在大多數時候，中共連這塊遮羞布都是顯不得披的。中共執政以來的三十九年中，新聞媒介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中，成了道道地地的政治宣傳工具。中共領導人却大言不慚地稱之為「黨的喉舌」。

一、政治宣傳代替了新聞報導

「黨的喉舌」，顧名思義，乃為「黨的傳聲工具」，其作用是將中共的聲音迅速準確地傳達給全體人民。以「人民日報」、「新華社」為代表的中國新聞媒介在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幫助中共欺瞞愚弄人民這一方面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國新聞媒介的作用，歸納起來

有八個字：宣傳、鼓動、教育、灌輸。重點在宣傳。

西方國家對「宣傳」這個詞極為反感，因為它含有「爲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蠱惑人心的煽動」這樣一種貶意。聽到這個詞，人們便會自然而然地把它同希特勒法西斯爲煽動戰爭狂熱而進行的宣傳聯繫起來。但在中共的詞典裡，「宣傳」乃爲一種具政治色彩的褒義詞。中共視之爲珍寶，並附諸於廣泛的實踐，從中央、省、市、地、縣、區到公社、鄉鎮，每級都設有宣傳部，工廠、部隊、機關、學校都有宣傳科組。每個單位配備專職的宣傳幹部和宣傳員。這樣一個極其龐大而又嚴密的宣傳網同新聞媒介機構遙相呼應，密切配合，爲中共鞏固政權，控制人民言行，改造人民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直言不諱地說：「什麼是宣傳員？不僅教師是宣傳員，報紙記者是宣傳員，文學作家是宣傳員，我們所有各行各業的幹部也都是宣傳員。」在此，

我們不難看出，中共的「宣傳」就是要把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最大範圍地、及時準確地傳達給全國人民，把馬列主義教條、毛澤東思想灌輸給人民大眾，用以影響、教育，最後達到改造人民思想的目的，使人民大眾成爲附首貼耳、聽任中共擺佈的愚民。

中共政治宣傳的理論依據是：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並代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黨的聲音就是人民的聲音。因而，新聞媒介和宣傳機構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就是反映人民大眾的要求和願望。按照這一邏輯來推演，人民大眾就沒有必要有自己的聲音，以及表達自己聲音的媒介工具，因爲黨已經包辦了一切。黨爲人民在說話，人民只要閉起嘴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就行了。

姑且不論共產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是否真正爲人民說話，就憑它這種剝奪人民說話權利的做法已足以證明其公然侵犯了公民權益了。中共執政以來的三十九年中，這種強奸民意、強加於人的政治宣傳已經發展到

了走火入魔、登峰造極的程度。通過其「喉舌」，中共可任意指鹿為馬，變人為神，可以傾刻在全國掀起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政治波瀾，也可以發動一個激憤民族情緒的對外戰爭。人們一定還記憶猶新，在那瘋狂的十年內亂時代，年邁昏聩的老毛半夜裡一句夢囈，能把億萬人民從被窩裡拖將出來，敲鑼打鼓地湧向街頭，風雨無阻地去「最最熱烈地慶祝最高最新指示的發表」。中共政治宣傳的能量和衝擊力由此可見一斑。君不見，中共的宣傳會一度把毛澤東造成了神。

宣傳鼓動是中共用以維護其政權的一大法寶，用老毛的話來說，就是「大造革命輿論」。中共一再強調宣傳為政治服務，意思是宣傳的內容須根據政治需要而進行變化或修改。至於新聞，在中共眼裡，其真實性和時效性是並不重要的。凡是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有利的，就是最大的新聞，就得要連篇累牘地大肆宣揚，否則，再大的新聞事件也可以被壓下來不報或晚報。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不妨信手拈來幾例，與讀者諸君共議。

在各屆中共黨代會或全國人大召開期間，全國各地報紙、電台、電視台無一例外地以大會為中心，集中一切力量來報導這種據認為是「最重大的新聞」。往往在大會召開前的一、兩個月內，每天各地報紙上就會千篇一律地出現諸如「為迎接×大的召開，人們心情激動，決心以優異成績向×大獻禮」之類的專欄。大會開幕期間，本來篇幅就有限的報紙（地方報紙一般是四版，少數全國性報紙為八版）就被用來整版整幅地刊登紅字大標語，領導人的報告、講話、題辭、照片，會議決議以及數百人的代表名單。國際國內新聞往往被擠到最後一版的某個角落裡，或干脆被完全砍掉。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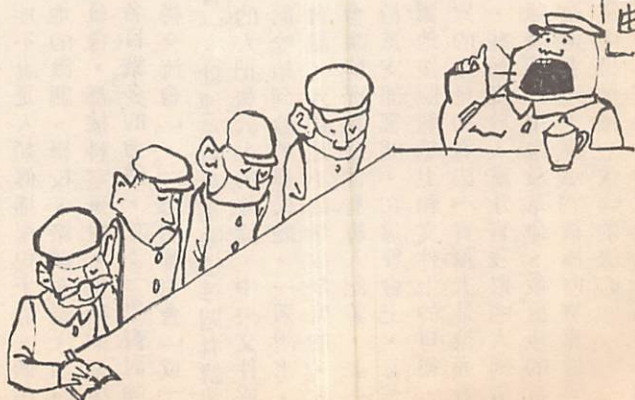
閉幕以後，各地報紙又千篇一律地刊登全國各族人民認真學習×大文件之類的報導，而這種報導往往持續一個多月。

再如七九年中越戰爭期間，中共控制下的新聞媒介為激發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憎恨越寇的民族情緒，在連續近兩個月的時間內，每天用大量篇幅報導越方在邊境的挑畔，我方部隊英勇還擊，國際友好國家和組織的聲援和支持，等等。讀者所能看到的都是「打死打傷××××敵人，繳獲××××武器，我軍將士如何如何英勇善戰以及國際輿論如何大力支持中國這一義舉」等方面的內容。而我軍將士的傷亡，國際上不少國家對中國出兵越南的譴責，以及國內一些人對發動這場戰爭的不同看法，讀者是根本不可能從新聞媒介那裡得到片言隻字的。

又如一九八四年初，人民大眾已普遍聽到消息，很多商品包括食品和日用品均要進行二十年來最大幅度的提價。對這樣一個關係到億萬人民生計的重大事情，全國新聞媒介在中共的指示下，扣壓住這一重大新聞不發，致使人們到處打聽，紛紛傳說，鬧得人心惶惶，搶購風四起。直到提價正式開始執行的前一天，各地商店門口排起了搶購的長龍，外國駐京新聞機構早已搶先報導了這一新聞，中國新聞媒介却仍然保持緘默，人們無法從官方渠道來證實他們得到的小道消息。

以上三例足以揭示出中共「喉舌」的本質以及中國人民沒有新聞自由這一根本事實。對中共來說，人民要求自由言論和獲得新聞的權利只不過是它的一塊口香糖，可以放在嘴裡任意咀嚼，有時候被用來吹幾個大泡泡，有時候被隨口吐掉。至於什麼時候被用來吹泡泡，什麼時候被吐棄，這完全要根據中共的政治氣候

言論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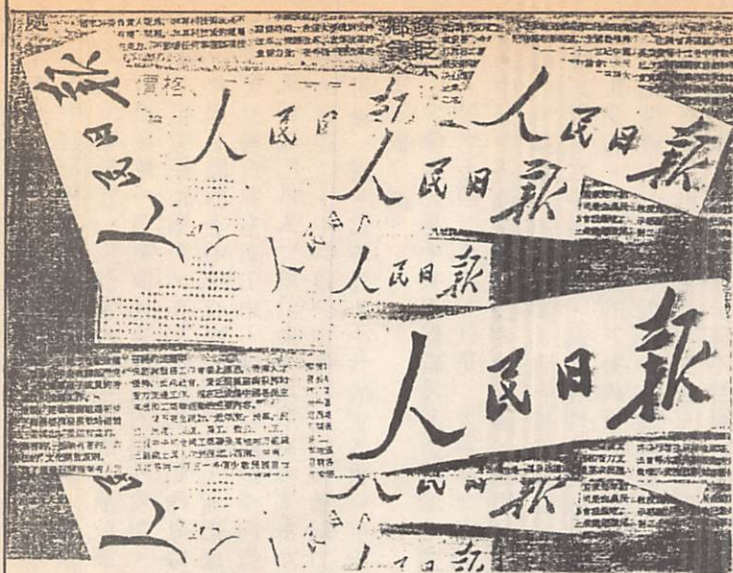


，說確切一點，就是要按照中共高層領導中幾位老者的喜怒哀樂來決定。在他們情緒快活，心血來潮之際，他們也會唱幾句「百花齊放」、「給人民以廣泛、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之類的高調。但可能在一夜之間，這些年事已高的老翁又轉了念頭，反過來回擊「資產階級民主化」和「精神污染」。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他們至今也說不清楚。他們只知道「一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而作為「黨的喉舌」的新聞媒介理所當然地被用作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宣傳工具了。

現在我們具體地談一談中國新聞媒介「宣傳、鼓動、教育、灌輸」的作用。

二、中共權力鬭爭的工具

中共所謂的無產階級政治，歸結起來就是「以階級鬭爭為綱」。在執政的三十九年中，中共對階級鬭爭是「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被當作階級鬭爭對象的階級敵人也在年年、月月、天天地交替變換。昨天還被捧為「革命英雄」的座上賓，明天就可能被視作「階級敵人」而成為階下囚。隨着「階級敵人」的定義在日新月異地變化，新聞媒介也煞費苦心地



『人民日報』從來沒有人民

那裡得不到什麼新聞，却能從字裡行間琢磨出某個階段的政治氣候；某個領導人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次數少了，人們就猜測他是否要成為「階級鬭爭」的對象了；某人在照片上、名次上排到前面了，人們又猜測他是否要榮升了；「人民日報」社論中出現個別口氣稜利的字句，人們便開始揣摩是否又要搞什麼運動了。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中共的「階級鬭爭」論不光從肉體上把中國人民鬭得互相反目，人人自危，而且從精神上把人們折磨得坐臥不寧，魂不附舍。

說穿了，中共的「階級鬭爭」就是權力鬭爭。中共領導人為了爭奪權利，互相傾軋，例子舉不勝舉，這裡毋庸多述。問題是中共領導層中連續不斷的權力之爭却害苦了中國老百姓。善良的中國人民不要說享受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就連最基本的希望平安過日子的夢想也常常被中共無產階級專政這台絞肉機絞得粉碎。他們不時被卷入階級鬭爭的旋渦，被中共當作權力之爭的替罪羊，到頭來却還弄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原因就在於中國新聞媒介幫助中共欺騙、愚弄老百姓，不但不提供真實的情況，有時還蓄意編造、歪曲事實真相。致使中國老百姓被蒙在鼓裡，任中共當權者牽着鼻子走。

三、中共對人民的控制網

從上情下達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國新聞媒介無愧為及時準確地傳達黨的忠實傳聲筒。它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共的政治主張傳達到每家每戶，男女老幼。而從下情上報這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新聞媒介也稱得上中共的耳目。例如「人民日

報」和「新華社」，它們特設的參考消息編輯部就是專門搜集民眾中的動向和反應，寫成內參，分送給中共各級領導幹部，有的直送中共最高領導。這種內參的作用就是幫助中共領導掌握民情，瞭解民心，以便對政策作相應的調整。正是憑借這樣一種能夠溝通上下聯絡的中國式新聞媒介，中共才得以將中國億萬百姓置於其嚴密的控制之下。中共的各級宣傳部門同新聞媒介機構密切配合，組成了一張無所不在的巨大宣傳網和監視網。人民大眾被覆蓋在這樣一張大網裡，每時每刻地受着共產主義教育和階級鬭爭說教的灌輸。中共每一次政治運動也正是通過這張大網而能迅速得以家喻戶曉的。中共這種「走群眾路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一切力量」加入其政治鬭爭的方法和組織能力，不能不說是人類傳播學史上的一個創舉。全國各地的機關、學校、廠礦企業、部隊以至居民委員會，都按科室班組，每星期至少有一至兩次名目繁多的會議，如：「學習討論會」、「心得交流會」、「思想匯報會」或「向黨交心會」。就連農村生產隊也每週有讀報會，由識字的人把報紙上的社論，中央文件或中央首長講話唸給到會的農民聽。一般說來，對這類政治會議，人們是不敢無故缺席的。大多數時候，會議情況和發言有專人記錄，並在會後及時送給黨支部審閱。在這種會上，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按照報紙上和文件上的口徑，發表大同小異的意見和看法（實際上是被逼着表態）。而一些熱衷於入黨升官發財的人則借這種場合大肆表演，用盡最革命、最積極的言辭，甚至聲淚俱下地來表示「積極向黨靠攏」，「時刻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決心。

多年來，在中共的灌輸教育下，人們都會了按報紙的口徑講話，來盡量避免承擔政治

風險。「人民日報」是全國宣傳機構的楷模，「人民日報」有什麼內容，各地報紙電台就會有什麼內容，真可謂是如出一轍。所以說，只要看了任何一份報紙，就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再看其它的報紙，因為中國「新聞」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內容也一元化了。

中共利用新聞媒介，把其政治主張強加給中國人民，教育人民按照黨的思想去思想，模仿黨的聲音去說話，根據黨的意志去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實在是一個十分荒唐而又可悲的現象。

四、中共統戰的武器

中共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就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這種戰略戰術，用中共的話歸結起來，就叫做「統一戰綫」。說得具體一點，也就是老毛所說的「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先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力量」去打擊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等打倒了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之後，再回過頭來在原來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力量」中挖出另外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就這樣循環往覆，以致無窮，直鬧得雞犬不寧人自危，「天翻地覆慨而慷」（毛詩）。

同「階級鬥爭」謬說不同的是，階級鬥爭是中共內部的權力之爭，而「統一戰綫」則是中共利用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或用句時髦話來說，是中共「挑動群眾鬪群眾」。全國「解放」後，中共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諸如土改、鎮反、贖買民族資本家資產、公私合營、整風，等等），中共就是依靠這套戰術來挑動一次又一次的蚌鶴相爭，然後坐收漁人之

利，把一個接一個的「階級敵人」整得服服貼貼。正如前面談到過的，中共辭典裡「革命力量」和「階級敵人」的定義是根據政治氣候的需要而隨時隨地加以變化的。也就是說，被中共利用完了的「革命力量」隨時可以轉化為「階級敵人」。最能說明這個事實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掌權人先「團結」紅衛兵去鬪爭一小撮「走資派」，然後又「團結」工人造反派去整肅紅衛兵，最後又依靠「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解放軍來鎮壓造反派。由此可見，中共借「統一戰綫」為名，行「殘酷鬪爭，無情打擊」之實，直到把所有的隱患都清除干淨，以確保共產黨永坐天下。

中國新聞媒介幫助中共搞「統戰」也是不遺餘力的。今天中共領導人想「統」誰，新聞媒介就把誰捧上天；明天中共領導人想打倒誰，新聞媒介就將其貶入地獄。有目共睹，中共同國民黨搞「統戰」幾十年，反反覆覆多少次，有時把國民黨視作不共戴天之敵而罵得狗血淋頭；有時又故作姿態，同國民黨稱兄道弟，懷情敘舊。不信請看當前中共又欲同國民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惜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小報紙每天以整版或大部分篇幅來登載台胞回大陸探親的報導和照片，那些曾因有台灣親屬關係而屢受牽連迫害的人在一夜之間成了新聞人物。為迎合中共「統戰」的政治需要，新聞媒介不惜筆墨地大肆描寫台胞在大陸如何受到厚待，對大陸發展的印象如何好，以及他們對中共是如何的感激，以此來加強「統戰」攻勢。

在「國際統一戰綫」方面，新聞媒介亦是緊跟中共的戰略部署，一會兒把蘇聯尊為「老大哥」，一會兒又把它罵作「霸權主義和社會

帝國主義」；一會兒把越南稱為「有着唇齒情誼的同志加兄弟」，一會兒又把它貶為「小霸權主義、蘇聯走狗」；一會兒把阿爾巴尼亞捧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一會兒又把它斥之為「修正主義毒菌」。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說好就說得天花亂墜，說壞就說得一無是處，這就是中共控制下新聞媒介的宣傳方式。讀者諸君不妨想一想，中共「統戰」搞了幾十年，究竟有多少朋友或志士仁人被「統」到了共產黨門下？「統戰」究竟給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實質性的益處？

五、如何進行新聞改革

綜上所述，中共操縱控制下的新聞媒介的「宣傳、鼓動、教育、灌輸」的作用便一目了然了。共產黨一向以老子自居，把廣大人民群眾當兒子當孫子，任其擺佈，聽其訓導。「宣傳鼓動」的政治用心不必說，「教育灌輸」則實在是強姦民意，把從俄國人那裡販賣來的馬列教條以及老毛的那個什麼悖謬思想強加給中國人民。在中國大陸，人民自由言談和自由辦報的天賦人權已被中共踐踏殆盡，中共一再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则（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無產階級專政）成了中國人民的沉重的精神枷鎖。中共天天高喊這個改革、那個改革，但改來改去，還是換湯不換藥，萬變不離其宗，共產黨的獨裁權力絲毫觸犯不得。

按照常理，新聞報導就是指新聞媒介把每天國際國內發生的新奇而又為眾人共同關心的事情及時、準確、客觀地轉達給廣大讀者，使讀者充分瞭解情況，以便有可能對自己的生活、工作大致作出明智的判斷和決定，並能有效

地參加對自己國家的管理。而中共「喉舌」以「宣傳、鼓動、教育、灌輸」為宗旨的「新聞」，實際上是將廣大人民蒙在鼓裡，對中共貪官污吏們禍國殃民的醜形無處瞭解，瞭解了也無處揭露，任憑中共專橫跋扈、無法無天，把一個好端端的中華民族糟踏到了今日這樣一個一窮二白、民怨鼎沸的可悲境地。

今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刊登了一篇有關著名法學家張友漁就起草新聞法發表見解的報導。張友漁主張要把保護新聞自由作為新聞法的基礎，但他所講的新聞自由「應包括在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黨和政府的工作公開進行批評。」他明確指出，「只要不是煽動反革命活動，不違反紀律，不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什麼言論都可以發表。」這裡，這位大法學家先替新聞自由定好了框框。我們不禁要為這位「著名的法學家」感到羞愧，他如果不是在講違心話，就是蓄意討好中共，為向上爬撈取政治資本。我們都深有體會，中共的各項法律都不如一張廢紙，實際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聖旨就是法律，四項基本原則便是中共領導人用聖旨取代法律的根本保證。至於什麼是反革命，中共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定義。凡是對中共領導表示不滿，對馬列、毛思想表示異議的人，都可以被定為「反革命」。可以想象，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的「新聞自由」，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自由？基於這樣一種「新聞自由」之上的新聞法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新聞法。

在西方民主國家，新聞媒介是獨立於政府和各黨派的、私人的營利企業，依靠廣告和發行收入來維持運轉。國家法律大都明文規定保護私人辦新聞的獨立性以及發表各種言論的自由。正是由於這種真正的獨立性和新聞自由，

才使得民主國家的新聞媒介有可能成為監督政府、防止官僚腐化的監視狗（WATCHDOG）。而像中國這樣專為中共歌功頌德、欺弄百姓的「新聞媒介」實在同真正的新聞媒介相距甚遠。中國新聞媒介只不過是中共的輿論宣傳工具，不用說很多外國人把中國的新聞報導斥之為「共產宣傳」，就是中國人自己又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中國的新聞媒介呢？

毛澤東當政的二十七年中，已經把中國新聞媒介搞成了一個好講假話、大話、空話（假、大、空）的個人獨裁機器，人們對此是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嗤之以鼻。今天的中共最高領導們，你們為什麼就不能為子孫後代多考慮考慮，給他們造點福，而偏要死抱着毛澤東這具僵屍不放，緊步毛澤東後塵去做千古罪人呢？我們姑且暫不奢望中共也能像國民黨那樣開放黨禁，但中共是否有肚量先開放報禁？讓有事業心和經濟能力的人自己去創辦報紙和其它新聞事業，讓人們自由地發表看法，不光允許人們讚揚黨的領導，也應允許人們批評，甚至漫罵黨的領導，老毛不是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嗎？老毛還說過：「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既然如此，那就讓人民自由地去思想、去講話、去譜寫歷史篇章。共產黨一直在叫嚷「讓人民享受廣泛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那麼為何阻止人民享有自由說話和自由思想這一天賦人權呢？不管是什麼主義的民主，尊重人權乃是最大的民主，這一點，「社會主義民主」理論家們應該是懂得的吧？他們大概不會是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吧？

現在中共既然承認有必要對新聞進行改革，那何必不實際一點，先把新聞媒介「宣傳、鼓動、教育、灌輸」的指導方針改成「傳遞信息、交流思想、傳播知識和發展娛樂」呢？

本人認為，要實現這一步改革，首先必須甩開四項基本原則對新聞的束縛，使新聞媒介在沒有任何政治框框限制的情況下自主地開展工作。不論是紅色、白色、黃色或灰色的新聞和言論都應該允許發表，這樣新聞報導才有可能公正、客觀，才能真正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才能真正反映讀者的興趣和滿足他們的要求。

其次，新聞媒介應逐步由政府資助的官辦機構轉變為自負盈虧的私營企業，新聞媒介之間應展開競爭，以此來促進新聞報導的質量，增強新聞媒介的信譽和獨立性。

第三，撤消黨在各個新聞單位的政工部門，讓受過正規新聞業務訓練、有新聞敏感的專職人員自己管理有關人事安排和新聞報導等方面的事情。中共的「革命大老粗」發號施令瞎指揮的現象必須杜絕。

在此基礎上，製訂一個新聞法，明確規定新聞媒介不受政府和任何黨派的控制和干涉；公民自由發表言論以及新聞媒介自由發佈新聞的權利不受任何侵犯。新聞法尤其必須明文規定新聞媒介有權利瞭解政府製訂政策以及執行政策的程序，更有權利揭露和批評政府工作中的錯誤和腐化現象，以便使人民大眾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

歷史潮流在滾滾向前。奉勸中共最高層的那幾位老翁仔細地想一想，你們都已到了入土之年，為何不趁此機會順應歷史潮流，為中國老百姓和他們的子孫後代做點好事而免遭萬人唾罵呢？

上面空蕩蕩

下面蕩蕩空

(美國) 柳成

在中國，看到過和聽到過的歷史上的、現實中的不合理事情太多了，心也麻木了。如果把許多不合理的事情都記在腦子中，恐怕腦袋早已撐裂了，人也活不到今日了。爲了苟且偷生，我漸漸地學會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種保命的絕活兒。

但，不知爲什麼兩三年前讀過的一篇太監爲進入宮廷被親生父母「去勢」的淒慘故事至今尙留在頭腦中，最近，又看到一幀一個法國人在上個世紀末所拍攝的一張名爲「下面空蕩蕩」(見圖)的舉世震撼的照片，我的早已麻木的神經突然被刺痛了。我下意識地要把這張照片撕掉，不想讓更多的人看到，再多一個讓人家看不起我們的口實。可是，撕掉一張刊有這張照片的報紙又有什麼用呢？還有千千萬萬張同樣的報紙存在。而且，只要人家願意，還可以印出萬萬千張更清晰的下面空蕩蕩的照片來。平靜之後，我決定將照片剪下，寄給中春，讓所有的留學生看到它，讓國內的高官們看到它，或許，能帶給他們一些啓示。

一個可憐可怕的老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從京郊的鄉下進京城去看望姑姑和表哥的時候，碰到了使我一生難忘的一個人。他帶給我的恐懼，遠遠超過了一個繁華熱鬧的京城對一個七、八歲鄉下孩子的吸引。從此，我害怕去北京，害怕見到他。

他似乎沒有名字，大人叫他公公，小孩子叫他老公、太監。他是齊白石老人的廚師。當第一次見到他時，小表哥就悄聲告訴我，他不是男，也不是女，而是不男不女。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什麼是不男不女，但小表哥神秘兮兮的樣子和壓得低低的聲音却使我感到新奇和恐怖。

每當這位身材碩大、皮膚鬆弛、面色清黃的老人拿着醬油瓶子在街上出現的時候，在街口玩得正歡的孩子們就會突然間停止遊戲，悄悄地跟在他的後面。這時，只要一個膽子大的高喊一句「老公」！其餘的一群孩子就會立即

一起大叫「太監」！「老公」！而這位老人則多是不理會，面無表情地跌跌撞撞地走他自己的路。看得多了，我的膽子也大起來，慢慢地也加入了叫喊的孩子群中。

終於，有一天，這位老人反抗了。他猛地轉過身來，高高地揚起指縫裡滿是黑色油污的髒手，追打叫罵的孩子們。我被這突然的一幕嚇呆了，當別的孩子們四散逃命的時候，我却張着大嘴呆立在原地。他的佈滿深而細密的皺紋的臉扭曲了，整個兒子朝我撲來。我嚇得閉上眼睛等着一頓痛打。然而，他沒有打我，只聽到他帶着婦人嗚咽般地說「再開！送你去做老公！」這句話令人毛骨悚然，嚇壞了我，在我幼小的心靈中便已知道做太監、做老公是比死都可怕的。

白石老人一生節儉，對油鹽醬醋錢扣得很緊，廚子的薪水亦不發現金，而是每月畫幾張畫頂替。小表哥聽人家說白石的畫一張就能比一年的薪水值錢，我却不信。倘若畫真能換那麼多錢，這老公不是很潤氣了嗎？可他卻從沒



中國帝王「惡作劇」——太監

有一會兒高興的時候。直到我長大了，明白了老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之後，我才知道，縱使他有許多許多錢，他也是永遠不會有高興和快樂了。

不久白石老人逝世了，這位公公也不知去向了。我常常想：不會有人真的懷念他吧，頂多是有些憐恤罷。

不文明的文明古國

來美國後，我絕少談起中國屈辱的近代史、現代史。只有當話題轉到我們的祖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是一個文明古國的時候，我的雙眼才會放出光彩來。可是，現在我迷茫了，這國家，古是古的，但文明嗎？我不知道。

據我所知，閹割下體這種極不文明的宮刑即有兩千年的歷史，兩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就是被處閹割宮刑的一例。他的「史記」雖流芳百世，但他中年之後被漢武帝處以宮刑所受精神之苦，至今仍令人唏噓。

據記載，歷史上的唐宋元明清諸朝太監制延綿不斷。明朝的太監達到歷史之最。崇禎末年，太監人數曾達九萬人之多。清後，太監人數劇減，同治年間為九千人，乾隆時為二千八百人，到溥儀退位時，清宮內仍有八、九百名太監。

太監的「去勢」過程極其殘酷。通常是貧窮、多子的父母做主給兒子「淨身」。清宮太監馬德清曾回憶說：「我九歲那年，有一天，我父親哄着我，把我按在鋪上，親自下手給我「淨身」。那可真把我嚇壞了，也痛壞了，我不知昏過去多少次。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什麼注射針、止血藥那類東西，硬把一個活蹦

亂跳的孩子按在那兒，把他的要命的器官從他的身上割下去……，從那一天起，我的整個生殖器便同我分家了。」在衆多的太監中也有自己爲自己淨身的。如來自靜海縣的清代寵宦小德張就是憑着一時的血性，拿一把鐮刀，又找到一根繩子在牲口棚給自己淨身。

動完這種手術後，要在尿道插一根管子，倘若肉芽長死了，尿就排不出來了，還要動第二次手術。更殘忍的是手術後不能讓傷口很快癒合結疤，要經過一百天，讓它俱膿長肉，爲了維持傷口局部潰瘍，還要經常換由白蠟、香油、花椒粉配成的藥紙，每次換藥都會撕去些新長的嫩肉，使人痛得死去活來。割下來的陽物會被家裡人用油炸透，再用油紙包起來放在量糧食用的升裡，垂吊在房樑上。從地面開始每年升起一小段，意視他們在宮裡步步高升。到太監死去的時候，親屬就把房樑上的陽物取下，放在棺內，與身體同葬。連最窮的太監也不能忘記這件事。他們一輩子盼望的是：這輩子雖已六根不全，來世還可以變成整身。

被閹割的我們

本世紀初，中山先生進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制，根除了罪惡的太監制。從此，中國人不再受閹割肉體之苦。不幸的是，自毛澤東執政以來對中國人精神上的閹割却愈演愈烈。男、女、老幼無一可被放過，使人們遭着比肉體受到閹割更深的痛苦。

自喻秦皇漢武的毛做到了秦皇漢武望塵莫及的殘忍。這位集封建主義和馬列主義罪惡爲一身的魔王用公開的、「合法」的手段閹割國民的靈魂，要每一個中國人都變成上面空蕩蕩，即頭腦空蕩蕩的聽話的動物。惟共產黨的話

是聽，以確保大毛王朝的江山，他所訂的朝綱是：共產黨是反不得的，反共產黨即是犯上作亂，就是犯了死罪。

爲了振朝綱，毛澤東首先拿知識份子開刀，把頭腦豐滿的知識份子變成上面空蕩蕩的白痴。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設下陽謀，引知識份子的精英出洞。用種種手段折磨他們的肉體和靈魂。漫長的二、三十年下來，這幾十萬中華民族的優秀份子大多被毛澤東弄到頭腦裡空空蕩蕩。連他們的子女、親屬亦被逼得死去活來，喪失了人的尊嚴。所幸沒有受到株連的家庭，父母出於對子女的愛，忍痛下手照老毛的標準對子女進行精神上的閹割。

那些熱愛學生的老師，惟恐學生遭到不測，違心地、諄諄地閹割着他們。大毛王朝的宣傳機器遵旨把閹割成功的白痴雷鋒、王傑、歐陽海捧爲楷模，稱爲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誘迫青年向他們學習，讓青年對自己進行精神閹割。

毛澤東食髓知味，越來越不滿足。他已不甘於只做帝王，他要做神。毛被權慾沖昏了頭腦，利用我們這一代「上空」青年的愚忠，執導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民族的大悲劇。造成中華民族的文化水平、道德水準、心理素質的大倒退。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地上的神沒有做成，撒手西歸。且不说馬克思在西天收不收老毛這徒兒，却坑苦了我們這一代沒有了理想、沒有了青春、沒有了自尊，被閹割了人去嗜人生的苦果。

我們不做小德張，要做人

今天，劫後餘生的我們開始思考了。我們的腦子裡有了越來越多的大大小小的問號。世

界這麼美好，爲什麼中國的老百姓就該過衣食無着的日子？是誰逼得我們時時怕批鬥，終日戰戰兢兢？是誰剝奪了我們做爲一個人的與生俱有的尊嚴和權力？當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猶豫、在迷茫的時候，八十年代的一代新人成長起來了。他們不甘心像他們的父兄一樣被閹割，他們要做有思想的人。去多爆發的動搖共產黨統治殿堂的學運即已顯示了一代新青年的巨大威力。他們是民族的希望。近來，國內的海外民運先進份子與共產黨的抗爭越來越廣泛深入。從多次炸十四陵——毛紀念堂到蘇紹智、王若水拒絕認罪，到最近太子黨鄧樸芳（鄧小平子）陳元（陳雲子）陳昊蘇（陳毅子）未被基層黨員選入十三大代表，更是極大地惹怒了中共老人黨的黨魁。那些命裡註定可接老子的班、在大毛王朝爲官的太子們遇到的冷遇正預示

着共產黨不可避免的覆滅下場。

在政局動盪的時刻，嚴酷的現實需要我們留學生做出抉擇，要麼，拚命閹割自己，學小德張給自己淨身。這樣，即使我們不是皇親國戚，不是太子輩而不能做官，但却仍可爲宦。（太監做官稱宦）進入宮中弄個第三梯隊幹幹，雖不能榮宗耀祖，却也能富貴榮華。要麼，投身民主運動，共同鬪爭，爲平民百姓也爲我們自己爭取一個美好的明天。但，要做出犧牲，或可要過長期的流離顛沛的生活。我相信，大部份的留學生會選擇投身於民主運動這條艱苦却是正義之路的。因爲我們深知，在第一種選擇中，我們所以能在宮中爲宦，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被閹割過的頭腦不能在宮中爲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傳宗接代，以維持老人黨的「正統」。倘若一旦我們的思想有些離經叛道

，相信是絕不被允許再混跡宮中的。我們這些書生，多少都有些呆氣，一個應酬不周又難免不在皇親國戚派系鬪爭中失手，一旦被逐出宮外，大約連個終老的寺廟都沒有。即或沒有在有生之年成爲老人黨的殉葬品，但在臨終時，我們却連小德張也不如。小德張還可盼到六根同葬，而我們却只能帶着空蕩蕩的腦袋去見老毛了。

諸位，我們有幸在國外學習，比國內青年有着更多的自由天空，中共鞭長莫及。爲什麼我們還要閹割自己呢？讓我們多思考、多充實我們的頭腦，努力做一個正常的人，做一個有人的尊嚴、有人的權力的人，儘管是要付出犧牲。

報刊拉廣告 不必擇手段 蒙騙衆客戶 一切向錢看

沐雨

在一切向錢看的衝擊下，越來越多的國內報刊雜誌日益成爲公衆詛罵的對象。許多報刊爲了拉廣告，蒙騙客戶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國內有不少家報紙以專營刊登廣告爲宗旨，例如北京的北京廣告報、廣告信息報、中外

產品報、經濟效益報、消費者報，以及中國機械報、中國食品報、人民建材報、健康報等五花八門的各種專業性報紙也以拉廣告、登廣告作爲辦報的重要手段。爲了拉到廣告客戶，許多報紙採取了各種非法手段。其一，吃回扣。

國內報刊雜誌的編輯、記者，生活待遇和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收入偏低，爲了刺激編輯、記者拉廣告的積極性，各報內部都制定了吃回扣的規定。吃回扣的金額最低的是百分之三，最高的達到百分之二十。例如北京廣告信息報總編輯、社長，公然在全報社員大會上宣佈：不管黑貓白貓，拉了廣告就是好貓，就是香貓，就是金貓！廣告費低於人民幣五千元以下的，提成百分之六；高於人民幣一萬元以上的，提成百分之二十！這叫水漲船高：在金錢的刺激下，全報社員工上至副社長，下至傳達室看大門的，人人絞盡腦汁拉廣告，凡是拉了廣告拿回銀行支票的，報社馬上根據規定支付提成現金。爲了拉到廣告，這個報社的記者人人有一套非凡的本事，有的和廠家的業務員簽定秘

密協議，廣告提成金額再按四、六分成，分給業務員，有的不惜用幾百元甚至高達數千元的重金，賄賂廠長、經理。這個報社有一名女記者，過去因為生活作風腐敗，被一家工廠開除廠籍，一九八五年六月，她主動找到這家報社領導，聲稱自己能拉廣告，一週後她就拿到了記者證，半年後她就成了萬元戶。爲了拉到廣告，她到處行騙，出入各種高級賓館，除了行賄，還出賣色相，陪大大小小業務員睡覺，報社領導明明知道她作風敗壞，但因她「回回不空手」，每個月能拿回十幾萬，多次被報社領導指名爲「先進工作者」「傑出女記者」，一年後還被選進報社領導班子。

不少報社爲了擴充隊伍，大量聘用特約記者，以至記者證滿天飛。僅據北京廣告報、北京廣告信息報和中外產品報統計，三個報社在一年內就發出正式記者證和特約記者證五千四百個（來自中宣部的統計資料）。社會上許多閒散人員和不法分子憑借一紙記者證上竄下跳，行騙各地。儘管中共中央宣傳部多次發出「嚴禁濫發記者證」的通知，但這些報社仍然我行我素，記者證只發不收，只發不管。一九八六年四月，天津公安局破獲了一起重大盜竊集團團伙，十五個人中有十二個人持有北京廣告信息報和中外產品報的記者證，其中一名首要分子還被廣告信息報正式委任爲「天津記者站副主任」。據一份公安局的審訊資料透露，這個犯罪團伙不僅到處行騙盜竊國家資財，還從事走私、販賣飛機票、火車票、奸污婦女的罪惡勾當，這個記者站還以二百五十元人民幣的價格非法售出廣告信息報空白介紹信一百多張。事件發生後，這個報社又以聘用信息員的名

義，繼續發展、壯大拉廣告的隊伍。

內地許多報刊雜誌爲了拉廣告，行騙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例如前面所講到的中外產品報，名聲很大，人員混雜，被國內許多工礦企業斥爲「中外騙子報」。一九八六年七月，這家報社的一名編輯部副主任帶領兩名記者來到河南省尉氏縣，以採訪爲名，設宴招待地、縣負責人，酒過三巡，編輯部副主任大吹特吹中外產品報在國內外的重大影響，大講特講包括趙紫陽、谷牧等中央要員對中外產品報的重視與關懷，地縣領導當場決定出資七萬元廣告費，委托中外產品報全面宣傳、介紹該縣縣辦和社辦企業。主管縣長把七萬元現金支票交給報社副主任時，一再要求：「報紙出版後，千萬別忘了寄給我們三百份報紙。」副主任一邊勸酒，一邊聲稱：「請地縣領導放心，我們互相支持，三百份如數寄來。」果然，不出半個月，三百份報紙寄到了尉氏縣，洋洋得意的地、縣領導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期中外產品報實際上只印了三百五十份，剩下的五十份，十份寄給了首都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十份寄給了中央有關部委，十份貼到了北京的街頭報欄，剩下的報紙入了檔。編輯部副主任和兩位記者按報社規定提成一千零五百元人民幣。事後，這位編輯部副主任洋洋自得地說：「這回報社又發了！」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事隔不久聞訊後憤憤地說：這樣惡劣的行騙手段，在資本主義的美國、英國、日本沒有，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也不可能存在，只有我們中國有！讀者的報紙存在？答案有二：一是這家報紙屬於趙紫陽的兒子領導；二是這家報紙創刊時中共

爲什麼還允許他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記者有着特殊的地位，一紙記者證暢通無阻，處處受照顧。許多記者，由於素質低，私心重，時時處處白吃、白喝、白拿。北京晚報是北京市委領導的一家市級主要報紙，這家晚報的不少記者盛氣凌人，以採訪做交易，白吃白拿到了驚人的地步。一名叫蘇文洋的矮胖子記者向客戶要東西不臉紅，吃起東西不抬頭，基層單位請他去採訪，他張口先問：「送點什麼紀念品？白跑我可不去！」據有人統計，北京晚報十五名青年記者，每人月薪不足百元，加上獎金、伙食補貼也不過百三十元，到了晚報不足一年，家家都有高檔電器，人人都有各種高檔試用、試戴品。中國食品報的二十三名編輯記者，有一半多患有牙痛病，開始他們以爲是患有牙軸炎，經醫生檢查，根本不是牙軸炎，而是牙神經疲勞症。醫生爲他們開的處方內容基本相同：自我控制，少吃。這家報社的編輯、記者吃八方，喝六海，每人到了談吃頭疼，談喝眼暈的地步。有的記者家是名酒多的成患。國內不少報刊雜誌的另一條生財之道是舉辦各種名目的活動，譬如舉辦文藝晚會、知識競賽、體育比賽，等等，然後到社會上到處拉廣告、拉贊助。中國廣告報一名叫萬華的青年記者，以拍電視劇爲名，到處許願、行騙，僅在廣東、上海和北京三地就拉贊助三十多萬元，除了他自己非法提成三萬多元，其餘的全部被攝制組揮霍。由於民憤太大，引起中紀委和公安部門的注意，經過審查，此案涉及到一位中央負責對台工作的主要領導，因此此案不了了之。萬華雖然離開了廣告報，但由於他能量大，上下通，很快又被另一家報社聘爲廣告科副科長。

大躍進期間人口變動的評估

楊棋明

一、前言

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中共實行大躍進的政策，在短短的數年中，造成中國大陸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的龐大損失，迄今無絕對可信的統計資料（24）。

在經濟方面，一九六〇年的國民生產淨額較一九五八年減少百分之十八，是損失最慘重的一年；爾後逐漸回升，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完全恢復到一九五八年的水準（表一）。其中的穀物產量，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年則分別減少百分之二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即使到一九六五年仍未完全恢復過來（表一）。至於財力的總損失，約達一千二百億人民幣，此數字是根據大陸最近發行的「中共黨史專題報告集」（8）。

然而，迄今中共官方未曾公佈過當時人力損失的確實資料，尤其引人注目的非自然死亡人數，世人難窺其密（2）。在海外，人言言殊，衆說紛紜；即使大陸出來的人士，也只能舉出大略數字，但差異頗大。筆者知道的答案有，「事實上沒餓死多少人」、「可能有幾百萬人」，或「聽說有幾千萬人」。

過去數年，美國的人口專家各自根據資料推算的結果，包括一千六百五十萬、二千三百萬、二千七百萬到三千萬（1）。有趣的是，這些專家的資料也都是間接的，隨著透露出來

的資料愈來愈多，非自然死亡人數也是越修正越多。最近，匡建昌君的估算則為五千萬到一億之間（7）。但這數目是依自然增長率計算而得的總人口變動數，包括了按出生率計算的該生而未生的人數，和按死亡率計算的不應死而死的人數，後者即為非自然死亡人數。因為，在人口學上，自然增長率就是出生率減死亡率之差。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提出令人信服的數據，而是向讀者交代資料來源，評估資料的可

表一、大躍進政策對經濟的影響（1.2.6.）

年度	國民生產淨額 (%)	穀物產量 (%)
1957	90.6	92.5
1958	100.0	100.0
1959	97.5	85.0
1960	82.1	71.8
1961	89.5	73.8
1962	94.0	80.0
1963	101.6	85.0
1964	110.2	98.8
1965	112.2	97.3

信度，和說明推算的過程。資料是否正確，評估是否合理，推算是否無誤，結論是否可信，讓有興趣的讀者去評判。故此，本文注重數據的推算，不涉及政治立場和價值判斷，以保持科學的中立性。又本文中使用的名詞或術語，和人口學上所使用的可能不盡相同，但所指的內涵應是相似的，讀者將不難理解。

二、資料來源和評估

本文根據的主要文獻是一九八三年世界銀行印行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第三冊中關於人口計劃部分，該資料具有學術價值（3）。本文從中引用的資料有：（一）一九五〇到一九八〇年之間，大陸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的實際數據，及連續變化曲綫圖；（二）同期間各年度的人口數。可惜，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之間，除了一九六五年外，所有資料都是殘缺不全的，大部份年度同時缺少四種基本的人口資料，即總人口數、出生率、死亡率 and 自然增長率；和（三）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每年的出生人數。所有以上資料的最初來源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而所謂半官方的仍是大陸學者發表的推算結果。

欲正確評估大躍進政策對人口變動的影響，必須求得當時各年度的四種基本人口資料。

首先，以數學的內插法可自前述的死亡率曲綫求得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〇年間的實際死亡率數目，如表二所示。內插法亦可應用於「中國的人口」一文中的曲綫，而得到相似的结果（5）。其中，一九五九年的死亡率則為兩種資料的平均數。接著以一九五七年的資料可求得隔年的總人口數，繼而依此求得出生率 and 自然增長率，因為自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

表二、中國大陸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之實際數據，其中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為筆者之推估。單位為千人 每年，下同。

年度	人口數 (千)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1949	541670	36.00	20.00	16.00
1950	551960	37.00	18.00	19.00
1951	563000	37.00	17.00	20.00
1952	574820	37.00	17.00	20.00
1953	587960	37.00	14.00	23.00
1954	601720	37.79	13.18	24.79
1955	614650	32.60	12.28	20.32
1956	627800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0	34.03	10.80	23.23
1958	661549	28.12	14.60	13.52
1959	670493	23.86	17.00	6.86
1960	675093	18.52	25.40	- 6.88
1961	670448	16.41	18.00	- 1.59
1962	669382	37.00	10.00	27.00
1963	687455	43.60	10.10	33.50
1964	710485	38.14	9.10	29.04
1965	725380	38.10	9.60	28.50
1966	746053	35.00	9.10	25.90
1967	765376	34.00	8.80	25.20
1968	785663	36.00	8.70	27.30
1969	807112	34.00	8.50	25.50
1970	825920	33.60	7.60	26.00
1971	847790	30.74	7.34	23.40
1972	867270	29.90	7.60	22.30
1973	886610	28.10	7.10	21.00
1974	904090	25.00	7.40	17.60
1975	919700	23.10	7.30	15.80
1976	932670	20.00	7.30	12.70
1977	945240	19.03	6.91	12.12
1978	958090	18.34	6.29	12.05
1979	970920	17.90	6.20	11.70
1980	982550	18.00	6.30	12.00

年的出生人口數是已知的；依此類推，自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間，所有殘缺的資料都可以補齊（表二）。並且繪成較為正確的連續三十年的人口變化曲綫（圖一）。

圖一清楚地顯示，大躍進期間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都有極不正常的劇烈變動。應該緩慢減少的死亡率急速增加，而應該緩慢增加的出生率却反而急速減少，造成同期間自然增長率的急遽下降，尤其一九六〇和一九六一兩年是負值，亦即該兩年的總人口數不增反減，此很符合某些專家的推算，雖然比率不同（1）。大躍進期間的總人口數曾有人推算過，其自然增長率雖低，但仍為正值（4）。

筆者認為，世界銀行提供的資料來源較全面，故本文所計算的數值應較合理，而且較符合前面所提到的國民生產淨額和穀物產量之減少趨勢（表一）。亦即，人力損失最慘重的一年，也就是物力和財力損失最龐大的一年。

三、計算和結果

欲求得較精確的人口變動數，即不應死而死亡和該生而未生的人口總數，必須先找出正常狀況下的自然增長率、死亡率和出生率，再比較正常和非常狀況下的這三種比率。

圖一顯示，在大躍進期間的前後年度，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變化斜率遠大於同期間的死亡率，後者的變化甚為平滑。因此，先尋求正常狀態下的死亡率較易著手。A B綫向兩方延伸後，都幾乎平行於其前後的曲綫，故以外插法選取A B綫堪稱合理，繼而以內插法可以推估出正常死亡率的實際數值。依此可以計算出大躍進期間不應死而死的人數為二千二百五十六萬（表三）。

由於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之間，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幾乎是同步的先升後降再生，且兩者都在一九六三年達到高峯後同步下降，故而自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三年之間，正常狀態下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可能也同步上升，而兩者的差必須等於前述所選取的A B綫之內插值。因此，幾乎相互平行的E F和H J綫被選為兩者的下限，而E G和H K綫則被選為兩者的上限，再以內插法得到實際數值。因此，大躍進期間該生而未生的人口數之上限和下限，即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是四千七百萬和三千七百萬（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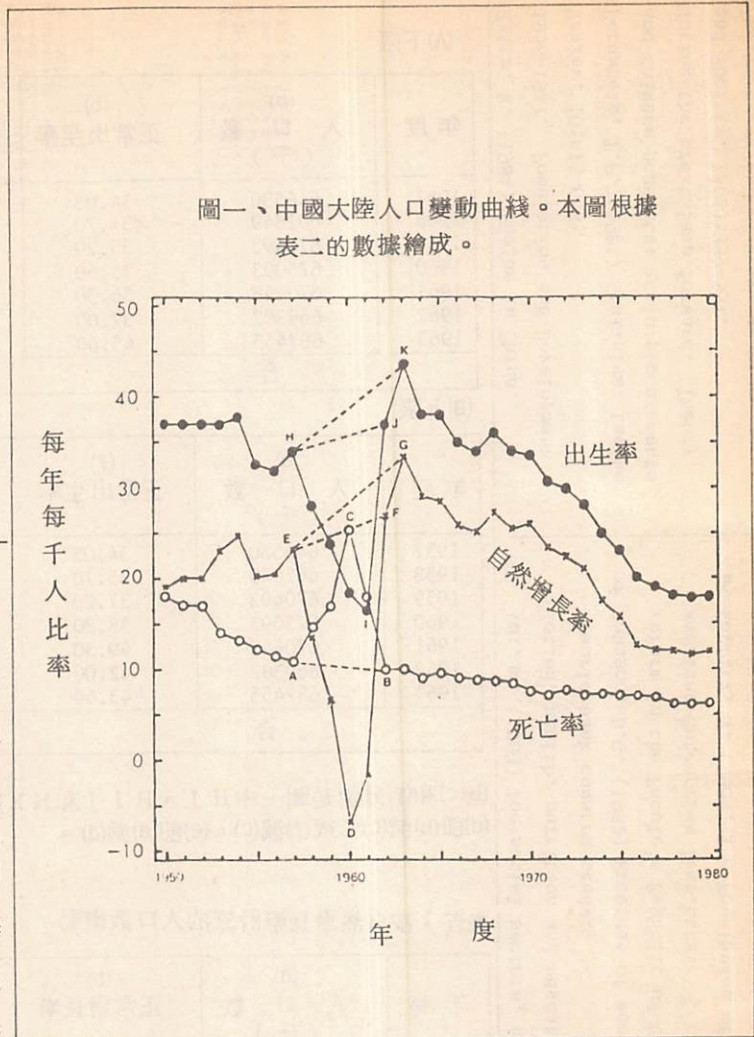
由前面的描述可知，依死亡率所計算的不應死而死的，和依出生率計算的該生而未生的總人口數之上限和下限，分別是六千九百六十萬和五千九百六十萬，其中數則為六千四百六十萬（表三和表四）。

相似的，按自然增長率計算的總人口變動數之上限和下限，分別是六千九百一十萬和五千九百三十萬，其中數則為六千四百二十萬（表五）。

上述兩種中數，很接近美國專家所計算的六千三百萬。其中包括三千萬的不應死而死的，和三千三百萬的該生而未生的人口數（1）。

不論依出生率和死亡率計算的總人口變動數，或依自然增長率求得的總人口變動數，其上限、下限或兩者之中數的標準誤差都低於千分之五。故大躍進期間人口變動數介於五千九百萬到六千九百萬之間的推算，具有幾近百分之百的可信度。其中包括了二千二百五十六萬的已經出生，但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年度裡，不應死而死的人口。此可能就是一九七九年十月葉劍英所提的「餓死」的數目(7)。前述的推算過程尚稱嚴密，但結果是否可

四、結果的評估



前面的結果顯示，持續三年的大躍進政策，反映在各方面的損失，涵蓋了連續四年(下限)到五年(上限)。至於人為因素和自然因素在整體損失中所佔的比例，則非本文探究的範圍。

五、結論

長期以來，大躍進政策造成的人力損失，

信，完全依賴所根據的四種基本人口資料之是否精確而定。因為，邏輯推論上，若前提是錯或不真，則不論推論過程如何嚴密，其結論仍是錯或不真。

表三、不應死而死的人數，即非自然死亡人數。

年度	(a) 人口數 (千)	(b) 不正常死亡率	(c) 正常死亡率	(d) 差	(e) 死亡人數 (千)
1957	646530	10.80	10.8	0	0
1958	661549	14.6	10.6	4.0	2646
1959	670493	17.0	10.4	6.6	4425
1960	675093	25.4	10.3	15.1	10194
1961	670448	18.0	10.1	7.9	5297
1962	669382	10.0	10.0	0	0
1963	687455	10.0	10.0	0	0
合		計			22562

(b)和(c)分別是圖一中A B C和A B綫的內插值。(d)即(b)減(c)。(e)即(a)乘(d)。

六、參考資料

1. Ashton, B., Hill, K., Piazza, A. and

一直是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神秘點。本文試圖利用有限的資料，藉著較嚴密的推算過程，以揭開此一神秘點。所得到的數值是否真確，只有等待將來中共官方公開當時的有關資料後，才能徹底揭曉。

表四、該生而未生的人口數。

(A)下限

年度	(a) 人口數 (千)	(b) 正常出生率	(c) 不正常出生率	(d) 差	(e) 未生人數 (千)
1957	646530	34.03	34.03	0	0
1958	601549	34.70	28.12	6.58	4353
1959	670493	35.20	23.86	11.34	7603
1960	675093	35.80	18.52	17.28	11666
1961	670448	36.50	16.41	20.09	13469
1962	669382	37.00	37.00	0	0
1963	687455	43.60	43.60	0	0
合			計		37091

(B)上限

年度	(a) 人口數 (千)	(f) 正常出生率	(c) 不正常出生率	(d) 差	(e) 未生人數 (千)
1957	646530	34.03	34.03	0	0
1958	661549	35.70	28.12	7.58	5015
1959	670493	37.20	23.86	13.34	8944
1960	675093	38.80	18.52	20.28	13691
1961	670448	40.30	16.41	23.89	16017
1962	669382	42.00	37.00	5.00	3347
1963	687455	43.60	43.60	0	0
合			計		47014

(b)(c)和(f)分別是圖一中H J、H I J和H K線的內插值。
(d)即(b)減(c)或(f)減(c)。(e)即(a)乘(d)。

表五、按自然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變動

(A)下限

年度	(a) 人口數 (千)	(b) 正常增長率	(c) 不正常增長率	(d) 差	(e) 死亡人數 (千)
1957	646530	23.23	23.23	0	0
1958	661549	23.90	13.52	10.38	6867
1959	670493	24.80	6.86	17.94	12029
1960	675093	25.40	- 6.88	32.28	21792
1961	670448	26.20	- 1.59	27.79	18632
1962	669382	27.00	27.00	0	0
1963	687455	33.50	33.50	0	0
合			計		59320

(B)上限

年度	(a) 人口數 (千)	(f) 正常增長率	(c) 不正常增長率	(d) 差	(e) 人口變動數 (千)
1957	646530	23.23	23.23	0	0
1958	661549	25.00	13.52	11.48	7595
1959	670493	26.80	6.86	19.94	13370
1960	675093	28.30	- 6.88	35.18	23750
1961	670448	30.00	- 1.59	31.59	21179
1962	669382	31.80	27.00	4.80	3213
1963	687455	33.50	33.50	0	0
合			計		69107

(b)(c)和(f)即圖一中E F、E D F和E G線的內插值。
(d)即(b)減(c)、或(f)減(c)。(e)即(a)乘(d)。

- Zeitiz, R.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613-645.
- Bernstein, T.P.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3):339-337.
-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 Vol. Ⅱ, (1983) The social sectors, population, health, nutrition and education. 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
- Johnson, D.G. (1982) Progress of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 Keyfitz, N. (1984)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Scientific American, 250:38-47.

- Subramanian, S. (1973)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1952-197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匡建昌, (一九八八)「三年災荒」回顧質疑, 中國之春雜誌總第五十六期八六、八七頁。
- 香港文匯報, 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

一票制勝

談權力轉移的客觀標準

●王炳章●

九月十五日，美國華裔政治家、德拉瓦州副州長吳仙標博士，以七十一票的些微多數，險勝對手畢爾德，獲得德拉瓦州民主黨國會參議員候選人資格。如果吳仙標在十一月參議員大選中擊敗共和黨候選人羅斯，他將成爲繼鄺友良之後美國國會中唯一的華裔議員。

吳仙標的獲勝，頗具戲劇性。十日晚開票結果，吳以二千多票落後畢爾德。吳當即承認失利，表示樂意返回教職。然而，十二日選舉部門發現計票有誤，進行重新統計。接着，形勢急轉直下，吳仙標反敗爲勝。在數萬選票中，僅以七十一票敗北的畢爾德，不但輸得服服貼貼，而且同意出任吳仙標競選委員會的榮譽主席，表現了美國政治家的應有風範。吳、畢兩人的聯手，使趨於分裂的德拉瓦州民主黨重新團結起來。

由吳仙標的七十一票制勝，我聯想到胡平在民聯三大上的一票制勝。民聯三大上，主席的競選緊張激烈，擁胡、反胡兩派壁壘分明。選舉結果，胡平以過半數一票當選。計票結束宣佈胡平獲勝後，反對胡平出任主席的代表紛紛向他表示祝賀，民聯旋即整合爲一體。

在民主運作的歷史上，一票制勝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八八八年，美國總統詹森因一票之

差，免於國會彈劾。一九八〇年，雷根與卡特角逐白宮，雷根在新城堡郡選區，僅以一票獲勝。

選票的多少，是民主運作中獲得權力的合法標準。爲什麼一票之差就使敗者心服口服？因爲選票是客觀的，多一票就是多一票。不服，下次選舉再見。

由選票獲得權力而聯想到由暴力奪得權力。衆所周知，凡群體生活的動物大都需要領袖的（領袖）。不少動物界通過暴力而產生領袖；大家拼殺一場，誰也打不過的那位便成了王。據說，猴子就用這種方法產生猴王。

顯然，通過暴力產生領袖、獲取權力，是比較原始的模式。共產黨一味鼓吹暴力革命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恰恰說明了它的落後性。

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之一，是人類具有理性。在初級理性的基礎上，人類察覺到用刀槍棍棒產生領袖的方式損失太大。於是，君主制出現了。老君主過世，其兒子自然繼位，獲得權力。這種簡單的血統繼承，省了很多麻煩和紛爭。

血統繼承的模式維繫了幾千年。在這數千年之中，人們也服，服的是：它畢竟也有一個

客觀標準——血統。沒有投胎皇家，不是皇帝的兒子，就無緣問鼎王座。中國的長子繼承制就更嚴了，老二都與帝位無緣，除非老皇帝廢長立庶。在中國，還有一種獲取權力的模式——科舉制。科舉制儘管有很多弊病，但也有一套客觀的評判標準，這就是分數。同赴考場，多幾分就成了進士，少幾分依然是平民。在客觀分數面前，大家都沒有話說。所以說，在君主制下，權力的獲得和轉移還是有客觀標準的。

到了共產黨執政，歷史倒退了一大截。尤其是權力的獲得和繼承，更是毫無章法。就拿「三梯隊」的接班模式來說吧，簡直連君主制、科舉制都不如，因爲它毫無客觀標準。「三梯隊」的意思是，有權的人看上誰，就可以把誰提爲第三梯隊，成爲權力的繼承者。這種憑當權者主觀好惡選擇繼任者的方法，只能把那些阿諛奉承之輩提上去，只能把那些毫無獨立見解、善於揣摩上司心思的人提上去。

君主制時代，太子若有獨立見解，老皇帝不能輕易廢之。因此，太子繼位之後，還有開創新局面的可能性。秦始皇、唐太宗都是例子。然而，在共產黨「三梯隊」模式下，就別指望後繼者開創什麼新局面了。因爲，你和頂頭上司持有異議，還怎能被選爲第三梯隊？

「三梯隊」模式的另一弊病是他人不服。不服的道理很簡單，就是缺乏客觀標準。不服，就容易出亂子。鄧小平辭世後，共產黨內的權力轉移將會出現危機。這是鄧小平「三梯隊」理論給自己種下的禍根之一。

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成熟的理性產物。在民主運作下，人類不再用暴力、不再用血緣進行權力轉移，而是用選票作爲客觀標準，來獲取和轉移權力。

大陸留學生爭取 J-1 轉換 H 簽證

發起運動致函美國國會議員義助

自從七八年中國開始允許學生到美國讀書以來，至今已有一百餘人完成了博士學位。他們拿的幾乎都是 J-1 簽證，如果曾經接受政府的學業贈款，則必須歸國兩年，否則不能轉換為別的簽證。如果所學專業在「所需技能一覽表」上 (SKILL LIST)，J-1 學生也要受到歸國兩年的限制。但是因為這些大陸博士都是在八四年七月十二日中國技能表生效之前進入美國，這一條和他們無關。

這些大陸博士中，相當一部分已經回國，但多數目前正在美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和工業界繼續進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們普遍感到在學得一身知識以後，應該為民族的振興而效盡綿薄，但是當前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狀況，却使他們在是否即刻回國服務的問題上猶豫不前。

去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對許多人的歸國熱情，不啻是當頭一盆冷水，清華和天津的學校負責人，在「人民日報」上申言絕不招收有自由化傾向的學生，導致許多人的反感和疑慮。如果十七、八歲的思想未成熟的青年人，尚且因為有所謂的自由化傾向而不准入學，那麼這些在美國獲得學位的人，是否還要寫一份思想總結，大罵「自由化」，才能被恩賜個「教授」頭銜呢？當前中國政府要求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用「業餘創收」的辦法，來彌補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也使許多人感到無所適從。特別是搞基礎科研的，如何能為企業服務，去「創收」？而由於基本學科入學申請容易，這些大陸博士中，絕大部份又恰恰搞得是基礎科研。另外，大陸的人事關係也是件頭痛的事。大陸高校、科研機構普遍人員過多，而每次評定職稱名額有限，許多六十年代初畢業的老大學生，這批

美國博士當年的老師，還在殫精竭慮地為「副教授」的稱號而奮鬥，當然不歡迎這些年輕二十餘歲的「幸運兒」回去橫插一刀。曾經有人準備完成學位後回國任教，却接到母校教師來信，勸他暫緩回國，等系裡幾位中年骨幹「擺平」後再說。至於科研條件的落後，信息的閉塞，經費的缺乏，和無理的行政干預，則更是被大陸知識分子稱之為「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的老大難。

由於大陸目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狀況，很難提供一個差強人意的環境，許多大陸學生希望能在畢業後，有一個選擇的機會。如果願意立即回國服務，固然是赤子之心，可嘉可勉；但是如果感到目前回國只是浪擲年華，從而希望從 J 轉成 H 臨時工作簽證，在美國再工作幾年，獲取更多的專業知識，今後能更有效地為國服務，則中國政府大可不必用各種措施強制他們回國。

在這些措施中，最為人不滿，最引人詬病的是，中國政府把那些僅僅是借了一張飛機票的學生，全部算作是政府資助，並把他們的名單提供給美國新聞總署 (DIA)，要求美國新聞總署拒絕他們 J 轉 H 的申請。從去年三月三日到今年一月廿八日，中國政府一共提供了三批名單共四千二百餘人。這些人中，除去真正由中國政府資助的訪問學者和研究生之後，還有一千餘人，對於他們，所謂的「資助」，僅僅是一張明確講定要歸國的飛機票而已，而且是中國政府經營的中國民航的飛機票，而且還規定必須用美元歸還。事實上，這相當於國外的商業貸款。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國外的商業貸款是自願的，而中國政府的機票貸款是強制的，即使你自己掏錢買機票，也必須接受。

在美國的任何一部法典中，貸款（LOAN）和資助贈款（GRANT）都是嚴格區分的。美國新聞總署在八七年三月之前，也頒發允許轉H的推荐信給這些J—1學生。但在八七年三月之後，突然停止頒發這類推荐信，使得許多大陸學生，在完成學位和一年半的訓練期後，即面臨着除了回國別無選擇的道路。

在美國移民律師公會副主席，律師路賓（EDWIN RUBIN）的指導下，一批大陸J—1學生，準備向國會議員寫信陳情，要求議員們向新聞總署施加壓力，糾正把機票貸款算作政府資助的不合理作法。信件將由路賓的律師樓按照每個學生的情況具體準備，並寄給每個學生所在州的國會議員。信件發出以後，路賓將代表發信的學生向國會和新聞總署交涉。除了向國會議員寫信外，這些大陸博士也在徵集簽名，準備聯合上書向美國總統和重要官員請願，希望他們過問。

這些寫信的大陸學生，僅僅是希望有一個合理的選擇。他們內心深處還是願意在幾年後回歸故國，在更高的水準上為推進中國的現代化而努力。他們不願意申請政治避難，從而傷害中國政府的感情，他們也不願意移民第三國從而永遠地成為外國公民。五年有效的H簽證給了他們一個保留最後選擇的機會。他們歡迎那些處於同樣情況的大陸學生——在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前來美，只是得到一筆必須歸還的機票貸款，當然最重要的是決心為自己爭取一個選擇的公正機會——加入他們的努力。有興趣的大陸J—1學生，向下列同學詢問詳情。這幾位朋友是：

張華一，RUTGERS UNIV. (201)
932 5185 ZHANGH AND RUTHER.
BITNET.

盧建平，CITY COLLEGE OF NY
(212) 690-6871 JP AND CONYSCI
BITNET.

王十慶，UCLA (213) 825-9035 WANGS
AND UCLACH.BITNET.

丁宏強，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 (818) 356-4629 DING
AND ELXSI RSD.CALTECH.EDU.

馮群，UNIV. OF FLORIDA (904) 371
-3453 FENG AND QTP.UF.EDU.

中共機構越精簡越臃腫

馮磊

中共執政以來，精簡機構的運動已搞了十多次，可是每一次結果都不如意，有時甚至適得其反，運動之後，機構不但沒有精簡，反而更加膨脹。甚至可以說，不精簡還不至於膨脹，一精簡反而膨脹。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在每次精簡機構時，有幾種人是不會動的，一是老弱病殘，因為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塞，基層也不肯要；二是老資格的幹部，會搞關係的人，他們總是會靠着自己的牌子和各種各樣的「後台」留下；第三是各種頭銜的當權派，他們是精簡計劃的策劃者、執行者，當然不會在自己身上開刀。於是最後被精簡的大多是剛來不久，年富力強，立足未穩的人，而他們常常是一個機構真正幹事的人，用現在的話就是真正的「骨幹」。

可以想象，當一個機構被裁掉了一批骨幹後，效率自然降低。可是工作總得有人做，於是為了彌補空缺，各機構又常常採用從下級機構或外地借調的方法來解決。借調人員自然是百裡挑一的人才，一般是既能幹，又待遇低。

因為他們不是從基層被提拔，就是由外地調進城，很多是長期夫妻分居的人。光是能解決夫妻分居問題，或是受領導重用本身就足以使他們受寵若驚了，所以他們最初總可以忍受很低的級別和工資待遇，而工作則尤其勤奮。

這種情況會持續兩三年，當這些借調人員立足已穩，他們就會提出各種「個人問題」了，轉正，級別，工資，房子等等。領導對於他們的合理要求自然無法拒絕，況且他們兢兢業業幾年，沒功勞也有苦勞，表現、成績有目共睹，憑什麼幹活比人多，待遇低一等？

可是隨着借調人員的轉正，原先被「精簡」的人便忿忿不平了。他們顯然是理直氣壯的，既然在他們原來的位置上還需有同樣的人幹同樣的活，憑什麼要把他們精簡？於是翻案，告狀，抗議……接踵而來，最後直到大多數被裁人員回到原機構或平級機構為止。

每一次精簡機構，這樣的循環就會重復一次，機構就會在不斷地精簡中不斷膨脹。這些聽起來似乎很滑稽，可是世界上就有這樣的滑稽事兒。

會錯意說錯話

熊玠的五點建議

邱垂亮

紐約大學政治學名教授熊玠，最近在海峽兩岸再度引起一陣中國統一運動的強烈震撼。據聞，熊玠統一旋風，正把大陸政策遲疑不前的國民黨衝擊得頭昏腦脹、手忙腳亂，頭痛死了。

這位名重一方的大學士，這兩三年來不太得意，尤其在國民黨權力中心的政治影響力上，曾沉寂一時。最近二度去了中國大陸，和中共最高領導層有深入接觸，隨後穿梭海峽回到台灣，直迫國府政治重地，傳遞統一和談訊息，要求台灣當局掌握千載難逢的時代契機，在鄧小平有生之日展開高層接觸和談判，在目前情勢仍相當有利於台灣的政治情況下走向中國統一之路。

突然間，熊玠再度變成政治新聞焦點。他引起頭痛，也引人側目。他的政治敏感觸覺性，令人嘆為觀止；他的政治有心人的使命感，

令人萬分欽佩；但是，他的書生論政、參政的政治行為、動作，實在天真浪漫，令人哭笑不得，很難平心靜氣、理性嚴謹地諒解和領教。

驚人的傳話

據報導，熊玠今年初夏去了北京（有說北戴河）和中共最高政治當局會談後，帶回台灣幾個驚人的、突破性的和談建議：第一，中共 and 國民黨一樣懼怕和痛恨台獨勢力的擴張，為了抵止和消除台獨政治力量的發展，中共願意更彈性地處理國共之間的權力之爭和統一問題。

第二，為此，中共願意在某些條件下宣佈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第三，甚至和國民黨商量協調修改中共國

家憲法，不將四大堅持（中共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列入新憲法。

第四，在這個新憲法下，海峽兩岸兩個政治制度同時存在，並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活動，先行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香港模式的「一國兩制」），經過一段談判過渡時期後再一國一制地統一起來。至於這個一制是什麼一制，則由雙方以談判方式達成協議後決定。

第五，進一步，雙方再談判籌組聯合政府。雖然上述五點和談統一政策的大變動，仍有語焉不詳的地方，例如第二的「某些條件下」，第四的「兩制」和「一制」，第五的「聯合政府」等，但是無疑地，它們是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發動銳利統戰攻勢以來，葉劍英「九條」和鄧小平「六點」和談統一建議之後，最具妥協讓步、突破震撼性的政策決定。

是真是假

問題是，它們是真是假？

鄧小平真的向熊玠說了上述五點嗎？真的說得清清楚楚了嗎？

如果是真，鄧小平真的確確實實、明明白白說了這五段話，我認為，李登輝應該馬上接受熊玠的苦口婆心的建議，大大方方地和鄧小平展開對話，進一步談判，解除海峽兩岸國共權力鬭爭的緊張局勢，甚而嘗試達到中國統一的政治局面的最終目的。

我也希望如此；但是，經過嚴謹細密的求證後，我發覺熊玠的「五點」和談建議是假的，根本不是、不可能是鄧小平放棄舊「六點」後推出的新「五點」的和談建議。鄧小平或其

他中共領導人，都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向熊玠「有記錄」(ON THE RECORD)地正式地說出上述五點的話。

我八年來去過中國大陸八次，雖然人微身賤，遠遠比不上熊教授的士林重望，但也見過不少中共高級官員，我曾多次向他們誠懇建議，要求他們中止武力解放台灣的威脅和在國家憲法上明確放棄中共黨的意識形態的四大堅持，他們都斷然拒絕我的建議，認為我的要求根本不切實際、不可能。一九八五年在廈門召開的「台灣之將來」學術討論會上，我提出的論文就是強調，國共兩邊兩個政權要開始接觸和談判，一定要有的先決條件就是中共國家（不是黨）的憲法裡面的四大堅持必須取消。我得到的迴應是一片異口同聲的不以為然。

「中國結」的作祟

這幾天，我和幾位中共中上級的統戰幹部提到熊玠的「五點」和談建議，他們也都一樣異口同聲地認為，鄧小平或趙紫陽都絕對不可能在對台使用武力和憲法四個堅持上做出這麼根本原則性的重大政策改變。他們說，熊玠不是說錯話就是會錯意，尤其是「聯合政府」，他們認為簡直是天方夜譚。

一九八四年鄧小平向西東大學的楊力宇教授提出「六點」和談建議時，楊力宇也曾會錯意和說錯話，但是基本上鄧小平是說了「六點」的話。我認為，這次中共最高領導層根本沒有向熊玠提出「五點」和談建議，熊玠完全是沒有「五點」的話地會錯意和說錯話。

熊玠恨台獨比恨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還要厲害，所以他一廂情願地希望、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也一定和他一樣深怕、深恨台獨。因此

，他的大一統的「中國結」又深又切，令他憂心忡忡，寢食難安，非要肩負歷史使命，剷除台獨患亂，達成中國統一不可。

因此，他必然一廂情願，必然天真浪漫，必然盲目無知地接受、相信中共領導層的「情至義重」的統戰說詞，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以修飾美化，無中生有地會錯意、說錯話，說出一套他認為是合情合理、可接受可實現的「五點」和談統一的新政策、新建議。

鄧小平應講話

總之，熊玠的「五點」和談建議，是無中生有的。他在台灣公然宣揚推動這些統一政策，實在可能造成相當大的政治分裂和破壞，台灣全國上下不該等閒視之，應該嚴厲質問：「熊教授，請拿出白紙黑字、鄧小平簽了名蓋了章的證據來！」這樣重要的話，由熊玠傳一定不對、不夠。

這不是兒童玩笑的事。隔岸的中共大頭頭們，不能隔岸觀火，甚至心中樂樂地看國民黨手忙腳亂、焦頭爛額。真的有沒有上述的「五點」新政策？熊玠的話是真是假？鄧小平或趙紫陽應該站出來說話了。

如有，如真，我將等一個向熊玠公開道歉，並公開支持熊玠最近主張的中國統一運動。只要中共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和放棄四大堅持，我就馬上贊同國共接觸和談判，並主張在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下走向中國統一的長遠道路。我一向相信民主主義比民族（國家）主義重要，也許熊教授不同意這個看法；但是，我認為我們兩人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人。所以，熊教授應該可以接受我上面的結論。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訂費（每年）
地址： _____	寄達地區
_____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_____	機關：60美元 200港元
_____	普通訂戶：24美元 96港元
_____	學生訂戶：20美元 84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第 _____ 期）開始	
北美地區：China Spring P.O.Box 701400 Train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贊助2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3-872506 香港九龍深水埗基隆街236號閣樓後座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 STORE	航空：10美元 平郵：5美元



河

魂

(上)



蘇曉康

王魯湘

第一集 尋夢

〔音樂起，男高音獨唱。〕
你曉得——
天下黃河幾十幾道彎？
幾十幾道彎上，
幾十幾隻船兒？
幾十幾隻船上，
幾十幾根竿兒？
幾十幾道彎上，
幾十幾個艄公，
來把船兒扳？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吸引成千上萬中國人的黃河漂流探險傳來兇訊。洛陽和北京兩支黃漂隊都在拉加峽下峽翻船遇難。曾經漂過

長江虎跳峽的兩位勇士郎寶珞、雷建生也被黃河激流吞沒。國內一時議論紛紛。

據報導，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為決不讓美國人肯·沃倫拿走中國江河的首漂權才鋌而走險的。肯·沃倫對此十分不解。他說，你們中國人如果到美國去漂密西西比河，是不會遭到反對的。當然，沃倫先生永遠無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百年前西方列強的炮艦在中國江河裡橫行的歷史聯繫起來。可中國的青年忘不了。

當這些漂流者拋屍黃河的時候，我們是稱道他們有愛國精神呢，還是批評他們的盲目民族感情？

無論怎樣，他們把這件事情偏偏做在我們民族的母親河上，悲壯和悲劇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僅僅只表現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伙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伙就罵、就砸、就鬧事。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當然，也有不少不再為這些事煩惱。他們匆匆離開祖國，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個究竟。同時，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們，又紛紛回到祖國來看個究竟。這兩股雙向逆反的風潮又說明了什麼呢？

是近百年來總是被動挨打的歷史造成了我們今天的心態嗎？或者說，是近幾十年來的貧困落後造成的嗎？

或許是這樣，但不完全是。在這些現象背後隱藏着的，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於：文明衰落了！

本世紀初，有個叫陳天華的中國青年，面對當時正處於黑暗中的祖國，在日本蹈海自殺。那時，有幾個中國人能夠理解他呢？

今天，我們回想起這個陳天華，仿佛可以推測他那深刻的絕望，也許正是對文明衰落的——一聲微弱的嘆息……。

我們再也不能迴避對中國古老文明命運的反思了！

（推出片名：第一集 尋夢）

在當今的世界上，面對着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和全球文化匯流的大趨勢，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臨着現實與傳統的嚴重危機。傳統越古老，危機越沉重；危機越沉重，尋根越熱烈。

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在哪裡？

大概每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都知道一個常識：中華民族是黃河孕育的。

那麼，這條大河是怎樣塑造我們民族性格的呢？它又是怎樣歷史地規定了我們文明命運的呢？這恐怕就不是每個人都認真思考過的了。

這的確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條大河。它從巴顏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發源，向東流去時經過一座黃土高原以後，就變成了一條黃色的泥河。這條黃河偏偏又孕育了一個黃膚色的民族，這個民族恰恰又把他們最早的祖先叫做黃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個人中間，就

有一個黃帝的子孫。

黃水、黃土、黃種人，這是一種多麼神秘的自然聯繫。它仿佛讓人相信，這個黃色人種的皮膚就是被黃河染成的。

的確，天地間還沒有其他一種自然力量，會像黃河這樣對塑造華夏文明起着無法估量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必要去作繁瑣的考古論證，只從一個在中國最常見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印證。

它，幾乎可以說是我們民族的象徵。可是，人們是否想過，華夏民族為什麼會崇拜這麼一個形象兇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個龍年，對龍神崇拜的研究也熱鬧起來，這無疑也是文化尋根的一種表現。

據說，我們的祖先，從跨天接地的彩虹中，看到有兩個頭的巨蛇從大地吸水的壯麗景象。也有人說，先民們從撕裂雲層的閃電，看到金蛇狂舞伴隨風雨交作。

於是，他們創造了龍的形象；這是一個典型的大河民族的夢。

〔演播室。學者談龍神文化。〕

蔡大成（神話學學者）：龍在我們看來，是原始人按特定觀念組裝起來的，是一個組合體。有哪些組裝件呢？馬的頭、鹿的角、蛇的身、雞的爪。蛇身體現了原始人的生命觀念。原始人很少看到死的蛇，以為蛇年歲大了，蛻一層皮就年輕了。雞爪也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老太太上菜市場挑雞，總先看看雞距，如果距短呢，就嫩。馬齒也是這樣：「幾歲牙口？」鹿角每年換一回，再重新萌生鹿茸。每年長一

個叉，獵人一看鹿角有幾個叉，就知道有多少歲。鹿角掉了，象徵死，萌發象徵生命、再生。因此，龍在文化含義中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象徵着古人對生命的循環、死而復生的願望。

謝選駿（「文化哲學」叢書副主編）：龍神崇拜，就是讓人去崇拜那種不是人的東西——龍。中國的統治者，自命為人世間最高貴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貴的存在物，認為自己是龍的化身。這樣，我們就在兩者間找到了一個聯接點：龍是自然界的橫暴者，皇帝是人世間的橫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種不是人的東西。

總而言之，龍的崇拜，之所以會起源於黃河流域，正是這個大河流域民族對它的生命之河的敬畏。黃河無疑是世界上最暴戾最任性的一條大河。

有人說，在中國文化中有某種寬容惡勢力的成份；也有人說，中國民族性格中，有圓滑世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致命弱點；那麼，這決不是偶然的。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來說，農業的命脈正在於水。水却被龍王主宰着。於是，這個民族愛它也恨它、贊美它也詛咒它。這是一種多麼複雜的感情，就象龍的形象一樣複雜。

於是，中國人也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他們要把龍王老子供奉得使它無可挑剔，把它捧上權力的峰巔；另一方面，他們又要在豐收鑼鼓敲響的時候，着實地戲弄這老東西一番，出出一年磕頭燒香、誠惶誠恐的惡氣（舞龍的場面）。這真是一種絕妙的中國式的智慧和幽默。

默。在敬畏和戲弄之間，人們獲得了微妙的心
理平衡。

正像修建金字塔使埃及人創立了國家一樣，
同黃河的搏鬥，也使中國凝聚起來。我們的
文明史就從大禹開始。幾千年來，對水的渴求，
竟成爲中華民族的一種生存偉力。這種神秘的
命運至今還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國。

（電影「老井」片斷。械圍。孫旺泉跳井
。井塌。）

發生在太行山這個老井村的故事，多麼深
刻地揭示了中華民族的生命動力和悲劇性的命
運。它的含義幾乎可以象徵性地涵蓋整個民族
歷史。因此，它才達到了一種與世界對話的高
度。作者鄭義正是從黃河岸邊獲得這種啓示的。

〔演播室。作家談黃河。〕

鄭義（山西作家）：三年以前，我騎着自
行車從山西和內蒙交界的地方一直跑到河南，
跑完了整個晉陝峽谷，走了幾十個鎮子，幾十
個縣，跑了一萬多里地。那次經歷對我來說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經歷。從那次我對黃河有了
第一次直接的親身感受後，我才理解了黃河爲
什麼是我們民族的象徵。我跑的這一段，是傳
說中的堯舜禹的故都以及他們的出生地，後來
中華民族的歷史也都在這塊地方演出了許許多
多的活劇。那次經歷使我的文學觀念發生了根
本的改變。我在一小村子裡頭聽到一個故事
。原來有一個村子的農民是靠着黃河水邊維生
的。後來因爲航運衰敗，這個地方又沒有什麼
耕地，他們沒有生計了。國家把他們搬遷到別
處，給他們分了地、蓋了房。過了幾年後，這

些人又莫名其妙地一個一個地回到了黃河邊上
，又找到了過去的窩洞住下了。我怎麼都不能
理解，這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後來經過
一個長時期的思索後，我體會到這是人與土地
的一種永遠說不清楚的感情上的聯繫、血肉般
的聯繫。

我覺得這個故事比較好地反映了我的一種
心情。我一見到黃河，我一跑完了黃河的這一
段後，我一下找到了我自己應該寫的東西。這
幾年我一直在文學上尋找，尋找什麼我不知道
。可一見到黃河，我就立刻感覺到我要寫的就
是黃河。

環境越困難，刺激文明生長的積極力量就
越強烈，這是西方史學界的一個著名觀點。他
們認爲，黃河流域之所以成爲古代中國的搖籃
，可能就是由於人類在這裡所要應付的自然環
境的挑戰，比中國的南方，例如長江流域，要
嚴重的多。人們潛伏的創造才能被挑戰刺激起
來了。

黃河孕育的文明，的確是人類歷史上一種
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惡劣氣候和洪水泛濫的鬪
爭，使得中國人的治水、歷算、土地測量以及
農業耕作、飼養家畜、制陶冶煉等等技術，比
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歷史演變、
社會機制、政治組織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
條純粹東方式的道路。

今天如果有人告訴你，東方社會那悠久的
專制主義實際上同水有關係，可能你會覺得奇
怪。其實，這種看法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
來的。他們認爲，東方的自然氣候狀況，使大
規模的人工灌溉設施成爲農業的首要條件，在

那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必須由一個高度集中
的中央專制政權來組織成千上萬人去完成。這
就是著名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可惜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這個問題徹底講清楚
，讓後人一直爭論不休。

實際上，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大
運河和長城，還是南美洲叢林中的瑪雅人金字
塔，這些讓現代人嘆爲觀止的古代浩大工程，
不都顯現着非常相似的「亞細亞式」的歷史陰
影嗎？不都是古代大帝國的遺物嗎？

成千上萬微不足道的個體，被某種秩序排
列組合在一起，擁戴着那個至高無上的頂峰，
這種大一統的社會結構，不是很像一座龐大的
金字塔嗎？因此，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
，就很難成爲「亞細亞」的了。

亞細亞，是一句古閃米特語，意思是「太
陽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溫帶歐亞非三大洲
的接壤處，從冰山雪峰中淌出來的幾條大河，
分別孕育了人類最古老的幾個文明。

無論是黃河、尼羅河、還是底格里斯河、
幼發拉底河以及印度河，這幾條著名的東方江
河，都成爲人類文明的搖籃。因此，亞細亞是
創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從亞細亞升起，就像
太陽從東方升起一樣。

但是，五千年過去了，亞細亞的太陽墮落
了。這幾個最先閃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遲
一個個黯淡下去了。

這是爲什麼呢？

（再一次推出片名：尋 夢）

曾經屹立在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古城，早已蕩然無存。在八千年前的蘇美爾文明之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始終浸泡在無窮無盡的征服之中，一個又一個大帝國傾覆了，許多古老的民族相繼從歷史上消失了。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時，亞歷山大大帝，已經在焚毀波斯王的壯麗宮殿了。

尼羅河畔的大金字塔，也像隱退到歷史中去的一個迷夢，永遠渾渾沌沌。憂傷的司芬克斯蹲在這裡，彷彿什麼也不想解釋。古埃及帝國，在長達數千年的三十個王朝中，也曾經強盛得猶如這金字塔一樣無以倫比。但是，早在亞歷山大到來之前，它就淪於波斯人之手。在後來的數千年裡，它那被征服的厄運直到近代才結束。

在更靠東方也更加肥沃富饒的印度河、恒河流域，一種與西方完全隔絕的古老文明，在亞歷山大遠征來到之前，已經延續了幾十年。有人曾經說過，寫印度的歷史，一直寫到距今四百年前可以不提到一個海字。然而，當歐洲的海盜出現在印度洋的時候，這個文明就在劫難逃了。

在喜馬拉雅山背後的這個黃種人的文明，却異乎尋常地延年益壽。這似乎是一個例外。爲什麼封建社會形態在中國長期延續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多少年，人們提出種種解釋，總認爲這是一個特殊現象。

其實，真正特殊的並不是東方的古老現象，而是歐洲出現了突變現象。美國哈佛大學的

華裔學者張光直教授認爲，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由於自身具有重視經濟、貿易和技術等因素，最後走向了現代西方工業文明。它在整个人類文明史上，原來並不是一條常規性的歷史走廊。

在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規通道，實際上是東方方式的亞細亞形態。張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國文明同中美洲瑪雅文明的相似性，認爲它們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產物。他認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類似的普遍性。

因此，並不是中國文明多麼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長，恰恰是整個古老世界的最後掙扎。亞細亞遇到的挑戰，是歐洲對全人類的挑戰。

也正因爲如此，文明的古老反而讓中國人心理上的傳統負擔格外沉重。當黃河文明也象埃及和印度一樣，終於衰落下來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心靈就特別悲涼和痛苦。

一個曾經使馬可·波羅驚嘆不已的東方大國，一個讓歐洲君主驚恐地虛構出「黃禍論」的龐大民族，也曾經令蓋世無雙的拿破崙警告西方不要去驚醒的一頭睡獅，爲什麼會在近代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爲什麼我們終於擺脫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之後，忽然又覺得自己是非常強大的呢？

在我們的民族情感上，總有這樣一個誤區：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種光榮歷史的斷裂。自從一八四〇年以來，總有人用古代的榮

耀和偉大，來掩飾近代的貧弱和落後。

在近百年的現實痛苦中，好像總需要有一副古老而悠久的安魂劑聊以自慰。從每一次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中，似乎總能獲得一次安慰。

然而，文明畢竟衰落了。

歷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畢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我們的考古發現再豐富、文物古迹再精美、文明的源頭再延伸，難道不都意味着祖先對於後代的嘲笑嗎？難道不是讓我們今天的遺憾、懊悔和慚愧更沉重嗎？

據說，有一位汽車製造廠的廠長，那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輛一輛數長安街上的車流。當他數到第一百輛時，只數到三輛國產車，其餘九十七輛都是進口的。

這件事，使人可以聯想起一八四〇年林則徐在虎門焚燒鴉片的濃烟，也可以聯想起三十年代抵制日貨的風潮。

然而，歷史和現實就是這樣不客氣地嘲笑我們。

我們的驕傲和我們的悲哀，常常就是一碼事。

（張明敏身着龍紋長袍唱「龍的傳人」。）
哪個中國人不熟悉這支歌呢？

你從這歌聲裡聽得出有一種深深的嘆息嗎？
嘆息又有什麼用呢？

（九龍壁。噴火的龍舟。盤龍大石柱。龍

年郵票。)

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經凝聚了我們祖先的多少惡夢，難道我們還要用它來凝聚我們今天的悲涼和懷舊之情嗎？

龍的崇拜，似乎可以證明，我們民族的心靈，還深深地懷戀着黃河孕育的那種古老文化的氛圍，還遲遲地停留在祖先的歷史陰影之中。這顆心靈如同活在夢中。今天，確實到了徹底喚醒它的時候了。

我們也許不必計較人家要來漂我們的黃河。江河漂流無非是一項體育運動，用玩兒命的辦法去同人家賭這口氣，似乎也不是有力量的表現。有朝一日，我們終於能夠找回體育運動的本來意義，該去漂漂他們的密西西比河，那將是一種瀟灑的娛樂。

我們也不必為輸一場球，丟幾個冠軍而捶胸頓足。奧運會的金牌並不等於證明我們是強國。我們的千年帝國之夢，早在康熙大帝那會兒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緊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騙自己了。

文明衰落了，我們也不必哀傷。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計算過，人類歷史上一共出現過二十一種文明，其中十四個已經絕迹，六個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們應當勇敢地正視歷史。

幾千年來，黃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隨着征服的外來衝擊，但它始終沒有隕落。我們曾經很欣賞這種強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儘管外來衝擊不再伴隨着大

炮和鐵蹄，我們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擋不住了。它已經衰老了。它需要補充新的文明因子。

龍的傳人呵，黃河能給予我們的，早就給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祖先已經創造了的文明，黃河無疑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們創造的，是嶄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從黃河裡流淌出來。舊文明的沉渣已經像淤積在黃河河槽裡的泥沙一樣，積淀在我們民族的血管裡。它需要一場大洪峰的沖刷。而這場大洪峰已經來到。它就是工業文明。它在召喚我們！

第二集：命運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首都機場握住了周恩來的手。自從新中國誕生以來，這是中國第一次同西方握手。七年後，鄧小平訪問美國。這也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第一次真正走進西方。

邁出這一步對中國來說，是多麼艱難呵。遠的不說，就在「文革」中，「四人幫」不是還吆喝過「買船就是賣國主義」嗎？當我們終於向全世界宣佈對外開放、驟然推開國門的時候，我們對這個星球是何等陌生。難道忘了，就在那些彩電、冰箱和高級轎車強烈吸引我們的同時，我們不是曾經對牛仔褲、披肩髮和迪斯科等等，反而很看不習慣嗎？

一個封閉太久的國家、一個從來認定自己是「中央大國」的民族，要讓它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是需要經過無數災難和耻辱才能領悟到的。這既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這種選擇，歸根到底，乃是一種歷史的命運。

運。我們今天回首歷史，就會發現，那曾經主宰過我們祖先的命運，正逼得我們必須如此選擇！

人類崇拜太陽。

有人說，太陽送給地球的第一份珍貴的禮物，應當是土壤。

若干萬年前，當地球上的冰川消融後，南行的風，卷起冰積物中的黃色粉土，紛紛揚揚地洒滿了地球中緯度的表面。

這茫茫一片黃色豐厚的土地，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家。

面對這片支離破碎的高原，的確難以想像，遠古那充滿魅力的聲勢浩大的黃帝族的傳說，竟然就發生在這漫天遍野溝壑縱橫的黃土地上。

研究古文化的學者們提出過一種說法，黃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黃帝」就是黃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國人常愛談的那個「皇天后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由此看來，黃帝被尊為中華民族的祖宗，乃是黃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黃土高原上的中國人，生於黃土，長於黃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黃土。吃的是黃米、黃豆，住的是黃土山下挖的窯洞，喝的是黃泥湯的水。古時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當了皇帝，就要穿黃袍、走黃道，住的是黃色琉璃瓦大殿。死了以後呢？統統都赴黃泉。

因此，世界上其它民族對土地的崇拜，都不及我們的祖先那樣虔誠、那樣隆重而深刻地把它烙印在自己的文化和心理之中。

(北京先農壇斑駁殘碎的壇基)
天子和大臣們，每年都要來這裡舉行「親

耕」。皇帝右手扶着漆金的雕龍犁，左手執鞭，在兩名老者的攙扶下，在這象徵土地的祭壇上步行三次，就算完成了「親耕」。於是五穀豐登，指日可待。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面朝黃土，背向青天，土裡刨食。土地是命根子，是傳家之寶，是人生的全部意義。

幾千年的文化，都凝聚在這黃土裡。於是，它就顯得很神秘，彷彿包裹着中國人的心魂。

〔演播室。作家談黃河。〕

張煒（山東作家）：黃河流了好多年，它把好多秘密都滲透在兩岸的泥土中。有兩個老頭兒，十幾歲時流浪到東北去，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幾經周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這是個離黃河入海口二十多里的村莊。……回去的時候，每個人從地裡包了一包土走。走的前一天晚上，兩個老人摟抱着，在炕上滾動着哭了一夜。我一直到現在也搞不明白，這包泥土裡邊有什麼東西？

哲學家好象琢磨得更透一些。

黑格爾曾經說過：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們卷入無窮的依賴性裡邊，但是大海却挾着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圈子。這種超越土地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

今天的中國青年，也許會責怪我們的祖先：你們爲什麼那麼眷戀大陸，始終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這就是歷史的命運。
至遲在大約八千年前，農耕文化在黃河岸

邊就誕生了。從四處狩獵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邁出的關鍵的一步，據說是從一隻採集種子的婦女的手開始的。

擺脫野蠻人的第一個代價，就是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難道我們的祖先能不這樣選擇嗎？

更不可選擇的是，黃河中下游這塊文明的搖籃地，偏偏又處在一種很獨特的地理環境之中。

〔演播室。學者談中國地理環境特徵。〕

馮天瑜（湖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河中下游作爲中華文化的核心地帶，它的北邊是比較難以逾越的蒙古戈壁，西北是萬里黃沙，形成交通障壁。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最險峻的青藏高原。東邊面臨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它的浩瀚無際跟地中海的情形不一樣，對古人來說也是難以征服的，這麼看來，地理環境對以黃河流域爲中心的中華文化形成了一種隔絕機制，造成了一種內向的、求穩定的文化類型。

因此，中國人既不像歐洲民族那樣生活在地中海周圍，也不像美國人那樣住在兩個大洋之間。命運就給中國人安排了這樣一種生存空間。

幾千年來，肥沃的中原地區始終面對着北方那個廣袤縱深的蒙古高原，這種平原與高原的直接對峙，在歐洲是不存在的，它形成了某種奇特的歷史關係：處於遷徙無定狀態中的高原游牧民族，始終把平原大河流域，作爲他們爭奪的一個目標，經常像洪水一樣從高原上橫衝下來。整個中國古代史，幾乎就是一部游牧人同農耕人爭奪生存空間的歷史。

因此，直到封建社會末期，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還對華夏農業文明充滿了一種文化上的自豪。他不無鄙夷地嘲笑「夷狄」的游牧文化，還處在「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略婚宦、馳突無恒」的低級階段，而在中原地區，則「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婚姻仕進之可榮」。

在工業文明出現以前，誰能否認這樣的華夏農業文明的先進性呢？理所當然，中原人是必須保護它不受游牧文化的侵擾的。

最好的保護手段，莫過於「城廓」。

在陝西臨潼姜寨出土的原始村落遺址，也許是最早的城廓雛形。你看，所有房門都朝向中心廣場，村落只朝東方留着通路。這種布局，明顯地突出了團結向心的精神。

當我們再俯瞰北京城時，會驚訝地發現某種六千年的一致性。

後來，有了城牆。

到戰國時期，這城牆又擴大到國境綫上。把現有的明長城再向外推進五百到一千華里，在陰山和賀蘭山脈一綫，就是當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築的長城，也就是傳說中的孟姜女哭罵的那個長城。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浩大的工程，而指導這個工程的全部思想，早在數千年前，已經由姜寨部落的首領發明了。

有了城防，對外可以抵擋游牧民族的劫掠，對內則產生一種凝聚力，把城內的人民壓向一個權力核心。因此，誰修了長城，誰好象就擁有了長城以內的土地、山河與人民，長城也就成了他家的院牆。

然而，在愛琴海邊，一個西方的千古一帝亞歷山大，早已率領着他那所向披靡的馬其頓

大軍，遠離自己的祖國，橫掃了歐亞非各個古老帝國。仿佛同亞歷山大的東征前後呼應，秦始皇也開始了大規模抗擊匈奴的戰爭。這位千古一帝，決不像亞歷山大那樣四處游蕩，而是按照東方帝王特有的思維習慣和想象力，修築了亞歷山大做夢都想不到的萬里長城。

秦始皇的這種偉大的想象力，仍然是一種不能超越土地的形象力。

到了公元一〇二年，追擊匈奴直達中亞腹地的一位中國漢朝將軍班超，爲了窺視羅馬帝國的虛實，派出他的副將甘英西渡波斯灣。然而，甘英却被海浪吓退了。

從亞歷山大的東征，到班超的西進，歷史走過了將近四百年。由於高山和大海的阻隔，東西兩大帝國所代表的兩大文明，在歷史的邂逅中兩度失之交臂。那種直接的對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同化和反同化所可能激起的強烈火花，終於沒有在歷史的大舞台上閃現。

幾千年來，中國人在這塊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對於節氣這樣的大的時間觀念和春夏秋冬這樣的季節循環，特別敏感，但世世代代的生活，却仿佛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復着。因爲有上千年的歷史作爲大的時間座標，中國人也習慣於把百年興衰，只看作是歷史長河的短暫的一瞬間。盛衰的交替，猶如多去春來。多麼重大的社會變動和人間災難，也似乎是過眼烟雲。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具有深刻的歷史感，但同時，也都不像中國人那樣奉行着一種獨特的、聽天由命的生命哲學。

長城就把這個寧靜的、熟透了的農耕文明緊緊地包裹起來。久而久之，它就變得再也不會像秦皇漢武那樣去主動出擊了。

然而，北方那個沉默的蒙古高原常常會突然蘇醒過來。

高原是凝固封閉的，不易到達的，但它却很容易把內部積聚起來的力量和衝動送到平原上來。一旦遇到干旱，游牧人的牲畜大批死亡，他們就會統一起來，衝下高原。鄰近的農業文明就災禍臨頭了。

當成吉思汗兇猛的騎兵潮水般湧來的時候，別說長城，就連黃河長江這樣的天塹，也抵擋不住。

北中國的大地，幾度桑田，幾度牧場。長城南北，幾番征戰，幾多白骨。忽而是漢妾辭宮，公主和親；忽而是番王來朝，納貢稱臣。多少歷史的悲喜劇，在長城的巨大背景下輪番演出。

如果說秦皇漢武修長城，還表現了華夏文明的氣魄和力量的話，那麼，到了十五世紀中葉明朝重修長城，就完全成爲一種失敗和退縮的舉動了。

這條一萬一千華里的磚石砌成的明長城，比起秦漢長城來，自然是牢固多了。然而，它也使明朝耗盡力量，元氣大傷。等到女真人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一代雄傑努爾哈齊揮戈南下的時候，這綿延萬里的磚石長城，只能再一次記錄巨大的失敗了。以致於後來康熙皇帝說：修築長城，實屬無益。

古北口的這一段雄偉的長城，是由一代名將戚繼光鎮守薊州時督建的。

這位「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的名將，被史學家稱爲「孤獨的將軍」。他不但修建了北國第一段長城，爲了抗擊倭寇，

他還曾在海邊修了一座海岸長城——那就是著名的蓬萊水城。中國的第一支海軍，就守在這城牆的後面。

毫無疑問，戚繼光是明代最有天才的軍事家。不過，他留給我們的遺憾也是巨大的：爲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過海洋來打中國，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竟然連想也沒想過要去那個島國看看這倭寇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什麼當時的歐洲已經擁有火器裝備的海軍四處侵略，而中國還只知道修築萬里長城？並且竟然把長城修到了海邊呢？

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將星殞落，戚繼光在貧病交加中死去。長城，隨着戚繼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義。

與此同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整裝待發，出征英國，去揭開近代世界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一頁。

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建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着它，仿佛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沉思。

與秦長城的被遺忘相反，向後退縮了一千華里的明長城却受到了無比的崇拜。人們爲它是地球上唯一能被登月宇航員看到的人類工程而自豪。人們甚至硬要用它來象徵中國的強盛。然而，假使長城會說話，它一定會老老實實告訴華夏子孫們，它是由歷史的命運所鑄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劇紀念碑。它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榮光，它只代表着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的不出擊。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們民族的心靈上。呵，長城，我們爲什麼還要謳歌

你呢？

學者們已經發現，綿延萬里的長城，正好同十五英寸降水綫大致重合。這條降水綫，正好又意味着農業和非農業。

今天，在寧夏紅石峽長城之上，我們還能看到我們祖先留下的「華夷天塹」的石碑。這的確是農業文明的最後邊界。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我們的祖先永遠無法超越土地和農業。他們最奇偉的想象和最大膽的舉動，都只能是修長城！

歷史上大約還不會有過像明太祖朱元璋這樣一位要把百姓牢牢綁在土地上的皇帝。他一再申令「不許片板下海」，這固然包含着國防的目的，但他也深深懂得，只有把全體人民牢牢地捆綁在土地上，他的王朝才是鞏固的；他對離開土地的人深惡痛絕，一律「遷之遠方」，明朝法律規定：任何人外出必須持有證件，否則關卡查獲立即送官。

流動、遷徙、貿易都被窒息了。土地和專制把中國人捆死了，幾百年下來，中國人怎麼還能懂得自由和貿易呢？

十五世紀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世紀。人類開始把眼睛從大陸移向海洋。不管是對東方，還是對西方，歷史都公平地讓它們進行一次選擇。無論是太平洋、印度洋，還是大西洋，都對大陸上的民族敞開着胸膛。站在十五世紀的門檻上面對着大海，這個在大陸上待慣了的華夏民族，將作出怎樣的選擇呢？

公元一四〇五年，一支十五世紀全世界無與倫比的龐大的船隊，乘着強勁的東北季候風

，浩浩蕩蕩離開福建五虎門，在歷史給予的大選擇前，率先駛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對這支船隊的遠航目的猜測紛紜。

由鄭和率領的這支船隊，前後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於東南亞和南亞，又橫渡印度洋，航程遠達阿拉伯和東非海岸。

然而，人類歷史還不會有過這樣一次毫無經濟目的的大規模航海活動。它是一次幾乎純而又純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於海外諸國，以表達中國皇帝對它們名義上的「最高宗主權」。多麼慷慨溫和的君子國行爲呵。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和貿易。可是，太平洋邀請來的中國人，竟是所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謙謙君子。中國人即使來到海上也還是不能超越陸地上那種有限的思想和行動的圈子。歷史選擇了中國人，而中國人却不能選擇歷史。

僅僅幾十年後，代表着弱小的資本主義的四艘小帆船，葡萄牙人達·伽馬的率領下，爲尋找財富和市場駛入了印度洋。那時，龐大的鄭和船隊已經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逝得無影無踪了。而歐洲人却開始了地理大發現的偉大探險。

這既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亞細亞，這個「太陽升起的地方」，這個世界歷史的創始之地，由於這次歷史大選擇的坐失良機，太陽將不再升起。

曾經在這個地球上遙遙領先的中國文明，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屈辱和被動的命運。

將近五百年後，北洋水師在黃海，與日本海軍展開的甲午大海戰中全軍覆沒。無論是丁汝昌還是鄧世昌，他們的悲劇性的失敗，其實

早在戚繼光和鄭和的時代就已經注定了。

幾千年來，中國東南方的太平洋一直是沉默的。一旦太平洋的狂濤，載着西方列強的軍艦，和比軍艦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呼嘯而來的時候，中國人已經沒有還手之力了。

這來自西方的海嘯，決不像過去從蒙古高原上洪水般沖決下來的游牧文化，泛濫一陣便很快退得無影無踪。海上來的是一種新文明，古老的華夏農業文明再也不可能同化它了。於是，種族危亡和文明危機同時爆發了。

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外寇於國門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對外開放，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這極爲矛盾的救亡與近代化的雙重變奏，近百年來交替書寫着中國畸形的歷史，真是錯綜複雜，頭緒萬分，剪不斷，理還亂，讓中國人付出了無數沉重的代價！

古老而孱弱的農業文明，逼得我們的祖先只知道用靡費而不中用的長城來保衛自己的真實，逼得他們即使走到海上也不懂得貿易和競爭。這種文明的萎縮，如今已經在萎縮着整個華夏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我們再也不能失去命運賜予的任何一次機會了。

今天，我們已經變得聰明多了。

如果說，中國已經放棄了歷史的選擇，那麼我們再也不會拒絕選擇了。

如果說，命運並不是宿命，那麼我們再也不會聽任它的擺布了。

我們已經看到，黃河東流萬里，最終還是流入大海。

我們不再拒絕大海的邀請了

怪黃河，還是怪共產黨？

在今年三月紐約舉行的兩岸留學生座談會上，哈佛的丁學良同學指出，在大陸的文化界，有一種「符號象徵主義」。「就是說符號本身及符號真正想指的東西往往不是一回事」。例如，「有些人借批評傳統文化為名，批判現實中的一些毛病。」他還指出，由於「官方有意不讓大家很清楚地區分什麼是文化層次，什麼是制度性層次，什麼是現行體制方面的問題。真話、明白話無法說出，使得青年人把現實中的一切困難，全部歸因於中國傳統。」

對於丁學良的這個觀察，我作過一點小小的補充。我以為在大陸文化界，固然有着一「借文化打政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現象，」不過大多數人早已訓練有素，能在字裡行間尋找背後的意思。

其實問題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有些人的確是在那裡指桑罵槐，許多讀者對此也心領神會。另一方面，可能也確實有些人是把自己公開說的一切完全當真，或者是，起先並不當真，但後來漸漸「進入了角色」，忘記了或不再承認自己針對的目標其實是「槐」而並不是「桑」，而有些讀者也信以為真。

閱讀轟動大陸的電視系列片「河殤」的講解詞，我不由得想起了上面的問題。

現在，我們希望弄清楚的是：這部以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為名的電視片，它的真正內涵到底是什麼？導致中國今日的落後上，主要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是該怪黃河，還是該怪共產黨？

我不願意去妄自推測「河殤」作者們的真正用意，那多半會引起不必要的困擾。我只是作出我的解釋，寫下我的片斷感想。

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整個「河殤」是立足於現在反思既往的。觸發這種反思的前提是我們發現了自己的驚人的貧窮落後。但是，請不要忘記——

炎黃子孫遍布天下，並不是每個地方的中國人現在都那麼貧窮；

屬於所謂黃河文明的地方不止中國大陸，並不是每個地方今天都那麼落後。

今日中國大陸社會的各種陰暗現象，並非都是歷史的重演或再版。

由此，我們該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把一九四九——一九七八這段歷史稱為閉關鎖國，稱為堅守古老的農業文明，未必是恰當的。

在這一段歲月中，我們不是成天「胸懷全球，放眼世界」麼？我們不是以「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自傲，並且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麼？我們抗議過英法霸占蘇伊士運河，聲援過古巴卡斯特羅的革命，我們積極參與過印度尼西亞的九三〇運動，把工程技術人員派遣到遙遠的坦桑尼亞……

我們曾經那樣急不可耐地向工業化進軍，為此不惜幾十年如一日地壓榨農民。大煉鋼鐵、三綫建設、多少次技術革命的熱潮。當科學家一度是所有聰明少年的共同理想。還有，勒緊褲帶發射原子 器和人造衛星……

如此等等。把這一切稱之為「保守」，合適嗎？

如果我們今天所遇到的一切問題，在本質上和我們的前人在一百年前遇到的問題一樣，那倒好了。

人們經常談到鴉片戰爭。

世界銀行年度報告顯示，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

我突然產生這樣的聯想：在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一八四〇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當時的全世界又該是位居多少位呢？我想總該在前五十名之列吧。那時候的中國在歐洲北美國家門前尚且不那麼服氣，對日本，更不用說對朝鮮、新加坡、泰國，根本就沒放在眼裡。

當滿清中興名臣胡林翼在長江口上，目睹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深受刺激而昏倒在地，他所哀痛的是中國業已喪失了她的第一流強國地位。而今天的中國人呢，擔心的却是開除球籍，是成爲世界的尾巴！

四、五十年前的大上海，是遠東最耀眼的明珠，東京尚且比不過，更何況香港、更何況新加坡、更何況漢城！今天呢？

我們祖先留下的遺產也許的確不那麼美好，可是別人祖先的遺產又有幾家比我們更高明？一個人誤服下毒藥而落得奄奄一息，他怎麼能把一切都怪罪父母親的遺傳？

在自然科學領域，人們常常可以發現很確切的因果關係，因爲我們可以造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從而不難確定，甲現象是否是乙現象的原因。

社會研究領域就不同了，因爲我們無法造成一種孤立的環境。事實上總是：一系列現象引起了一系列其它現象。我們很難弄清楚，某一客觀後果究竟是先前哪一個事物引起的。比如說，西方列強打入其它社會，到底是推動了它們的發展，抑或是阻礙了它們的發展？

但是，我們中國人是幸運的。中國（大陸）幾十年來最大的特點是她受着共產黨的絕對

的、無處不在的有力領導。在這裡，外國的外力的影響是很有限的，其它政治力量的作用幾乎爲零。因此，共產黨的存在顯然是導致中國今日之現狀的最主要的、無可排除的基本原因。別人，既沒有權利掠共產黨的美，當然也沒有義務替它分擔責任。

不要再讓孔夫子當替罪羊了！

這本來是極其明顯的。正如「河殤」中寫到的：「在這個最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大國中，教師的地位竟淪落到非常卑賤的地步……教育危機成爲中國最緊迫的危機。」這是儒家文化的過錯嗎？這是傳統社會面臨工業文明挑戰的必然現象嗎？不，當然不。

也不要誇大人口負擔，不要一味抱怨農民素質低劣。要知道，畝產萬斤糧的神話，中國農民並沒有相信過。正像安徒生童話中老百姓並沒有相信過皇帝的新衣一樣。

我擔心的是，在「河殤」那巨大的，過分莊重的歷史感裡，有些人反而會失去了現實感。

請注意，在這兩年來的中國，當政治改革的討論興起之時，文化討論的熱潮就自然而然地消退下去了；而當政治改革的討論被迫終止時，文化討論的熱潮就又興起了。這就是「借文化打政治」。圈裡人圈外人都應忘記。

辛亥革命以前的兩千年，中國的社會結構大致上沒有發生變化。這其實不奇怪，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文明都是保守的、循環的。真正可驚異的倒是那僅有的古希臘文明何以竟有演進發展變化的能力！只因爲我們早就習慣了「人類歷史是在不斷地向前發展」以及「人類社

會發展若干階段論」的神話，我們才會對那些缺乏演進功力的文明感到迷惑不解。

兩百年前，拿破侖把中國比爲「睡獅」。今天呢，很難說中國還在酣睡，但人們開始懷疑它是不是獅子。

「河殤」具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雖然它沒有點明危機的真正根源。

中國的確面臨着毀滅性的動盪。每一個剛從大陸出來的人都有這種不祥的預感。

專制統治的巨大權力已經減退不少了。但是如果它把最後的一點力量仍然死死地用在壓制另一種政治力量的興起上面，如果它最關心的總是維持自己獨一無二、不容取代的絕對地位，中國的未來就是不堪設想的。

打破「大一統」只能意味着打破共產黨一黨專制，打破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

我們必須進行正面挑戰，我們必須爲自由民主而戰。

不要以爲經濟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喜出望外的自然後果。歷史上的中國，曾經是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當時的「個體戶」比例，絕不比今天的爲少。但是在一個強大的中央專制權力之下，它們是永遠長不大的兒童。我們的經濟改革已經陷入了困境，那決不是因爲什麼「社會的承受能力不夠」，而是因爲政治上的極爲專制。

最近，中共高層領導又出現了不同尋常的變動。現任總書記雖然還沒有像前任總書記那樣丟掉職位，但是趙紫陽的權力遭到重大削減

則是不爭的事實。

僅僅幾個月前，國內報紙還在大張旗鼓地為新的物價改革方案出台吶喊，現在我們聽到的則是「穩定」「穩定」。讓物價上漲搞得驚惶不安的老百姓被告知，在今明兩年，物價不會有大幅度的上漲。這當然是虛話：既然迄今為止的物價上漲都是在新的物價改革方案還沒有實施的情況下發生的，那麼，僅僅是推遲了新的物價改革方案的實施，又豈能消除飛漲不已的物價？

有些人不免奇怪：前段時間，改革派不是在政治上獲得勝利了嗎？為什麼如今在經濟改革問題上又退下來了呢？

其實，把當今中國經濟改革的複雜形勢簡化為共產黨高層「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是不大準確的。李鵬一派人也未必真心贊成過去那套經濟模式，即使他們贊成，他們也知道沒有辦法可以把事情拉回到原來的狀態。我寧肯把這兩派比作一兒一女，他們都知道老頭子害了重病，兒子主張立即動手術，女兒主張保守療法。一時間，兒子佔了上風，昏昏沉沉的老頭子被送進了手術室，殊不知剛打上麻藥，剛開了一個小口，病人當場就休克了過去。於是女兒驚呼「且慢，先讓老頭子調養一段時間再說。」兒子呢，手足無措，硬要堅持着動手術吧，連自己也沒把握。結果，女兒一派趁兒子在那裡發楞，把休克狀態的老頭子又趕快從手術室推了出來。可是，推出來後又怎麼樣呢？女兒也是一籌莫展，作作急救，輸輸氧，病人的氣算緩過來了，但病情本身却仍在惡化，而身體素質降得更低。這時兒子又出來說，還是抓緊時間動手術好，拖得太久，開刀更危險。就這樣，兒子和女兒，一會兒你的主張佔上風，一會兒我的主張佔上風，誰也沒有準主意。

，誰都對自己的治療方案沒把握。可憐的病人便一會兒送進手術室，一會兒又推出手術室。隨着這一反一復，兒女們越加心慌無主，而老頭子的病情則急劇地惡化……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麼當這一派的人剛剛佔了上風，不久就不得不讓位於另一派人作主，而另一派人在推行自己的方案後，很快又被前一派所取代。兩派人的起伏消長，並不是建築在自己的主張取得成功之上，而是建築在對方的主張遭到挫折之上。雙方都是在利用對方的錯誤提高自己的地位，而誰主事就意味着輪着誰犯錯誤。好比是一盤輪定了的棋，誰走子誰挨罵，顯得旁觀者倒要略好一些；然而等到旁觀者坐到了棋盤邊，情勢又以另一種形式繼續惡化，如此等等，往還重復。

事到如今，再樂觀的人也不敢對經濟改革抱希望了。連一貫報喜不報憂的人民日報也發表起文章要全國人民「共赴國難」了。解決中國困境的辦法不是沒有，只是中共領導們不肯用，一用就會失掉手中壟斷的專制權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該是最簡單、最起碼的自由了，也是一個社會實行民主的基礎，但就是這樣一付本性溫和的藥方，服之於當今的中國共產黨，恐怕也如同毒藥一樣不堪消受了。試想，假若現在大陸出現了一份真正獨立的、直言不諱的報紙，把執政黨專制、無能、貪污、腐化絲毫不誇張地略作揭露，我們的「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是否還能立得住，實在大可懷疑。但是反過來，倘若中共還不加緊實行一些自由民主，聽任自己像自由落體一樣毫無牽制地墜落下去，那麼要不了多少年，整

個中國就會陷入全盤的崩潰和破產！
結論很清楚：不徹底改革專制制度，不徹底改革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中國必將陷入災難的深淵。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應為自由民主而積極奮鬥！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閩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承辦 J1 簽證留美問題

前美國司法部大律師審理

精通中文及中國大陸政治法律的法律顧問協助承辦

■本所對美國國會及政府具有遊說能力

■本所至今承辦的 J1 簽證中國大陸留學生全部留美成功

■本所協助您將案子遞交移民局後：

- ⊖ J1 簽證者在半年內獲得美國正式就業許可，可在任何機構和公司任職。
- ⊖ J1 簽證者在半年內取得合法居留權（不管護照到期與否）。
- ⊖ 在任何情況下，移民局不得強令您離境。
- ⊖ 大多數 J1 簽證者在四年內獲得永久居留權。

精辦政治庇護·案子全部絕密·成功率超過九成

每案收費 \$1700，負責到底（全美律師平均收費 3000 元）

持此廣告（或考貝）節省 \$220 · 有效期截止 1988 年 12 月 31 日

現在只交 \$1480 一包到底

DW&C 事務所（支票抬頭請寫 DW&C）

2059 National Pres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045

TEL.(202) 726-4798(24小時服務)

要辦居留·定要早辦

護照或簽證逾期者照辦，但收費稍多

全美各州案例均予辦理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紐約總部、編輯部信箱改爲：

P.O.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港澳聯絡站：

香港九龍旺角
郵政信箱 79047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 號信箱

澳洲墨爾本聯絡站：

G.P.O.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1725
8050 FREISING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 BOX 146446
SAN FRANCISCO,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 BOX 4558
ARLING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42821 No 806
HOUSTON, TX 77062

美國夏威夷聯絡站：

P.O. 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OTTER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082
LINCOLN, NE 68501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NY 11370-9998

通訊處：(美洲)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香港) 香港九龍深水埔基隆街 236 號閣樓後座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郵便局 46 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718) 507-4739 『香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

T.P. Lee #6251 24-69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